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库

元明风云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元明风云

一代天骄

蒙古族是元朝的统治民族。成吉思汗是蒙古族最著名、最伟大的英雄。

蒙古部落最早生息、蕃衍的地方是今天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孛端察儿是草原上的一个牧民的遗腹子。孛端察儿的母亲阿阑果阿死后，兄弟分家。四个狠心的哥哥把家里的牲口、食物统统分光，一点也不给小弟弟孛端察儿留下。孛端察儿骑着一匹烂脊梁、断尾巴的青白马，在草原上流浪。

一群远处迁来的兀良哈人收留了孛端察儿，每天供给他马奶，照料他的生活。后来，孛端察儿的哥哥来寻找他，带他回去。孛端察儿对哥哥们说：“衣要有领，人要有头。那些兀良哈人，不分尊卑，不讲上下，是多么平庸的百姓啊！费不了什么劲，我们就可以把他们降服。”弟兄几个一合计，在草原上召集了一些壮士。孛端察儿带着他们，把那群兀良哈人掳来当奴隶。

孛端察儿的孙媳妇莫孛（音 ná）伦已经是一个大奴隶主了。有一天，她乘车外出，看见几个押刺伊而人的小孩在自己的牧场上挖掘草根。莫孛伦顿时大怒，扬鞭催马，车子向小孩们冲过去。小孩们不是被辗死，就是被辗伤。押刺伊而人是被辽国的军队驱赶到莫孛伦的牧场的。他们得知自己的小孩被辗死辗伤，十分气愤。为了报复，押刺伊而人把莫孛伦的马群抢跑。莫孛伦的六个儿子听到消息，来不及披好战甲，就急匆匆地追过去。莫孛伦连忙叫儿媳妇们将战甲送去，但已来不及了。六个儿子全部被杀。押刺伊而人乘胜回过头来将莫孛伦全家杀掉。莫孛伦的长孙叫海都，还是一个吃奶的娃儿。奶妈抱着海都，慌忙躲进柴火堆里，才逃出性命。

莫孛伦的第七个儿子纳真住在八刺忽部落的岳父家里，躲过了这场灾难。他抚养海都成人，帮助海都借八刺忽等部落的兵力，征服了押刺伊而人。被俘获的押刺伊而人，世世代代都是蒙古部落的奴隶。

海都的后人，一代一代，都是孛儿只斤氏族的首领。孛儿只斤氏族，在蒙古语里就是“黄金家族”的意思。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孛儿只斤氏族的首领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生了一个男孩。生这个男孩的那天，也速该正在外带兵打仗，抓住两个塔塔儿人，其中有一个名叫铁木真。战斗胜利结束，诃额仑生头胎儿子的喜讯也正好送到。也速该高高兴兴地为孩子起了一个名字——铁木真。铁木真就是后来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铁木真长到9岁，也速该想替他订一门亲事，就带着他到他舅舅家走亲戚。路上碰着翁吉刺部的德薛禅。也速该同德薛禅谈得很投机。德薛禅很喜欢满脸英气、满身虎气的小铁木真，主动提出将女儿孛儿帖许配给铁木真。也速该欣然同意，当即把儿子留在未来的老丈人家多玩几天，独自一人踏上归途。

途中，正遇上一群塔塔儿人在草原上宴会。也速该下马走进人群，按照草原牧人的习俗，同他们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喝起来。塔塔儿人认出他是孛儿只斤部落的也速该，却不动声色，殷勤地款待，又劝吃，又劝喝，暗地里在劝他喝的酒中下了毒药。

也速该辞别“好客”的塔塔儿人，接着赶路，肚子却一阵阵绞痛起来，

疼痛越来越剧烈。他这才意识到遭了暗算，但懊悔已来不及了。他在路上熬了三天，勉强回到家中，不久就咽了气。

也速该死后，孛儿只斤氏族急速衰落。大批奴隶（孛斡勒）、属民（哈刺抽）、侍从（那可儿）脱离孛儿只斤氏族的统治，归顺了新的奴隶主（那颜）。诃额仑带着铁木真兄弟几个，过着艰难的日子。

泰赤乌部落曾归附过也速该，这时也脱离孛儿只斤氏族，还带走了不少奴隶和牲畜。泰赤乌部的头领怕铁木真长大后报仇，带人抓走铁木真，把他套上沉重的木枷，用铁链拉着，在草原上的各个部落示众。准备示过众后，将他杀掉，斩草除根。

一代一代的部落仇杀好像在铁木真身上留存下特别坚韧劲健的生命基因。一天晚上，泰赤乌部落的人聚集在斡难河（今鄂嫩河）边举行宴会，只留下一个人看守铁木真。铁木真运足气力，挣开木枷，举起木枷，砸昏看守，逃出绝境。铁木真星夜跑回家中，把母亲、弟弟、妹妹带着，一起躲进不儿罕山（今肯特山）。这些“黄金家族”的成员，在深山里过着捉土拨鼠、野老鼠当饭吃的野人生活。

铁木真长大了，他同父亲为他订下的未婚妻孛儿帖成了亲。通过这门亲事，他的身后有了翁吉刺部落的坚强支持。铁木真的两个弟弟——合撒儿和别勒古台——也长大了，他们兄弟一个个魁梧健壮，是天生的能征善战的武士。铁木真身边还有两个一直对孛儿只斤氏族忠心耿耿的侍从——博尔术和者勒蔑。铁木真带领他们走出深山，来到草原，伺机重振父亲也速该时代孛儿只斤氏族的雄风。

铁木真作战勇敢、待人宽厚，很快建立起威信。泰赤乌部落的下属部落照烈部落的住地与铁木真的住地邻近。在打猎时，双方的队伍相遇。铁木真主动邀请照烈部落的猎人到自己住地歇宿。照烈部落带的干粮不够，铁木真主动供给他们饮食。第二天，双方联合打猎。铁木真吩咐自己的属下把野兽向照烈部落的合围圈中驱赶。照烈部落的人猎获丰盛，兴高采烈地回去了。他们纷纷传说道：“泰赤乌部落的人常常抢我们的车马，夺我们的饮食，哪有铁木真好！”

铁木真联合札答刺部落首领札木合等部落首领的力量击败蔑儿乞人。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铁木真被拥戴为汗。札木合不服，集合13个部落3万人的兵力进攻铁木真。铁木真将自己的3万兵力分成13翼迎战。双方在现在的克鲁伦河畔交锋，史称“十三翼之战”。铁木真战败，退回鄂嫩河一线。札木合残杀战俘，引起部下的不满。他们转而投奔铁木真。铁木真军事上吃了败仗，但由于得人心，力量却更加壮大。到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铁木真终于击败了当时被一些部落推举为古儿汗（天下之主的意思）的札木合。札木合脱逃，归顺乃蛮部落。

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夏，铁木真率领大军与乃蛮部落的塔阳汗对峙。夏季炎热，马匹消瘦。铁木真的部将大部分主张等到秋高马肥时再决战。铁木真的弟弟别勒古台却认为，正好利用对方轻敌不备的时机，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采用了弟弟的意见。交战那天，铁木真军中一匹瘦马受惊，跑到乃蛮军营内。塔阳汗一看对方的马瘦得脊背像刀片似的，不禁哈哈大笑，亲自跃上战马，冲向铁木真军中。倒是被铁木真打败过的札木合心知凶多吉少，偷偷溜走了。双方激烈鏖战，从上午打到下午。深入敌阵的塔阳汗被杀，乃蛮部落军队溃散。很多乃蛮士兵在溃退时，坠下山崖，送掉性命。

偷偷溜走的札木合能够投靠的部落已没有几个了。随着一个个蒙古部落望风归附铁木真，札木合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的几个侍从眼见败局已定，把他绑起来交给了铁木真。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在鄂嫩河畔举行忽里勒台（大聚会的意思），一致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并上尊号为成吉思汗。“成吉思”就是蒙古语“强大”的意思。

成吉思汗成为全蒙古的汗，标志着蒙古各部落实现了统一。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率领下，蒙古族南下、西进，在人类历史上刮起一股强劲的蒙古旋风。

蒙古旋风

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术赤、窝阔台、察合台和拖雷。在分配牧地、财物和奴隶时，四兄弟间不时发生一些争执、摩擦。成吉思汗对他们说：“世界广大，江河众多。你们不要互相争吵，要各自施展本事，去扩大自己牧地。”蒙古国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15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统统编为士兵。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孙子带领这支强悍、精锐的队伍，旋风般地冲出国门，扫荡了13世纪的欧亚大陆。

成吉思汗是在部落仇杀的腥风血雨中磨练出来的，他对外用兵的动员口号往往是“报仇雪恨”。

金朝统治者经常剿杀蒙古人，把杀人称为“减丁”。成吉思汗的曾祖叫合不勒。合不勒有个堂弟叫俺巴孩。有一次，俺巴孩送女儿出嫁，途中被塔塔儿人截击，当了俘虏。塔塔儿人把俺巴孩交给金朝皇帝。金朝皇帝下令用铁钉将俺巴孩活活钉死。成吉思汗初登汗位时，曾到净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向金朝交纳贡品。接受贡品的金朝官员完颜永济是金世宗的第七个儿子。成吉思汗与他会见时，态度不卑不亢，没有向他行跪拜的大礼。完颜永济当场翻脸，两人不欢而散。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完颜永济接替死去的侄儿金章宗完颜璟当了皇帝，史称卫绍王。第二年，完颜永济派使者到蒙古下诏书，指名要成吉思汗跪拜受诏。成吉思汗问使者：“金朝的新皇帝是谁？”使者回答：“是卫王。”成吉思汗对着南方狠狠吐了一口唾沫，说道：“我原来以为只有天上的人才能当中原的皇帝，想不到像卫王这样的孱种居然也当上中原的皇帝。我岂能为他下拜！”随后，他率领儿子和部将登上克伦河畔的一座高山，对天祈祷：“长生的苍天啊！金朝皇帝辱杀了我的祖先俺巴孩。假如你允许我复仇，就请助我一臂之力，就让已经死去的先人和各位神仙保佑我！”仪式结束，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南方。经过几年的战争，蒙古军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攻下金中都（今北京），第二年又直逼汴京（今开封）。到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成吉思汗的次子窝阔台将金朝皇帝最后盘据的一个据点蔡州（今河南汝南）攻破。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末帝完颜承麟被乱兵杀死，金朝遂告灭亡。

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成吉思汗派了一支商队到中亚一带做生意。商队有500只骆驼，满载金银制品、皮毛、纺织品等货物。行经花刺子模国的讹答刺城（在今哈萨克境内）。守将亦纳勒赤黑垂涎这笔货物，诬指商人是间谍，将商队洗劫一空。成吉思汗派出专使向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交涉，要求交出亦纳勒赤黑，追回被抢劫的货物。摩诃末不但拒绝了要求，还把使

者杀掉。成吉思汗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流出了眼泪。他一口气登上住地附近的一座山的顶峰，不喝水，不吃饭，跪在地上，祈祷上天保佑，帮助他惩罚侮辱了他的摩诃末。山风凄厉，林海怒啸，应和着他的祈祷声。整整过了三天三夜，成吉思汗才下山。下山以后，他就开始组织对花刺子模的远征。

花刺子模国是当时中亚的一个大国，摩诃末在号称拥有 40 万大军。成吉思汗率领的远征军只有 20 万人。他的三子察哈台和次子窝阔台负责围攻讹答刺城；长子术赤率军直扑锡尔河下游各城镇；成吉思汗领着小儿子拖雷指挥主力围攻不花刺城（今乌兹别克国的布哈拉）。不花刺守将乘夜率 2 万守兵突围。成吉思汗穷追不舍，将他们歼灭于阿姆河畔。第二天，不花刺城投降。成吉思汗乘胜进攻花刺子模都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国的撒马尔罕）。摩诃末在城中调集了 4 万守兵，20 只战象。慑于蒙古军队锐进突击的凌厉气势，花刺子模人失去抵抗的勇气，开城投降。摩诃末成了丧家之犬，被蒙古追兵逼得四处乱窜。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 年）12 月，在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一个小岛上，摩诃末因惊悸、懊恼，得病而死。

南宋宝庆三年（1227 年），成吉思汗率军攻打西夏都城中兴府（今银川）。城将破之际，成吉思汗因病去世。临死前，他留下了联宋灭金的战略部署，并叮嘱：等到中兴府攻下之后，方可发丧。他的遗嘱被严格执行。蒙古军队在统帅病死后，秘不发丧，继续猛攻中兴府。西夏国王李睨（音 xiàn）被迫到蒙古军营请求面见成吉思汗、接洽投降。蒙军将他抓住杀掉，两夏也就宣告灭亡。

成吉思汗去世后，暂由四子拖雷监国。两年后，诸王贵族选举他的次子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南宋端平二年（1235 年），窝阔台主持忽里勒台，决定派遣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长子率军西征。他们是：术赤的长子斡儿答，察合台的长子拜答儿，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拖雷的长子蒙哥。术赤王位的继承者，斡儿答的弟弟拔都总领诸军。察合台祝愿他们道：“长子出征呵，人马众多，威势盛大。”

拔都的蒙古军攻下莫斯科，继续向西北挺进，占领下诺夫哥罗德，前锋直抵芬兰湾。随后又攻入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扫向地中海岸。

窝阔台死后，其长子贵由继位。贵由死后，其堂弟蒙哥继位。蒙哥派遣自己的弟弟旭烈兀远征波斯和小亚细亚，灭了木剌夷（今里海西南）、报达（今底格里斯河下游）、西里亚（今地中海东岸）等国家。

成吉思汗祖孙三代穷兵黩武，建立了四大汗国：高加索山以北的俄罗斯、波兰等地为钦察汗国。高加索山以南的小亚细亚及里海东南为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之东为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之东为窝阔台汗国。

蒙古当时还处在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蒙古军事贵族以战争为儿戏，以杀戮为乐事，攻城以后继之以屠城，灭国之后继之以灭族，给受侵略的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的建立，客观上促进了东西交通线的连接、畅通，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西方，西方的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科技成果也传到中国，对彼此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人类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历史，留下了蒙古旋风横扫过后的种种痕迹。正因为这样，这股旋风的代表人物成吉思汗才被评说为“最大的风云人物”。

乾元正始

蒙古四大汗国建立后，欧亚大陆上与它抗衡的就只剩下南宋帝国了。南宋是在忽必烈手上灭亡的。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第四个儿子拖雷的第四个儿子。

忽必烈的哥哥，拖雷的长子蒙哥继任蒙古大汗后，把沙漠以南的汉族地区的军政事务都交给忽必烈处理。忽必烈注意使用汉族的读书人，对汉文化有浓厚兴趣。他叫人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翻译成蒙文，孜孜不倦地攻读。他请王鹗（音 è）讲解《尚书》、《易经》、《孝经》等儒家经典，常常一听就是一个通宵。谋士许衡对他说：“北方民族到中原当统治者，一定要推行汉人的统治方法，才能维持长久。”谋士徐世隆对他说：“当中国皇帝的人，要按中国的方式办事。”他听了都很赞赏。

忽必烈对蒙古军事贵族乱杀人的行为很反感。蒙哥任命了一个管理天下财赋的官员，名叫不只儿。不只儿到任的第一天，就杀了 28 个人。有一个人被指控为盗马贼。不只儿将他打过板子，就释放了。过一会，有人献给不只儿一把环刀。不只儿想试试刀的锋口，就赶快派人将已释放的那个盗马贼又抓了回来。不只儿手起刀落，将他斩首，高兴地称赞：“果然是把好刀！”忽必烈听说这件事，把不只儿叫过来责备道：“凡是有死罪的人，一定要慎重、详细审理清楚后才能执行死刑。你一大就杀掉 28 个人，肯定有很多是无辜被杀的。已经打过板子放掉的人，你又抓回来杀了，这算什么刑法？”不只儿回答不上来，愣了一阵，退了下去。

南宋宝祐六年（1258 年），蒙哥亲率主力攻合州（今四川合川），另派忽必烈率军去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合州军民在城中坚守了 5 个月。蒙哥见久围不克，十分气恼。他亲自出马督阵，却被城上发射的砲石击中，受了重伤。回到大营不久就死了。消息传到已经挺进到武昌对江的忽必烈军中。有人劝他赶紧回兵，争夺汗位。他拒绝道：“我奉命南来，哪能够没有一点结果就匆匆忙忙回去！”

宋朝的大船扼守在长江南岸渡口。忽必烈派人夺来两只大船，连夜做好渡江准备。第二天，天刚亮，忽必烈就来到岸边。此时正碰上又刮风、又下雨，天色阴沉沉的。部将们都以为渡不成江了。忽必烈却严令按计划执行。风雨中，蒙古军擂起战鼓、挥舞战旗，拉开风帆，向对岸冲去。船至江心，云层中透出一束阳光，蒙古军士气大振，直抵南岸。

忽必烈正部署下一步进攻行动时，留在开平（今内蒙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的王妃弘吉刺氏派亲信送来紧急消息：一些大臣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由阿里不哥继承蒙哥的汗位。这阿里不哥是拖雷的第七个儿子，蒙哥在位时派他留守都城和林（在今蒙古国境内）。他长期生活在蒙古本土，力主墨守蒙古奴隶主贵族的成规旧法，因此受到一批保守派大臣的拥护。

忽必烈听从汉族谋士郝经的建议，一面派人到合州方向迎接蒙哥的灵车，接收大汗的宝玺；一面与南宋贾似道议和，签定密约，从鄂州撤军。布置妥当，便轻车简从，火速北上。

南宋景定元年（1260 年）3 月，忽必烈在另一批蒙古军事贵族的头面人物的拥戴下，于开平即汗位，历史上称他为元世祖。他按照汉人封建王朝的惯例，颁布了即位诏书，称皇帝，定年号为“中统”。他的即位诏书中说：

“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意思是：效法《春秋》，讲究堂堂正正的开始，体现《易》经中的“乾元”精神（刚健宏大的精神）。忽必烈的这些做法，表明他把自己看作是中国封建皇朝更替的正统继承者。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又下诏将国号定为“大元”，并在诏书中解释道：这是取《易》经中的“乾元”的含义。

忽必烈当了元朝的皇帝后，集中全力攻宋。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下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将宋恭帝赵昀（音xi n）和他的母亲全氏抓到大都（今北京）。

忽必烈灭了南宋，在上都开平举行庆祝宴会。宴会上，人人兴高采烈，只有皇后弘吉刺氏面有忧色。忽必烈问她：“我现在平定了江南，以后就用不着再打仗了。众人都喜欢，你一个人不高兴，是什么原因呢？”弘吉刺氏跪着回答：“我听人说过，自古以来就没有千年不灭的皇朝。您可不要让我们的子孙有朝一日也落得像南宋小皇帝这样的下场啊！”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35年，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去世。在他的统治期间，国家比较安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史书上称他“能以夏变夷”，也就是说，能用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的政治、文化制度来改变蒙古奴隶主的落后统治方式，这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

马可·波罗

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了钦察、伊儿、察合台、窝阔台四大汗国，四大汗国都尊奉元朝的皇帝为“大汗”。中国是元朝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世界各国的使者、商人、旅行家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其中最有名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作者、意大利杰出的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马可·波罗生于1254年。他父亲尼古拉·波罗、叔父玛飞·波罗都是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6岁那一年，尼古拉和玛飞两兄弟到外国做生意，后来留居在不花刺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在不花刺，兄弟俩认识了旭烈兀汗派去朝觐元世祖忽必烈的使者。使者建议他俩随同自己一道去晋谒忽必烈。尼古拉和玛飞接受了这个邀请。

元世祖忽必烈见到尼古拉和玛飞，十分高兴，向他们垂询西欧各地的风土人情，罗马皇帝和教皇的情况。这两位意大利人在留居不花刺城的时候，已学会了蒙古语，对忽必烈的问题对答如流。忽必烈很赏识他们，委派他们作为蒙古大汗的专使，去拜见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忽必烈赐给他们一面金牌。持有这面金牌，他们可在蒙古征服的广袤土地上通行无阻，并受到官员的保护，能领取到一切生活必需品。

尼古拉、玛飞两兄弟在路上走了3年。1269年4月，他们到达阿克城，在那里，听到克莱门特四世新近逝世的消息。驻阿克城的教皇使者要他们等候新教皇的选举的结果，然后向新教皇递交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国书。兄弟俩利用这段时间回到威尼斯探亲。这时马可·波罗已长成15岁的少年了。

新教皇的选举一再拖延，两年之后才有了结果。选出的新教皇正好是当年那位驻阿克城的教皇使者，史称格雷戈里十世。格雷戈里十世委派尼古拉、玛飞为教皇专使，回拜蒙古大汗，并托他俩带去许多珍贵的礼物，赠送给大汗。

马可·波罗十分向往繁荣富庶的中国，央求父亲带他到中国去。马可的母亲已经去世，尼古拉也觉得，让孩子一个人留在威尼斯，他放心不下。于是父子叔侄二人，一起踏上了赴中国的旅途。

他们沿着公元前一世纪初叶我国古代人民和西南亚各族人民开辟的“丝绸之路”东行。他们有时骑马，有时骑骆驼，有时步行，穿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走出中亚大沙漠，跨过帕米尔高原，经新疆的喀什、于田、罗布泊，到甘肃的敦煌、玉门……他们在中国境内所走过的路线，大体上是晋代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的路线，不过行进的方向相反罢了。

他们走了三年半时间，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5月到达上都开平。

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专门集合文武大臣，举行盛大仪式，欢迎远道而来的教皇使者。尼古拉、玛飞向忽必烈报告了往返的经历，并呈上格雷戈里十世的书信和礼物。忽必烈注意到侍立在两兄弟身边的马可·波罗，问：“他是谁？”尼古拉回答：“这是陛下的仆人，我的儿子。”忽必烈很喜欢这个体型威武、仪表端正的年轻人，下令将马可的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花名册。

马可·波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蒙古宫廷的礼节，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元世祖忽必烈为了考察他的能力，派他到云南去办事。当时，从云南到上都要走六个月的路程。马可·波罗一路留心观察风土人情，回到上都后，向忽必烈详细报告。例如，他看到云南人从盐井中取水，放在小锅里制成盐饼，盐饼上凸下平，打上特殊标记后，可作为货币流通，80个盐饼兑换一个金萨吉（金币名称）。可是，当商人将盐饼运到偏远山区后，按山区土人的落后情况，以及离城市的路程远近，只用60、50、甚至40个盐饼就可换到手一个金萨吉。又如，有很多云南百姓随身带有毒药。遇上有被捕或受苦刑的危险，他们就吞服毒药自杀，以免遭受折磨。当地的政府官员得准备好狗屎，一旦发现犯人吞服了毒药，就强迫他们吞食狗屎，以引起呕吐，解除毒性……对于这些情况，忽必烈都听得十分认真。他夸奖马可·波罗聪明能干。以后，忽必烈经常派马可·波罗执行重要任务。马可·波罗曾到过济南、南京、九江、镇江、常州、苏州、杭州、泉州等地视察，曾在扬州当过三年总管，还出使国外，到过南洋好几个国家。

马可·波罗特别赞赏杭州，在《游记》中说：“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所以有‘天城’之名。”他同杭州城里一个富商结为好朋友。那位富商曾当过南宋皇帝的心腹侍从，对他讲述了许多南宋宫廷生活的细节，并带他去参观宋代皇宫的旧址。面对败壁颓垣，马可·波罗不禁感慨万分。他注意到，杭州城的居民恬静温文、忠厚公平、邻里和睦、待客友好，但对驻防的蒙古军人却十分讨厌，内心埋藏着由于大好河山被异族所占据而产生的亡国之恨。

那时的欧洲人根本不知道煤炭是什么东西。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惊讶不止地记载道：“整个契丹省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色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他深感中国物产丰富、文教昌明。他死之前，天主教的神父要求他为了灵魂的安宁，声明取消《游记》中所说的“一些似乎不可相信的事。”马可·波罗忠于事实，拒绝作这样的忏悔，还坚持宣称：“我还没有说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半。”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中国生活了17年，思乡情切，一再向元

世祖忽必烈请求回国。起先，忽必烈宠幸马可·波罗，舍不得放他们三人走。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选了一个名叫阔阔真的皇族少女，赐给伊儿汗国的国王做王妃，需要一个熟悉海路的人护送她到伊儿汗国去，这才让他们父子叔侄三人离开中国。

直到1295年冬天，尼古拉、玛飞和马可才回到威尼斯。他们离开家乡已经26年了，占据他们住宅的远房亲戚竟认不出他们，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反复说明情况，并拿出各种足以证明身份的证据，才被故乡的亲友接纳。

13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意大利城邦之间经常发生冲突。1298年，热那亚进攻威尼斯。马可·波罗出钱装备了一艘战舰，自任舰长，加入威尼斯舰队，同热那亚舰队展开激战。威尼斯舰队全军覆没，马可·波罗成了热那亚人的俘虏。

在热那亚人的牢房里，马可·波罗认识了一位难友——比萨作家鲁思梯谦。他向鲁思梯谦讲述了他在中国的见闻。鲁思梯谦将他的叙述笔录下来，这便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录》。

1299年，马可·波罗获释，回到威尼斯，重操旧业，经商为生。1324年，马可·波罗因病去世。

《马可·波罗游记》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神奇美丽、富庶繁华的东方世界。著名旅行家哥伦布就是因为看了《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文明钦慕不已，才下定决心，冒险远航，以实现到中国一游的愿望。哥伦布远航，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开辟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历史的新纪元。究其缘由，首先要归功于马可·波罗对哥伦布的巨大影响。

宽厚长者长髯人

“以夏变夷”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曾经成为中原地区统治民族的少数民族所走的共同道路。“以夏变夷”政策的代表人物，除了一些明智的最高统治者外，还有一些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的有识之士。耶律楚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

耶律楚材生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是辽国皇族的后裔。他的父亲耶律履是金世宗朝中的尚书右丞。耶律楚材3岁时就成了孤儿，由母亲杨氏教养成人。

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金国的燕京（今北京）。耶律楚材成了蒙古军的俘虏。他虽然只有25岁，但已经是著名的博学多才的人物。成吉思汗亲自召见他，对他说：“辽、金是世世代代的仇敌，我现在攻打金国，也是为你报仇嘛。”耶律楚材回答道：“我祖父、父亲都是金朝的臣子，哪里谈得上将金朝当成仇敌呢！”成吉思汗很赞赏他的民族宽容精神，将他留在身边当参谋咨询人员。耶律楚材身材高大，声音宏亮，又长着一把长长的胡须。成吉思汗亲切地称他“吾图撒合里”，也就是“长髯人”的意思。当时，成吉思汗身边还有一个西夏人，叫常八斤，是一个手艺高超的造弓匠人，很得重用。常八斤对入说道：“国家正是忙于征战的时候，像耶律楚材这样的读书人有什么用处？”耶律楚材听了这话，也对入说道：“造一把弓尚且要重用弓匠，治理天下的人岂能够不重用‘治天下匠’吗？”成吉思汗听说这件事，对耶律楚材更加信用。

成吉思汗信仰萨满教；出征时，常常自己烧烤羊胛骨，按照上面形成的

裂纹来占卜吉凶。耶律楚材看准成吉思汗的心理，运用自己的天文学知识，几次预报月蚀成功，来巩固成吉思汗对自己的信任，并伺机对军国大事发表意见。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成吉思汗进军西域，直抵东印度。兵士们见到一种怪兽，样子像鹿，尾巴像马，浑身发绿，头长一只角。成吉思汗问耶律楚材，这是什么野兽？耶律楚材趁机说道：“这是一种吉祥的野兽，它好生恶杀，是受天的派遣来告诉陛下：陛下是天的长子；天下的人都像是陛下的孩子。陛下要顺应天的心意，保全百姓的性命。”成吉思汗听了他的话，停止了这次远征。

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成吉思汗的次子窝阔台继承了汗位，史称太宗。耶律楚材趁机建议实行大赦，还提出了其他18条有利于百姓的措施。太宗窝阔台记起成吉思汗当年对他的嘱咐：“以后国家的军政大事，都要交给耶律楚材办！”就批准了17条，只有“禁止百姓向官吏贡献礼物”这一条没批准。窝阔台的借口是：“自愿送礼的，还是让他们送为好。”其实，百姓哪有“自愿”向长官贡献礼物的？明里暗里逼迫百姓送礼，是官吏的一种剥削方式。耶律楚材对百姓的苦情知道得很清楚，向窝阔台争辩道：“收受礼物是种种不轨行为的开端，禁止送礼的措施不能没有！”窝阔台有点不高兴，说道：“凡是你建议的事情，我没有不答应的。你就不能听我的一次话，答应我的一件事吗？”耶律楚材这才不得已作罢。

有个叫石抹咸得卜的蒙古贵族，在成吉思汗时期任燕蓟留后长官。他既贪婪，又残暴。耶律楚材查明情况，向成吉思汗报告，采取措施，使石抹咸得卜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石抹咸得卜怀恨在心，向皇族的亲王进谗言，说耶律楚材用了很多亲信，定有二心，要奏明大汗，将他杀掉。亲王派人向窝阔台转达这个意见。窝阔台知道这是诬陷，将亲王派来的人责备了一通，又下令罢免石抹咸得卜的官。恰巧这时有人控告石抹咸得卜的不法行为，窝阔台派耶律楚材审讯石抹咸得卜。耶律楚材为了缓和自己同蒙古军事贵族间的关系，向窝阔台启奏道：“石抹咸得卜这个人很傲慢，容易得罪人。现在正是在南方进行征讨的时候，不如放他一马，以后再治他的罪也不晚。”窝阔台不禁感慨地向周围的侍臣说道：“耶律楚材不计较私仇，真是一个宽厚长者，你们都应该效法他。”

成吉思汗时期，近臣别迭曾主张：“汉人对国家没什么用处，最好把他们杀光，把他们的农田统统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这种野蛮、倒退的政策。他对成吉思汗分析道：“陛下要南伐，需要大量的军费。中原地区的汉人种田、经商、晒盐、酿酒、冶铁、捕鱼，交的税足可供军需之用，怎么能说汉人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呢！”窝阔台时期，派大将速不台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按照蒙古军事贵族的规矩，他们攻打哪座城市，如果守城军民射箭放炮伤了他们的人，那就是“拒命”，攻下城市以后，就要将满城军民都杀掉。速不台派人向窝阔台请示，准备按这条规矩在汴京进行大屠杀。耶律楚材急忙赶到宫里对窝阔台劝道：“将士们打下几十年仗，不就是图的得到土地和人民么！得了土地，没有了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呢？”窝阔台拘于老规矩，还是下不了放弃屠城计划的决心。耶律楚材继续劝说道：“汴京是金国的新都城，有手艺的匠人，有钱财的富户，都聚集在城里边。要是把他们都杀光了，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呀！”窝阔台终于听从了他的意见，指示速不台，只杀金国的皇族完颜氏的人，其余的老百姓都不要杀。这一次，救下了当时躲避到汴京城内的147万百姓的性命。耶律楚材又奏请派专人在

汴京寻找孔子的后代。窝阔台的专使找到了孔子的 51 代孙孔元措，窝阔台把他封为衍圣公。此后，又召集了一批儒生、学者，办了编修所、经籍所等机构，使中原地区的文教事业得到初步的恢复。

蒙古军事贵族还有一条规矩，就是让被他们征服的民族再去替他们攻打其他民族，以制造民族矛盾，巩固蒙古军事贵族至高无上的地位。南宋端平二年（1235 年），窝阔台同朝臣商议，打算派回回人出征江南，汉人出征西域。耶律楚材出面反对这个计划：“中原与西域，相去遥远。像这样调兵，还没等抵达敌人国境，人马就已疲乏不堪了。更何况各地水土不同，外地人去了容易感染疾病，更谈不上打胜仗了。”这一次，窝阔台也听从了他的意见。

但窝阔台也有对耶律楚材动怒的时候。有一次，窝阔台宠信的太监同通事杨惟忠勾结在一起，将一名道士非法虐杀。耶律楚材将杨惟忠抓了起来。那太监反过来向窝阔台诬告耶律楚材非法抓人。窝阔台一怒之下，将耶律楚材绑了起来。怒气过后，窝阔台又后悔了，下令释放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却不肯让人为自己松绑，他对窝阔台说道：“我是朝廷宰相，负有处理国事的责任。陛下先绑了我，是因为认为我有罪，那就应当把我的罪行向百官明明白白地公布出来。现在又要放我，是因为觉得我无罪。哪能这样轻易地抓起来，放过去，像戏弄小儿一样。以后再有国家大事，也能像这样处理吗？”窝阔台理屈词穷，只好用好言宽慰耶律楚材，隐晦地赔了一个不是：“朕虽然是个皇帝，难道就不会犯一点过失吗！”耶律楚材又趁此机会，提出了十条有利于百姓的措施。

耶律楚材深知，他要想为百姓办一点好事，只有取得窝阔台的同意才成，所以，他对窝阔台说得上是忠心耿耿。窝阔台好喝酒，经常与大臣一起喝得烂醉如泥。耶律楚材多次劝谏，没有效果。耶律楚材急了，从酒槽中拿了一块锈铁，对窝阔台说道：“酒能把铁都腐蚀成这个样子，何况是人的五脏六腑呢！”窝阔台这才有所觉悟，他感动地对近臣们说道：“你们的爱君忧国的心，没有一个赶得上长髯人耶律楚材！”从那以后，窝阔台每天饮酒便以三杯为限。

耶律楚材死后，有人散布他的流言蜚语，说他把天下贡赋的一半都私吞了。当时主持国事的窝阔台的皇后乃马真氏派人到耶律楚材家里去搜查，发现他的遗产不过是十几把琴、阮之类的乐器，再加上一点书画、金石等艺术品，此外，就是他自己的文稿。所谓私吞天下贡赋云云，完全是向壁虚构的谣言。

长春真人雪山行

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是“儒道互补”。如果说，耶律楚材是运用儒家思想于政治实践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丘处机则是一个使道教与蒙古军事贵族的政治利益契合的代表人物，而道教的核心观念正是来源于道家思想的。

金朝人王重阳创立了道教的全真道一派。他有七个弟子，号称“七真”。丘处机在七真中排行第四，历史上的名声却最大。

丘处机是登州（今山东蓬莱）人。他 19 岁时，到宁海（今山东牟平）的昆崙山，跟随王重阳学习全真道的教义，给自己起了个道号，叫“长春子”。

他成名后，人们唤他为“长春真人”。

那时，山东还是金朝统治的地方。金世宗完颜雍听说“长春真人”道术十分了得，就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召见丘处机。完颜雍的堂兄完颜亮，史称海陵王，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荒淫皇帝。完颜雍当济南尹时，完颜亮垂涎他的妻子乌林答氏，召她进京。乌林答氏临行前对完颜雍说道：“我不去，那淫棍一定要杀你。你就让我去吧！我自有办法保全杀，实现了对丈夫的保证。完颜雍仇恨在心，伺机夺了完颜亮的帝位，并向天下百姓揭露了完颜亮种种荒淫无耻的罪行。但是，当了皇帝的完颜雍也免不了走上荒淫的道路。由于纵欲过度，他身体虚弱、精神疲惫，上殿朝会都得两个人左右搀扶。他召见丘处机，是想向这位“真人”讨教一点保养的方术。丘处机对宫廷的糜烂早有所闻，乘这个机会，他劝完颜雍：“要克制，要寡欲；这样才能保养精气，调和阳神。”完颜雍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却点头称是，赐给丘处机几个桃子。

完颜雍过了8年就死掉了，他的孙子完颜璟继承了帝位，史称金章宗。完颜璟宠爱元妃李师儿。李师儿是汉人，出身贫贱，虽然聪明伶俐、知书达礼，却仍受到宫中女真贵族女子的倾轧。李师儿经常劝完颜璟提倡道教。她在宫中，遥拜长春真人丘处机为师，派人专程赠送给丘处机一部《道藏》。

丘处机起先也想借金朝皇帝的力量来推行道教，对金朝皇室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贞祐二年（1214年），山东爆发了杨安儿、耿格的起义。义军活动的地区正是丘处机的家乡一带。丘处机利用全真道的影响，劝阻农民参加义军，策动义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反水、投降。后来，他看到金朝的统治越来越腐败，气数将尽，就转而采取与金朝皇室不合作的态度。金章宗完颜璟、继承完颜璟帝位的金宣宗完颜珣派人召丘处机进京，他都推辞不去。

丘处机这时看好的“真命天子”是在金朝的背后崛起的成吉思汗。

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成吉思汗派了近臣札八儿和刘仲禄两人为使者去召见丘处机。丘处机恭恭敬敬地把他们当“天使”接待，拜领了诏书，随即挑选了18名徒弟随从，同“天使”一起去谒见成吉思汗。一行人来到抚州（今河北张北），听说成吉思汗已经率军攻打西夏去了。他们跟着向西夏（今宁夏一带）前线赶去，成吉思汗的大军却又挺进到西域（今新疆一带）。他们追踪到西域；大军又已踏上进攻花刺子模国的征途。丘处机一行于是也跟着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为了谒见成吉思汗，丘处机一行跋涉上万里，途经40多个国家，历时四个年头。夏天，他们行走在沙漠中，唇焦口燥，烈日当空，热气蒸腾，几乎把他们烤成肉干。冬天，他们行走在雪地里，寒气砭骨；骑在马上，俯身用马鞭的木杆去量测积雪的厚度，木杆全部插进雪中，还到不了雪层的一半深。沿途几乎见不到人烟，随处可见的，却是残折锈蚀的兵器，狼藉支离的尸骨。有时陷入补给断绝的境地，他们就只能忍饥挨饿地前进。

他们从昆崙山来到中亚的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同成吉思汗的大军会合。成吉思汗会见了丘处机，并下令在驻地给这位“真人”专门搭起庐帐，供他长期居住。

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进言：“要想统一天下，就一定不能以杀人为嗜好。”成吉思汗问他：“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什么？”丘处机告诉他：“敬畏天意，爱护百姓是治国的根本。”成吉思汗向他讨教“长生”的法子。丘处机的回答是：“最要紧的是清心寡欲。”丘处机谈的这一些全真派道教的大道理，

对于从蒙古草原一路冲杀过来，狂飙猛进的成吉思汗的确说得上是一服清凉剂、镇定剂。成吉思汗很欣赏他的话，高兴地对他说：“你真是天赐给我的老神仙，是专门来开通我的心志的！”以后，成吉思汗就一直用“神仙”这个称号来称呼丘处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成吉思汗已经年过花甲。在一次围猎中，成吉思汗的马摔了一交，差点把他摔下鞍。丘处机劝告他：“天是讲究保护生命的，陛下年纪又大了，再经常搞围猎，就不合宜了。”成吉思汗听了丘处机的话，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再举行围猎活动。

丘处机从雪山回到河北一带，派徒弟们拿着道教徒的身份证明书（所谓“牒”）去召集百姓入教。由于战乱，很多老百姓被蒙古军事贵族掠去当了奴隶，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濒临死亡。丘处机凭借成吉思汗对他的信任，利用发展道教徒的方法，使两三万当了奴隶的百姓恢复了良家平民的身分，濒临死亡的人有了生路。

晚年的成吉思汗经常派使者对丘处机表示慰问，捎话说：“我常常想念神仙，神仙可不要忘记我啊！”但丘处机毕竟不是“神仙”。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丘处机去世，享年80岁。成吉思汗比他晚去世两年，享年66岁。

科技巨人郭守敬

郭守敬是元代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他的祖父郭荣，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数学和水利都很有研究。郭守敬在祖父的影响下，从小就不喜欢嬉戏游乐，一门心思钻研学问。郭荣很喜欢这个大堪造就的孙子，除了自己尽心辅导外，还让他跟随同乡的著名学者释子聪学习。

释子聪俗名刘侃，当官后改名刘秉忠。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仕宦的家庭，早年在武安山隐居，出家当了和尚，后来跟随海云禅师一起，被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成为忽必烈的智囊。元朝的国号“大元”，就是他替忽必烈拟定的；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城的建设规划也是由他制定并组织实施的。

中统三年（1262年），释子聪的同学张文谦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荐郭守敬。郭守敬向忽必烈面陈“水利六事”。忽必烈听过以后，大为赞叹，感慨地说道：“办事情的人都像郭守敬这样，才能说不是吃干饭的人！”忽必烈任命他为副河渠使，以后又提拔为都水少监，主管全国的水利工程。当时，张文谦被派到西夏中兴等路（今宁夏一带）主持政务。郭守敬跟随张文谦来到西夏，看到这一带原有的灌溉渠道大多数都淤塞得厉害，修复起来，难度很大。有人主张另开新渠。郭守敬经过仔细考虑，认为另开新渠既费时间，又浪费人力财力。他主张将原有渠道挖深、疏通，并配修闸门和围堰，保持河渠内的水量，以满足农田灌溉的需要。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修复了唐徕、汉延两条渠道，扩大灌溉面积10多万顷。

郭守敬小的时候就对天文学特别感兴趣，曾自己动手，用竹蔑做成浑仪观察天象。至元十三年（1276年），郭守敬参加了修订历法的工作。他建议，为了给修订历法提供依据，要先对天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观测。

要准确地观测天象，就得首先解决仪器问题。大都城里的天文仪器，还是金人从汴京（今河南开封）搬来的北宋时代制造的一些旧仪器。大都的纬度与汴梁不同，用这些旧仪器观测到的数据都不准确。郭守敬决定重新设计

制作一套天文观测仪器。

古代测量日月星辰位置的主要天文仪器是浑仪。宋代的浑仪构造复杂，圆环一道套一道，转动不灵便，还遮住了一部分视野，使一些星星落入观测的死角。郭守敬对浑仪进行革新，另制一种结构简单、刻度精密的简仪。为了让简仪旋转起来灵便自如，郭守敬在上面装了滚动轴承。欧洲人在郭守敬以后一两百年才知道应用滚动轴承。清朝初年，传教士汤若望到北京，看到郭守敬制造的天文观测仪器，非常敬佩。他称郭守敬为“中国的第谷”。第谷是丹麦天文学家，他所进行的天文观测，被欧洲人誉为“望远镜发明以前最精确的观测”。第谷是行星运动三大规律的发现者开普勒的老师，开普勒所发现的三大规律直接启发牛顿发现了力学三定律。第谷生于 1546 年，比郭守敬晚了 300 多年。

郭守敬挑选了 14 个具有天文观测知识的官员，带着他创制的一套携带方便的天文仪器，分成几个小组，到设在全国各地的 22 个观测站进行天文观测。各观测站的数据报到大都后，郭守敬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我国古代很准确的一部历法——授时历。授时历规定一年有 365.2425 天，与现代测定的地球公转周期只差 26 秒，与现在世界上通用格里历（即公历）的规定相同。授时历在至元十七年（1280 年）颁行，比格里历早出 302 年。

大都的粮食要靠江浙供应。江浙的粮食可顺大运河从杭州运到通州（今北京通县），但从通州到大都这一段路，就得靠驴畜驮运。遇到秋雨绵绵的季节，道路泥泞难行，累死的牲口不计其数。郭守敬亲自到大都郊区查勘，发现昌平东南的山下有一道白浮泉，水量很大，可以作为向通州到大都的人工河道供水的水源。他在深入了解大都郊区的地形走向的基础上，选定了新运河的走向，制定了逐段筑坝、设闸控制水量的计划。在他的组织、指导下，只用两年时间，就开通了全长 160 里的新运河。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亲眼看到，在连接通州和大都的新运河水面上，满是运粮的船只，心中十分高兴，将这段新运河命名为“通惠河”。

大德二年（1298 年），元成宗铁穆耳在上都召见郭守敬，向他咨询开挖铁幡竿渠的事情。郭守敬认为：“这一带山洪猛烈，铁幡竿渠非得挖到 50 到 70 步（一步为 6 尺）宽不可。”主持铁幡竿工程的人觉得郭守敬是在用大话吓人，又不愿意多花费，将渠的宽度缩减了三分之一。第二年，大雨如注，山洪暴涨，已挖好的渠道根本容不下水，洪水泛滥，将两岸的人畜帐篷都淹掉了，还差点把元成宗铁穆耳的行宫也冲垮。铁穆耳想起郭守敬的话，不禁感慨地对身边的大臣说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啊！只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用。”

通过这件事，元成宗铁穆耳深深认识到科技人才的价值。大德七年（1303 年），铁穆耳下诏：官员年过 70 岁的，都要退休。郭守敬那一年已经 73 岁了，依照这个规定，提出了退休的申请；铁穆耳坚决加以挽留。此后，太使院的专业科技人员不退休，成为一条惯例。郭守敬一直在太史院供职，直到延祐三年（1316 年）病逝。那年，他已经 86 岁了。

南坡之变

元世祖忽必烈的太子真金颇有政治才干。忽必烈在位期间的著名奸臣，

如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对他都心存畏惧。忽必烈年过 70 以后，有些朝臣私下议论，认为他可以禅位给真金。真金听到了，心里很不安。一些对他心怀不满的人趁机在忽必烈面前挑拨。忽必烈认为真金急于抢班，发了脾气。真金益发惊懼，郁郁而死，这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间的事，真金还只 43 岁。

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80 岁的忽必烈去世。帝位由真金的第三个儿子铁穆耳继承，史称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 年），铁穆耳死后，帝位由真金第二个儿子答剌麻八剌的长子海山继承，史称元武宗。海山即位后，与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商定以后帝位的继承，采用兄终弟及，叔侄相承的办法，即海山死后，由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死了，就该由海山的儿子继承帝位。促成这个协议的人，是他俩的生母答己。

答己曾把他俩的星命交给阴阳家推算。阴阳家禀告答己：“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大荒落、旃蒙、作噩是古代纪年的符号。重光大荒落是辛巳年，恰合海山的生年（1281 年）；旃蒙作噩是乙酉年，恰合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年（1285 年）。答己是个迷信的女人，听了这番话，就想让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元成宗铁穆耳的帝位。海山当时率兵镇守北疆。答己派人向他透露了自己的意思。海山震惊之余，迅速作出反应，他派麾下勇将康里脱脱先行进京，向答己表示自己当皇帝的决心；随即就亲自率领大军，兵分三路向大都开发。康里脱脱进京后，极力斡旋，使三宫（答己、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利益兼顾，实现妥协。海山即位为帝，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尊答己为皇太后，并就以后的帝位传递作了上述安排。

元武宗海山当了四年皇帝就病死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当了皇帝，史称元仁宗。本应立海山的儿子和世㻋（音 là）为皇太子。答己同海山的感情已有过隔阂，现在看着和世㻋也觉得不顺眼。一向依附答己的大臣铁木迭儿为了迎合皇太后，更为了讨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欢心，建议不立和世㻋，而立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在答己看来，和世㻋有一股桀骜不驯的劲头，难以驾驭；硕德八剌却显得很柔懦，容易控制。这个权势欲很盛的女人，对于不顺她意愿的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孙子，也是容忍不下去的。

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没有像阴阳家预言的那样“长久”做皇帝。延祐七年（1320 年），他也死去了。他的儿子硕德八剌在祖母的支持下，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元英宗。

元英宗硕德八剌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他其实并不柔懦，处事很有主见。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刚一去世，他就同答己在政事的处置上开始交锋。有一个叫乞失监的臣子，因为卖官鬻爵，被刑部按法律规定判处杖刑。答己却出面干预，叫改行笞刑。杖刑是元代“五刑”中的第四等刑，最少要打 67 板子；最多打到 107 板子。笞刑是第五等刑，最多只打 57 鞭子；最少的，打上 7 鞭子，表示一下惩戒之意就算了。英宗硕德八剌得知祖母要卖人情，立即加以制止。他对祖母说道：“法律的规定体现了天下的公意。迁就个人感情，随意调轻调重，那就不能在天下人面前维护法律的威信了。”他断然命令，维持原判，对乞失监执行杖刑。过了没有半个月，又有一个大臣，叫失列门，受了答己的指使，向硕德八剌提出要调整人事，撤一批人，任命一批人。硕德八剌马上驳回：“现在哪里是封新官的时候！先帝的旧臣，也不宜轻易变动。等到我正式即位，自然会同宗室亲王、

元老大臣仔细商议。到时候，贤能者都可得到任用，奸邪者都要被罢免。”答己连着碰了几个不硬不软的钉子，气愤极了，恨恨地说：“我真不该养这个孙子！”

铁木迭儿为人阴险贪虐，被人们比作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的阿合马。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当年曾察知他的罪行，下诏将他逮捕审讯。他却躲到答己的亲信内侍家里避风。爱育黎拔力八达知道母亲在包庇他，好几天闷闷不乐，但也无可奈何，只有下道诏书，罢免他的宰相职位，将事情不了了之。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第四天，答己就直接下令，恢复铁木迭儿的相位。他一重新上台，就以“违背太后旨意”、“接诏书时态度不恭敬”一类罪名，接连诬杀了好几个反对过他的正直大臣。

元英宗硕德八剌在太皇太后答己和权臣铁木迭儿的联合攻势下，一开始只能被动防守，以后就逐渐部署反击了。他任用大批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罢免了一批依靠特权、窃踞要津的蒙古、色目官员。他任命有“蒙古儒者”之称的拜住为左丞相，以限制铁木迭儿的权力。

至治二年（1322年），答己、铁木迭儿都死掉了。元英宗硕德八剌下令追查铁木迭儿的贪污案，追夺其官爵、抄没其家财，并处死了一批追随铁木迭儿作恶多端的官员。

铁失是铁木迭儿的死党。他当过宣徽院使，这是一个负责皇室生活供给的官职。他以此为阶梯，受到答己的宠用，以后又兼任了皇室侍卫亲军的都指挥使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御史大夫。元英宗硕德八剌曾寄希望于他，对他说：“朕住在深宫，不能深入了解臣子们的行为和百姓的疾苦，要靠你们这些人当耳目。过去，铁木迭儿贪得无厌，你们都不予揭发。现在，他虽然死了，朕也要抄没他的家产，以对后来的人有所警诫。”铁失听了，心里有鬼，十分不安。

至治三年（1323年）秋天，元英宗硕德八剌从上都出发，准备回到大都去。上都一向是保守派蒙古贵族势力盘踞的据点；当年阿里不哥发动对元世祖忽不烈的叛乱，其根据地就在上都。铁失怕元英宗硕德八剌整顿朝政的利刃加到自己头上，决定利用上都的“地利”，先下手为强，除掉硕德八剌。那天晚上，元英宗硕德八剌住宿在上都以南30里的南坡店。铁失纠集了一批对他心怀怨恨的守旧贵族——其中就有铁木迭儿的儿子锁南——发动政变。他们冲进硕德八剌的住宿地，杀掉宰相拜住。铁失亲自闯进硕德八剌的幄殿，动手杀害了这位年仅21岁的皇帝。

铁失等人拥立封地在漠北高原的晋王也孙铁木耳为帝，史称泰定帝。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刚即位时，任命铁失为掌管天下兵马的枢密使。这也孙铁木耳论起辈份来，是元英宗硕德八剌的堂叔父。他在即位诏书里，含糊其辞地说道：“现在，我的姪皇帝升天了。”但这个姪皇帝到底是怎样“升天”的，他必须对天下有所交待。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即位后，仍留驻自己的封地。一个月后，他派人到大都将杀害元英宗硕德八剌的铁失等人正法，这些人的子孙也同时被诛戮，家产一律被抄没。

皇帝走马灯

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当了5年皇帝，于致和元年（1328年）死去，年36岁。此后5年间，元朝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皇帝；可以说是创造了封建社会

政治动荡的一项纪录。

泰定帝也孙铁木耳是在出巡上都期间病死的。他死后，丞相倒刺沙将他9岁的儿子阿速吉八立为皇帝（史称天顺帝），并匆匆忙忙地在上都举行即位仪式。

大都与上都，历来是两个对立、竞争的政治中心。留守大都的军事统帅燕铁木儿对皇位的继承有他自己的一套打算。燕铁木儿曾追随元武宗海山十多年，是海山一手提拔的宠臣。他约集了一批宗室贵族及心腹部将，策划了一次宫廷政变行动。他们把大都的文武官员集合到兴圣宫议事。会议进行过程中，这伙人突然亮出隐藏在官袍下面的兵器，气势汹汹地说道：“按照祖宗正统，应当立武皇帝（指海山）的儿子当皇帝。要是有哪一个是不同意的，我们就宰了他！”文武官员猝不及防，相顾失色，只有在胁迫下表态同意。燕铁木儿带兵驻进宫内，全盘指挥各项军政行动。为了防备不测，他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办公；一个多月中，贴身带着武器，以坐着打盹代替睡觉。

这兴圣宫，是当年元武宗海山专门为母亲答己修筑的宫殿。答己为了让硕德八剌继承皇位，对海山的两个儿子作了精心安排，长子和世璠被封为周王，指定的封地在云南；次子图帖睦尔被赶到海南琼州（今海口）。后来，和世璠辗转到了西北边陲，定居在扎颜、斡罗斡察山一带（在阿尔泰山以西）；图帖睦尔被迁来迁去，此时正留驻在江陵（今湖北荆沙）。按照继承顺序，应该由和世璠当皇帝。但他定居的地方太远，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赶回大都。燕铁木儿唯恐夜长梦多，决定改立图帖睦尔。他秘密派人到江陵去迎接这内定的皇帝，表面上却不露声色。他召回一些罢官、退休的军官，发给他们符牌，叫他们听候调遣。这些人接过符牌，不知道怎样谢恩才对头，一个个瞪眼望着燕铁木儿，想他给一个“说法”。燕铁木儿叫他们面向南方跪下谢恩。人们这才猜到不久要做皇帝的是老二，而不是老大。

图帖睦尔来到大都后，对劝他即位的大臣们谦让了一番：“我大哥还在北边，我怎么敢打乱上天安排的次序呢！”燕铁木儿劝他：“时机紧迫，间不容发！万一错过时机，后悔就来不及了！”图帖睦尔同意先行即位（史称元文宗），不过在即位诏书中，他明确表示：“等到大哥一回来，朕就把帝位让给他。”

元文宗图帖睦尔有两个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一是要让上都的阿速吉八取消帝号；二是要准备向西北边陲的大哥让出帝位。

上都方面已派出大军直扑大都。元文宗图帖睦尔准备亲自出城督战。燕铁木儿连忙劝止：“陛下下一出战，百姓就会惊惶。请把剪灭匪寇的事情都交给我去办。陛下赶快回宫，好让百姓心安。”燕铁木儿身先士卒。在一次战斗中，他劈伤敌方副统帅阿剌帖木儿；在另一次战斗中，他冲锋陷阵，杀死7名敌将。上都方面屡战屡败。倒刺沙只得去衣露体，投降请死。小皇帝天顺帝阿速吉八逃亡。他的母亲，泰定帝也孙铁木耳的未亡人弘吉刺氏被燕铁木儿掳去当了老婆。

为了示信于天下，元文宗图帖睦尔接连派使者去迎接大哥和世璠。和世璠在西北诸王的欢呼拥戴声中，启程向大都进发。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间，和世璠在和宁（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一带）即皇帝位，史称元明宗。他效法父亲元武宗海山的榜样，立弟弟图帖睦尔为皇太子，并叫图帖睦尔派来劝进的使者回去传话：“弟弟，你过去喜欢读书学习，现在可不要荒废了啊！处理政事后的空闲时间，你要多接近贤明的士大夫，同他们一起讲论史

籍，了解古往今来的治乱得失。”元明宗和世璠小时候就被祖母答己看出是个不简单的人，此时，他一面温情脉脉地与图帖睦尔叙兄弟之情；一面下令，叫大都的各中央机构向他禀报机密，请示政务，并规定：“如果违背了我的意旨，一定加以处罚，决不宽赦！”

这年8月，元明宗和世璠一行到达王忽察都（今河北张北县北）。他是延祐三年（1316年）被答己遣发出都的，一别13年，世事沧桑，他又以皇帝的身份回到故土，大都的城阙宫殿已遥遥在望。图帖睦尔以皇太子的身份出都城迎接他。兄弟俩执手相看，泪眼朦胧；群臣也无不既悲且喜。元明宗和世璠设宴招待弟弟及各位亲王、大臣，气氛一片温馨祥和。但是，到了第五天，就传出了和世璠暴死的消息，这时，他还只30岁。人们纷纷传说，和世璠是被他弟弟毒死的。

元文宗图帖睦尔重新坐上皇帝的宝座。心怀不满的，被流放边远之地；跳出来指责他谋杀兄长的，被以“大不道”的罪名处死。在即位诏书中，他把哥哥暴死的原因归结为：经历坎坷、长途跋涉、蒙犯霜露、心理冲击；把自己再当皇帝的缘由解释成：“天命所在，诚不可违”。但他也只当了五年皇帝就病死了，年仅29岁。在和世璠的儿子元惠宗受欢帖睦尔当皇帝期间，图帖睦尔被指控为“谋为不轨，使明宗（即和世璠）饮恨而崩”；他的牌位被从太庙中撤除。

权臣燕铁木儿计划立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儿子燕帖古思为帝。图帖睦尔的妻子弘吉剌氏，耳闻目睹几代皇帝的曲折隐秘，心情十分复杂。她权衡再三，决定还是按叔侄相承的规矩行事，立和世璠的次子懿璘（音 yì lín）质班为皇帝，史称元宁宗。

元宁宗懿璘质班是个7岁的小孩子，前后只做了53天皇帝就死了。死之前四天，他刚刚来得及办成一件事：册立让他当上皇帝的婶娘弘吉剌氏为皇太后。

燕铁木儿再次向这位皇太后提出：立她的亲生儿子燕帖古思为帝。弘吉剌氏再次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立元宁宗懿璘质班的哥哥，元明宗和世璠的长子受欢帖睦尔为帝，史称元惠宗，又称元顺帝。她提出的理由是：“皇帝的位置极端重要，我的儿子年纪太小了，挑不起这付担子。受欢帖睦尔13岁了，立他当皇帝妥当些。”但是，一个13岁的孩子又能够挑起这付担子吗！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元帝国恰巧亡在这个受欢帖睦尔手上。但弘吉剌氏已经来不及看到这一切了。六年之后，当元惠宗受欢帖睦尔追究他叔叔谋杀他父亲的旧事时，并没有放过于他有恩的婶娘。她的尊号被撤消，并被流放到东安州，不久就在那里不明不白地死去。

荒淫糜烂的亡国之君

元朝末代皇帝元惠宗受欢帖睦尔的母亲罕禄鲁氏是西北边陲一个部族首领的女儿。元明宗和世璠定居于边境地区时，为了取得当地部族的支持，娶了罕禄鲁氏。养下受欢帖睦尔，宫廷中有一种传闻，据说是和世璠的正妻八不沙放的风，说受欢帖睦尔并不是和世璠亲生的孩子。

至顺元年（1330年），11岁的受欢帖睦尔被流放到高丽（今朝鲜），安置在一个叫大青岛的海岛上，过了一年实际上相当于单人囚室中的犯人般的

与世隔绝的生活。第二年，又被转送到静江（今广西桂林）。

元宁宗懿璘质班死后，妥欢帖睦尔被内定为皇位继承人，被专使从静江接往大都。到了大都附近的良乡，燕铁木儿率领仪仗队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燕铁木儿驱马与妥欢帖睦尔并行，向他说明迎立他当皇帝的安排。妥欢帖睦尔心里害怕这个相貌冷峻、权势煊赫的人，张口结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这倒使燕铁木儿犯了疑。他把妥欢帖睦尔即位的日期一拖再拖，总想找个由头，改立别人当皇帝。

燕铁木儿多年来大权独揽，生活荒淫，身体越来越坏。就在这个紧急关头，他小便带血，突然去世。在婶娘弘吉刺氏的主持下，妥欢帖睦尔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

元惠宗妥欢帖睦尔即位后的头几年，朝廷中，右丞相伯颜与左丞相唐其势的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唐其势是燕铁木儿的儿子，又是元惠宗妥欢帖睦尔的皇后伯牙吾氏的哥哥。妥欢帖睦尔信任伯颜，疏远唐其势。唐其势心中愤愤不平，对人说：“这天下本来是我们家的天下。伯颜算什么，竟让他位居我上！”至元元年（1335年），他纠集了一帮死党，企图冲进皇宫，另立一个叫晃火帖木儿的亲王当皇帝。伯颜早有准备，将发动政变的人全部抓获。唐其势被抓住时，死死抱住宫殿的栏杆，不让人将他带走。他的弟弟塔刺海一直跑进宫中，躲在姐姐伯牙吾氏的座位下面。伯牙吾氏用衣服遮住弟弟的身体，想救他一命。但这弟兄俩都没能逃脱性命。塔刺海被士兵们从皇后座位下强行拖出，斩掉脑袋，鲜血溅红了伯牙吾氏的衣服。伯颜对元惠宗妥欢帖睦尔说：“哥哥弟弟一起谋反，皇后还偏袒他们，这成什么话！”他喝令士兵，将皇后也抓起来。伯牙吾氏向妥欢帖睦尔呼救。妥欢帖睦尔翻脸不认人，回绝道：“你哥哥弟弟都造反，我哪能救你！”伯牙吾氏被拖出皇宫，随后，被毒死在开平（今内蒙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一家百姓房里。

唐其势兄弟被杀后，伯颜在朝中专权。这个人十分昏庸残暴。至元四年（1338年），他向元惠宗妥欢帖睦尔建议：把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统统杀光。幸好，妥欢帖睦尔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建议。

伯颜把弟弟的一个儿子从小带在身边养育，这个孩子名叫脱脱。脱脱长到15岁就加入了皇帝的禁卫军，逐渐升为虎符亲军都指挥使、御史大夫。伯颜把脱脱当作自己的得力助手，脱脱却越来越看不惯伯父专横骄纵的行径。脱脱经常向元惠宗妥欢帖睦尔陈述自己忠君忧国的心情；但妥欢帖睦尔不敢轻易相信伯颜的亲侄儿。他派了阿鲁、世杰班两个亲信去同脱脱交往，反复考察脱脱对伯颜的真实态度。脱脱与这两个人结为知交，接受元惠宗妥欢帖睦尔的委托，密谋策划，寻机解决伯颜的问题。

至元六年（1340年）2月，伯颜带领一批卫兵，请元惠宗妥欢帖睦尔出都城打猎。脱脱叫妥欢帖睦尔托辞有病不去。伯颜心存戒备，又提出请太子燕帖古思出都城打猎，实际上是索取人质。脱脱让妥欢帖睦尔答应了伯颜的要求，以解除他的戒心。到了预定的日子，脱脱率军接管了大都各个城门的防务，收缴了城门钥匙。元惠宗妥欢帖睦尔坐镇玉德殿指挥调度。阿鲁、世杰班紧随妥欢帖睦尔，负责传递命令。晚上9时许，他们派太子的亲兵出城，秘密赶到太子宿营地，将他接回皇宫。凌晨3时许，他们派人带着诏书赶到伯颜的驻扎地，宣布调伯颜到河南行省任左丞相。天亮后，伯颜派人到大都城下询问究竟。脱脱高踞城楼，郑重宣布：“皇上有旨，贬黜伯颜一人，其他人都无罪，可以回到本单位继续供职。”伯颜请求面见皇上辞行。妥欢帖

睦尔坚决拒绝，叫他立即动身到河南去。一个月后，伯颜在龙兴路（今江西南昌）的驿舍中病死。

脱脱执政后，元朝的局面有了一些起色，历史上称为“脱脱更化”。但是，脱脱的努力并没有受到元惠宗受欢帖睦尔的支持。他身边的哈麻、雪雪兄弟对脱脱事事掣肘。至元十四年（1354年），脱脱在镇压农民起义的高邮前线被受欢帖睦尔下诏解除兵权。第二年，脱脱被流放到云南镇西（今盈江县东北）。这年年底，哈麻假传圣旨，派人毒死了脱脱。

哈麻是运用极端无耻的手段取得元惠宗受欢帖睦尔的信任和恩宠的。他向受欢帖睦尔推荐了一个西天僧。这西天僧教受欢帖睦尔一套“大喜乐”的房中术。哈麻的妹夫秃鲁帖木儿又向受欢帖睦尔推荐了一个西蕃僧。这西蕃僧又教给这陷入“大喜乐”中不能自拔的荒淫皇帝一套“秘密禅定双修法”，同样是房中邪术。哈麻、秃鲁帖木儿等10人，都被称为“倚纳”，陪着受欢帖睦尔修炼这两套功法。

西天僧被封为司徒，西蕃僧被尊为国师。两个妖僧加上10个倚纳，为元惠宗受欢帖睦尔在民间挑选良家妇女，3人或4人一组进宫“供养”。“供养”时，有16名宫女组成的“十六天魔”跳舞助兴；有太监长安迭不花领队的11名宫女组成的乐队伴奏。“供养”用的秘室称为“事事无碍”。只有这些“倚纳”，据说受过“秘密戒”，才被准许进入“事事无碍”室，侍候受欢帖睦尔受“供养”。

哈麻靠当倚纳，被受欢帖睦尔任命为宰相。他一当上宰相，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觉得羞耻。他对父亲秃鲁说：“天下的士大夫一定在讥笑我，我有什么颜面见人！皇上越来越昏暗，又怎么治理天下！现在皇太子长大了，聪明过人。不如立他为帝，让皇上当个太上皇为好。”哈麻的妹妹在一旁听到了，回去告诉了自己的丈夫秃鲁帖木儿。这个丧失了羞耻感的倚纳跑去向受欢帖睦尔告密。

元惠宗受欢帖睦尔第二天就传旨哈麻、雪雪兄弟，叫他俩用不着再入朝办事，要留在家里听候处理。不久，有旨将哈麻流放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将雪雪流放到肇州（今黑龙江肇源西南）。两个人还没有上路，又有旨将他们处以杖刑；结果双双死在杖下。他们死后，家产被抄没。

此后，除了直接威胁到自己帝位的事情能激起元惠宗受欢帖睦尔的紧急反应以外，他依然是在倚纳们的侍候下，昏天黑地，“事事无碍”地鬼混。南方的农民起义接连爆发，其势如火如荼。大元帝国的末日已经逼近了。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出的北伐军直逼大都城下。7月28日，受欢帖睦尔带着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打开大都北门，向上都方向逃去。8月2日，明兵进入大都城，元朝最后灭亡。

出逃后的第三天，受欢帖睦尔因患痢疾，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朱元璋认为他“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意给了他一个“顺帝”的称号。

挑动黄河天下反

蒙古军事贵族所建立的大元帝国，是一个社会矛盾复杂、危机四伏的帝国。

帝国境内的各民族，被划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作为征服者，最为高贵。

色目（各色各目的意思）人，即最早被蒙古人征服的西域、中亚、西亚各国人，是第二个等级。金朝统治下的汉人，以及女真、高丽、契丹等民族，位居第三。南人，即最后被征服的南宋地区的汉人，被贱称为“蛮子”，是最受压迫的民族。蒙古人、色目人在各级军政机构中，高踞要津。汉人、南人则屈居下僚，不能参与机密。蒙古人打死汉人，交了烧埋银子，再当上几年兵就算了事。汉人打死蒙古人，却要被严加断罪。汉人、南人不能有武器，不能打猎，不得学习武艺，不得集会祠祷，甚至不许可学习蒙古、色目的文字。南人20家编为一甲，由蒙古人当甲主。甲主可以随意向甲内百姓勒索食物、财产，可以任意糟塌百姓的妻女。

南宋遗民郑思肖曾说过，蒙古的王法是人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盗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如男盗女娼。元朝建国后，废除了科举制度，直到皇庆二年（1313年），才由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诏恢复。但蒙古军事贵族对这个制度一直持仇视态度，伯颜当权时，经常对元惠宗妥欢帖睦尔说：“陛下有太子，莫叫他读汉人的书！”有一次，他出门，发现替他牵马的人不在。他一问，才知道牵马人去参加科举考试没回来。他气恼万分，跑到妥欢帖睦尔那里嚷道：“我不料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得了！”由于伯颜坚决主张再废科举，至元二年（1336年），礼部考试停止举行。就是在科举考试正常举行的时候，汉人、南人也受到歧视。蒙古人、色目人考两场；汉人、南人要考三场。蒙古人、色目人的考题简单；汉人、南人的考题繁难。出榜时，蒙古人、色目人是一榜；汉人、南人另出一榜。考中以后，蒙古人、色目人被授予级别高的官职；汉人、南人被授予级别低的官职。

以军事征服起家的蒙古贵族，惯于抢掠勒索，简直不知有廉耻这回事；流风所及，官场腐败透顶。逢节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接手官司要“公事钱”，发传票拘票要“贖发钱”，日常办事要“常例钱”，不办事白要叫“撒花钱”。钱捞得多叫“得手”，谋得一个有肥水的州县官职叫“好地方”，“好窠窟”。这些官场行话听起来像土匪黑话。事实上，在百姓心目中，当官的就是土匪强盗。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解贼（押送盗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差不多）。 ”

浙江温州、台州地方的农民，在村边树起旗帜，旗上赫然写道：“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有造反。直接引发百姓造反的“祸根源”，就是元惠宗妥欢帖睦尔在位期间的“开河”、“变钞”两件大事。

至元三年（1343年），黄河白茅堤决口。第二年，连续下了20多天暴雨，平地水深二丈，黄河白茅堤、金堤决口。农田被淹，盐场被毁，房屋倒塌，瘟疫流行，民不聊生，政府财政收入也遭到巨大损失。宰相脱脱决定修治黄河。至正十一年（1351年），15万名强征来的民工，在两万名士兵的监督下，开进了治河工地。民工劳役极重，待遇很低，又累又饿，还要挨皮鞭、受呵斥。治河工地，怨气冲天，形势紧张。

至正十年（1350年），元朝发行“至正宝钞”。民间使用的“中统宝钞”、“至元宝钞”都要兑换成这种新发行的纸币，叫做“钞买钞”。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政府大量印行“至正宝钞”，弄得物价飞涨。面值50000文的十锭宝钞买不到一斗米。发军饷的宝钞整车整船的往兵营送，士兵领了饷却买不

到什么东西，因为市场上拒绝这种“至正宝钞”的流通，民间又恢复了物物交换的贸易方式。

元朝建立以来，民间一直流行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秘密宗教。白莲教来源于佛教的净土宗。净土宗主张念佛行善，把“往生净土”标榜为修行的最终目标。“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楼观宫阙，庄严富丽；殿前的水池中，盛开白色的莲花；“白莲”的教派名就来源于这个传说。元朝末年，民间流行的秘密宗教组织，有南北两个系统，分别以彭莹玉、韩山童为领袖。

彭莹玉，又叫彭翼、彭和尚、彭祖，元朝官方则叫他“妖彭”。他是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人，10岁到慈化寺出家，随主持寺院的老和尚姓了彭。15岁那年，袁州瘟疫流行。彭莹玉在南泉山发现一股矿泉水，病人喝了泉水，有很多得以痊愈。“彭和尚”于是名声大噪，被百姓看作活神仙。彭莹玉凭借这一名声，在袁州传教。每到晚间，他点起火炬，集合信徒，烧香拜佛，然后由他宣讲佛法。他传授的修行方法就是念弥勒佛号。这是弥勒教的传统修行方法。

在彭莹玉点起的火炬旁，袁州的百姓逐渐组织起来，他们称彭和尚为“彭祖”，又推举彭祖的得意徒弟周子旺为头头。至元四年（1338年），是农历戊寅年。袁州白莲教徒约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起兵反元。参与其事的5000人，背上都写有“佛”字，以祈求保佑。这次举事，是元末农民起义大潮前的一次预演。这5000人的队伍，因为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刚一动手，就被袁州的地方军队镇压下去，周子旺被杀，彭莹玉逃亡到淮西。在教徒群众的掩护下，他躲过了官府的搜缉，又秘密地在淮西民间点起传教的火炬。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家世代都是白莲教的教主。他的祖父以教书为公开职业，被人叫做韩学究。元武宗海山当皇帝时，下令取缔白莲教。韩学究被流放到永年（今河北邯郸东北）。韩山童继任教主时，这一系统的白莲教组织已遍及河南及江、淮一带。脱脱划定的治河工地正在这一片地方。

韩山童派人到处传唱一句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又派了几百名教徒到治河工地当挑夫，深入到15万名被强征而来的民工中间，发展白莲教徒。他秘密地组织几个骨干教徒用石头凿了一个独眼人，背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两行字。他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偷偷将独眼石人埋到预计要开挖的黄河河道的泥土中。过了几天，挖河的民工从泥土中掘出了这个独眼石人，在场的人个个惊诧不已。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传遍了工地，传遍了中原地区。

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韩山童聚集3000教徒，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白鹿庄打出反旗。他们杀白马黑牛，祭告天地。在他们发布的文告中，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第八代孙子，义军大将刘福通是宋朝抗金名将刘光世的后代。3000义军，头裹红巾，被人称为“红军”，因为烧香拜佛，也被称为“香军”。猎猎招展的战旗上写着他们的战略目标：“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颍州县官得知这一消息，带兵包围了白鹿庄。韩山童猝不及防，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到武安（今河北武安）的深山躲避起来。刘福通带着一批人，浴血苦战，冲出重围。突围的红军，直扑颍州，攻下州城。

元朝政府派出 6000 名阿速军向颖州反扑。“阿速军”是由色目人组成的精锐部队，本来素以骠悍著称。但他们在城市驻防多年，养尊处优，战斗力已丧失殆尽。此时刘福通已迅速聚集起 10 多万红军。阿速军将领一看敌方人多势众，转身就跑，口中还连声喊道：“阿卜！阿卜！”（快跑！快跑！）阿速军兵败如山倒，农民起义军初战获胜。

独眼石人挑动了天下，秘密宗教传教的火炬已成燎原之势，要把蒙古军事贵族的统治在熊熊大火中焚毁。

“天完”压大元

袁州起义失败后，彭莹玉转入地下，在淮西一带秘密传教。刘福通的红军兴起时，彭莹玉秘密传教已历 14 个年头。在这 14 年中，他培养出两个能担当大事的门徒：邹普胜和倪文俊。

邹普胜是黄州麻城（今湖北麻城）人，是一名铁匠。倪文俊是黄州黄陂（今武汉黄陂）人，是一个渔民，外号“蛮子”。邹普胜为人沉稳，有心计，善计谋。倪文俊为人豪爽，有武艺，水上功夫尤其了得。

蕲州罗田（今湖北罗田）有一个布贩子，名叫徐寿辉。此人长得魁梧健壮，仪表堂堂，但为人朴拙，才能平庸。徐寿辉往来于蕲州、黄州之间做生意。一天，在山里面捡到一块 10 斤重的鉴铁。他把铁带到麻城，想找铁匠将铁打制成锄头和钯子。他走进的铁匠铺的主人正是邹普胜。徐寿辉把铁块交给邹普胜，说明来意，就闷声不响地蹲在铁砧上，等着邹普胜升起炉子，为他打制农具。邹普胜仔细打量着客人，心里有了一个主意。他对徐寿辉说道：“现在的天下，还用得上锄头钯子吗！我把这块铁打成一把剑送给你，这才是你用得着的东西啊。”徐寿辉听出他话中有话，就同他攀谈起来，两人结成了朋友。

邹普胜向彭莹玉报告了徐寿辉的情况，建议道：“这个人生有异相，推出来当头头，一定能让众人心服。”彭莹玉自己也同徐寿辉见了面，决定在教徒们面前把徐寿辉说成是弥勒佛转生的人，命里注定是人世间的帝王。

至正十一年（1351 年）8 月，即刘福通颖州起义后的三个月，彭莹玉等人在蕲黄地区举起了义旗。这支义军也头裹红巾，历史上称为西路红军。徐寿辉是这支义军名义上的领袖。这年 10 月，徐寿辉称帝，将国号定为“天完”。“天”是“大”字上加一横，“完”是“元”字上安宝盖。“天完”就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天完国是元末农民起义军建立的第一个农民政权。邹普胜是天完国的国师。天完国的中央行政机构叫“莲台省”。“莲台”就是西方净土中的莲花宝台。

彭莹玉没有在天完国里担任官职。他只是以“祖师”的身份对天完国的政策予以指导。他规定天完军要纪律严明，不杀百姓，不奸淫掳掠，要经常口念弥勒佛号。他还规定，天完军每攻克一个城池就将官府仓库中的金帛运走充为军费，归附的百姓要予以登记，天完军要保证他们安居乐业。

天完国的疆域迅速扩大到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彭莹玉一直随军行动，战斗在最前线。至正十二年（1352 年）7 月，彭莹玉转战于杭州、徽州一带。这一带是江南富庶繁华之地，元政府调集大量兵马救援。彭莹玉在战斗中牺牲。

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宽彻普化被封为威顺王，镇守武昌（今武汉市武

昌)。武昌是华中重镇，天完国同元军在这里进行了反复的争夺战。这一带江河浩荡，湖汊纵横，正是倪文俊率领水军用武的好地方。至正16年（1356年），宽彻普化决心与天完国水军决战。他集中了40多艘战船，自任统帅，他的儿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分头指挥，王府里的妃妾随船行动。这支庞大的船队行至汉川（今湖北汉川）鸡鸣汊，迷失航道，搁了浅。倪文俊下令火攻。吃水浅的木筏上满载芦苇，引燃火后顺水向宽彻普化的船队冲击。宽彻普化全军被歼，接待奴、佛家奴被杀，报恩奴自杀，王府妃妾全部被俘，宽彻普化只身逃往陕西。

倪文俊麾下有名大将，叫陈友谅。陈友谅是沔阳（今湖北仙桃）人，也是打渔人家出身。他曾在元朝当过县吏，郁郁不得志。蕲黄起义爆发后，他投奔天完国军中，从军中小吏做起，一步步爬到领兵元帅的位置。倪文俊与宽彻普化决战时，天完国的首都正定在汉阳（今武汉市汉阳）。鸡鸣汊大战发生在汉阳附近。倪文俊的胜利，无疑对巩固天完国政权有很大作用。徐寿辉、倪文俊都兴高采烈，陈友谅却另怀鬼胎。他怀恨倪文俊，认为他太骄横专擅，他又瞧不起徐寿辉，认为他太庸碌颡顽。倪文俊也的确骄横专擅，鸡鸣汊大捷后，他居功自傲，想取徐寿辉而代之，没想到被陈友谅告了密。倪文俊慌忙逃回黄陂老家。陈友谅借着徐寿辉的名义追赶到黄陂，将他杀掉。

陈友谅一步步把持了天完国的朝政，觉得再用不着借徐寿辉这个“转世的弥勒佛”的名义行事了。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带兵攻打太平（今安徽当涂），裹挟徐寿辉同行。攻下太平后，陈友谅志得意满，下了杀掉徐寿辉的决心。徐寿辉住在战船中，战船停泊在采石矶附近的江面上。陈友谅假装上船向徐寿辉禀告军务。谈话正在进行时，一名站在徐寿辉身后的武士，手持铁挝，向徐寿辉后脑砸去。

徐寿辉一死，陈友谅就迫不及待地要当皇帝。他临时指定采石矶上的五通庙为行殿。为了腾出位置，叫士兵们匆匆忙忙地把庙中供奉的五显公神像搬出来，乱七八糟地堆在庙门外面。他坐在五显公的位置上，接受跪在江岸上的部下将领的朝拜。想不到天公不作美，仪式正进行时，下起了大雨。煞有介事地穿上礼服的将领们一个个被淋得透湿。仪式只得草草收场。

陈友谅将“天完”的国号取消，改国号为“汉”。这个汉国的首都定在武昌。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率水军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决战。陈友谅中了流箭，箭头贯穿眼眶，直入颅腔。陈友谅当场身亡，汉国的水军也全军覆没。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率军攻入武昌，汉国灭亡。

弥勒教国

中国是一个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历代皇帝对宗教大都实行宽容、利用的政策，允许各种宗教存在，但又不规定任何一种宗教为“国教”。元末农民起义所建立的农民政权中，有一个政权实行了专奉一种宗教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显得独有特色，这就是明玉珍建立的大夏国。

明玉珍是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长得身材高大，又像项羽一样，目有重瞳。他家世代代是种田人，他却认为种田是区区小事，自己要干一番大事。刘福通起兵颍州的消息传来，随州一带的地主颇为震惊。他们推明玉珍出头，召集了1000多人，组织了一支维持地方秩序的队伍。不久，徐寿辉等人又在离随州不远的蕲黄一带举事，建立天完政权。徐寿辉派人约请明玉

珍“共图大事”。明玉珍归顺了天完政权，被封为征虏大元帅，镇守沔阳。元将哈麻秃率军来攻，明玉珍迎战，被流箭射中右眼。在那次战斗以后，明玉珍又有了一个“明瞎子”的称号。

至正十四年（1354年），沔阳遭受水灾，粮食绝收，百姓以菱角鱼虾为生。明玉珍率10000多名士兵，驾驶着50多艘船到四川买粮食。明玉珍部署得当，部队纪律严明，给四川百姓留下很好的印象。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元朝政府军往往要依靠地方地主武装，即所谓“义兵”配合协同。四川行省右丞相完者都当时镇守重庆，出榜募兵。至正十七年（1357年）辰州（今湖南沅陵）的义兵元帅杨汉带领5000义兵应募，驻扎在重庆的江北。完者都想并吞这支队伍，在招待杨汉的宴席上将他杀掉。杨汉部下的将士决心复仇雪恨，他们投奔正在巫峡峭粮的明玉珍，向他报告了重庆城中兵备单弱的情况。明玉珍将部队一分为二，一半将武装收购的粮食运回沔阳救荒；一半溯江而上，攻打重庆。重庆元军在兵临城下之际，惊恐万分。完者都乘着夜色逃往果州（今四川南充）。行省左丞相哈麻秃率兵迎战，被明玉珍活捉。“明瞎子”派人将哈麻秃押往汉阳，献俘于徐寿辉，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明玉珍趁胜挺进，占领了四川全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皇帝。明玉珍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说道：“我与陈友谅都是天完国的臣子，他怎么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陈友谅派人来，叫他出兵东下，共同攻打朱元璋。明玉珍断然拒绝，愤愤地对使者说道：“他陈友谅能当皇帝，我就不能当皇帝吗！”

泸州（今四川泸州）方山有一位著名的隐士，叫刘禎（音zhēn）。明玉珍亲自进山拜访他，向他咨询天下大事。刘禎向他分析了当时各割据政权的形势，劝他即位当皇帝，以维系人心，维护四川全境的安定。明玉珍听了他的话，十分欣赏，感慨地说：“我得到了一个诸葛亮！”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为“大夏”。这个大夏政权有两怪：一怪怪在官制；二怪怪在宗教。

大夏国的官制是按周礼拟定的，叫的都是两千多年前的周朝旧名。如冢宰、宗伯、司马、司空、司徒、司寇等等。

大夏国取缔了佛教、道教，下令军民都要信弥勒教，全国各地都要建弥勒佛堂。

弥勒教同白莲教一样，也出自佛教的净土宗。弥勒教得名于弥勒佛。据佛教经典说，释迦牟尼佛涅槃前曾预言，再过若干年，有弥勒佛出世。弥勒佛一出世，这个苦难的世界就会变成一个乐园，山青水秀，鸟语花香，人寿年丰。从隋、唐一直到宋、元，宣传“弥勒佛出世”一次又一次地被造反的农民当作舆论动员、思想统一的最好手段。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等秘密宗教基本上已打成一片，混在一起。明玉珍是应徐寿辉之召而进入农民起义军行列的。徐寿辉死后，明玉珍为他建了祠庙，春秋奉祀。徐寿辉被彭莹玉宣传为弥勒佛转生。明玉珍考虑到这些历史渊源，就把“弥勒教”定为国教。

明玉珍在四川当了5年大夏国皇帝，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病死，年仅36岁。临死前，他嘱咐臣下：不要妄想进攻中原，不要与各个邻国发生冲突。要依靠四川险要闭塞的地形，守住这一块江山。

明玉珍永久割据四川的遗愿当然不可能实现。明洪武四年（1371年），

明将傅友德、廖永忠等攻陷重庆、成都，平定四川全境，大夏国灭亡。

朱元璋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濠州（今安徽凤阳）人，生于致和元年（1328年）。朱家祖籍沛县（今江苏沛县），同汉高祖刘邦是老乡。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佃农，一辈子受田主的欺侮剥削。朱五四有四子二女，朱元璋是最小的一个儿子。这个小儿子，从小贪玩撒野，有主见，敢担责任，好支使人，在小伙伴中是头头脑脑的人物。

至正四年（1344年），淮西接连闹旱灾、蝗灾；灾荒过后，又继之以瘟疫。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朱五四夫妻，还有他们的大儿子朱重四都得瘟疫死去。朱元璋的三哥朱重七早已给别人家当了上门女婿，两个姐姐也已出嫁。在困苦穷愁的生活中，两个姐姐，还有二嫂三嫂也死了。这个家里只剩下大嫂、二哥朱重六，侄儿朱文正和朱元璋（朱重八）四人。家里没有钱买棺木，也没有地埋葬尸骨，四个人束手无策，相对痛哭。好心的邻居刘大秀老俩口可怜他们，把自家的地送了一块给他们安葬亲人。朱重六、朱重八两兄弟把尸骨用破衣衫包裹好，抬到刘家地头。突然间，雷鸣电闪，风狂雨骤。两兄弟瑟瑟缩缩地躲在树下，等雨过后，再到地头一看，三具尸体没了踪影。原来，刘家的地在一处山坡下，山洪暴发，挟上带泥，一下子就把尸体埋住了，这就是所谓“天葬”。

大嫂带着侄儿投奔娘家，二哥朱重六出外逃荒，17岁的朱重八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行童。行童是寺庙中的僧侣的仆人，干的是寺庙中的杂活。一天，老鼠啃坏了供在佛像前的大红蜡烛；长老怪罪朱重八，把他责骂了几句。朱重八心想：庙里塑有伽蓝神像，伽蓝神是佛国中专管殿宇的；老鼠啃蜡烛，伽蓝神不管，倒连累他这个小行童受气，真是没有道理！他向师兄讨来笔墨，愤恨不平地在伽蓝神像背后写道：“发配三千里”，要判这不负责的伽蓝神到三千里外充军。

皇觉寺有一二十个和尚，靠向租种庙产“常住田”的佃农收租过日子。灾情严重租米收不上来，和尚们也只得出外云游，讨一条活路。朱重八当了50天行童后，戴上一顶破箬帽，背上包袱，敲着木鱼，也走上了这条变相乞讨的道路。直到至正八年（1348年），他才又回到皇觉寺来。

朱重八云游的地方，也正是彭莹玉传播弥勒教的地方。那时，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等秘密宗教已打成一片，向教徒们宣传的是明王出世，弥勒降生；天下要大乱，大乱过后，将出现一个美好、太平的极乐世界。这些观念，深深印进这个血气方刚的“和尚”的脑海。

至正十一年（1351年），颍州起义、蕲黄起义先后爆发，红军迅速兴起。从大都到江南，到处都在传唱：“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魔军”就是红军。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军占领了朱重八的家乡濠州，濠州红军的头目是郭、孙、俞、曾、潘5个元帅。朱重八童年时代的伙伴汤和参加了郭元帅（郭子兴）率领的红军，还当上了红军的千户官。他从濠州城托人给朱重八捎信，动员他赶快来入伍。

朱重八读过信，顺手在佛殿的长明灯焰上把信烧掉。他在大殿上踱来踱去，下不了决心。好心的师兄偷偷提醒他：“红军中的人来信的事已有人知道了，正要向官军告发，你可得赶快逃走！”朱重八到村里找他童年时的另

一个伙伴周德兴合计，周德兴也认为只有投红军才是一条活路。朱重八想潜回寺里，在佛像前问个签，再作定夺。还没到山门，一股烟焰气味就直扑过来。定睛一看，皇觉寺已经化为一片瓦砾。原来，元军怀疑这里是弥勒教的据点，把它一把火烧掉了。朱重八呆了一阵，朝着还没烧化的铜佛像磕了头，转身就朝濠州城方向走去。

朱重八在郭子兴队伍里当了兵。他在操练、哨探中表现出色，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兵九夫长，调到帅府当差。他办事勤快、细心，说话得体，又粗通文墨，很快成了郭子兴的体己心腹。郭子兴收养了老友马公的女儿，由他的第二夫人张氏拉扯大。夫妻俩人都爱重朱重八，将马氏许配给他。从此，军中称他为朱公子，他改了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

朱元璋以他童年伙伴为骨干，招募淮西的家乡子弟，拉起一支700人的队伍，被郭子兴任命为镇抚，随后又升为总管。至正十五年（1355年），郭子兴又派他为总兵官，镇守和州（安徽和县）。26岁的朱元璋奉命总兵，心知诸将不会服气。但他胸有成竹，决心用自己的才干来建立威信。

在召集诸将开会前，朱元璋撤去大厅上总兵官的座位，只摆上一条长凳。开会时，他故意迟到。诸将已先在凳上坐定，只留下最左边一个空位。当时，按蒙古习俗定座次，右首为尊。诸将把靠右的位子坐了，留左边的位子给朱元璋坐，明摆着是没将他放在眼里。朱元璋也不计较，只是提出议题，要大家商议。这些人只会冲锋陷阵，对军情大计却拿不出办法。朱元璋却条分缕析，侃侃而谈，干净利落地将事情一一处置妥当。随后，在修理城池时，他宣布实行分段包干，他和诸将一样，各自包下一段城墙，负责组织施工。三天后，检查进度，他负责的城段如期完工，其余诸将都没完成任务。朱元璋这时沉下脸来，宣布了郭子兴派他总兵的命令。他吩咐摆好总兵官座位，严肃地向诸将宣布道：“现在把话说明白，既往不咎，再有不遵军令的，就要严格执行军法，可顾不得弟兄情分了！”诸将只好谢罪。

郭子兴病死后，朱元璋被任命为左副元帅。任命是由小明王发出的。小明王就是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至正十五年（1355年），他被刘福通从武安山中接出，拥立为皇帝，国号为宋。

小明王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任命郭子兴的小舅子张天佑为右副元帅。元将福寿买通红军中的一个叫陈桎（音y）的人，杀掉郭天叙和张天佑。这两人死后，朱元璋就成了全权指挥郭子兴旧部的都元帅。

朱元璋军事集团的北面有小明王，东面有张士诚，西面有徐寿辉的割据政权，为他隔开了元朝的主力军。朱元璋利用这一地利，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打下徽州（今安徽歙县）后，他向当地著名的儒生朱升咨询大计。朱升回答他9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也就是：巩固后方，发展经济，不干树大招风的事，伺机再谋图帝王之业。

朱元璋按照朱升建议的战略部署，稳步地走向皇帝的宝座。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他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消灭了陈友谅的主力；第二年灭汉国，自立为吴王。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他派廖永忠把当过自己顶头上司的小明王从滁州（今安徽滁州）接出来。廖永忠半路上把小明王坐的船弄沉，将他淹死，宋国也就此灭亡。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攻下苏州，活捉张士诚，灭掉吴国。这一年，他又派出军队北伐。一年后，北伐军攻入大都，大元帝国灭亡。

1368年正月，北伐军正在胜利地向大都推进之际，朱元璋在应天（今江

苏南京)即位当皇帝,国号“大明”,这一年被定为洪武元年。

“大明”这个国号,叫人回想起当年皇觉寺的和尚朱重八所投奔的红军同“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的教义的关系,叫人回想起当年郭子兴旧部的都元帅同“小明王”的君臣关系。回想起这些关系,在当时可以起到一种特别的维系人心、团结内部的作用。但朱元璋并不愿意人们长久地回想起这些关系,更害怕有人再用“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的一类传说动员百姓,危及他的子孙的皇权统治。在当皇帝的第一年,朱元璋就颁发诏书,禁止邪教,特别是明教、白莲教和弥勒教。这同明玉珍在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后,奉弥勒教为国教,恰好形成一个有趣的、鲜明的对照。

皇权极峰

朱元璋是一个权势欲极强的人。他当上皇帝后,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独裁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达到极峰状态。

元朝把全国划分为11个行中书省。行中书省有丞相,掌管一省的军、政、财权,号称“无所不统”。朱元璋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曾被小明王封为宋国的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他那时俨然是一省之内的万岁爷,根本没有把小明王放在眼里。朱元璋当然不容忍再有什么行省丞相在大明国的疆域内对他闹独立性,于是,洪武九年(1376年),他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布政使作地方长官,但职责仅限于行政。同布政司平行的,有按察司,设按察使,掌管司法,有都司,设都指挥使,掌管军政。三司互相牵制,都直接对中央负责。

朱元璋当皇帝初期,中央还设有中书省,丞相是中书省的首长,中书省总管天下政事,丞相统率百官。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当上了中书省的丞相。胡惟庸原来是朱元璋当都元帅时的一个帅府奏差,靠着小心谨慎地侍候朱元璋,又有李善长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一步步爬上高位。他一意专行,经常径自处理人命生死、官员升降等重大问题,不向朱元璋报告。看到内外各衙门的报告中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他就擅自扣压下来,不转呈朱元璋。他拉帮结伙,收受贿赂,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他的儿子骑着快马在闹市上横冲直撞,不小心摔了下来,跌死在一辆路过的货车前。胡惟庸迁怒于拉车的人,把他抓起来杀掉泄愤。朱元璋本来就为大权旁落而怀恨在心,就抓住胡惟庸这件滥杀无辜的事大发脾气,要他为车夫偿命。胡惟庸连连谢罪,承诺出钱抚恤死者家属。朱元璋这次算是放过了胡惟庸。胡惟庸本已蓄有异心,这件事发生后,他更加紧了阴谋活动。

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一天,胡惟庸向明太祖朱元璋禀告:“臣家住宅后院有一口井突然涌出泉水,味道甘甜如酒,这真是国家的祥瑞!请陛下驾临观看。”朱元璋答应了,带着一群官员出皇宫西华门向丞相府进发。丞相府离西华门不远,宫内有一个守西华门的太监叫云奇,已探听到胡惟庸“谋大逆”的消息,只是还没找到机会向朱元璋告发。他一听说朱元璋要到丞相府去,就急急忙忙跑去阻挡。他气喘吁吁地赶上队伍,顾不上礼节,冲过去就抓住朱元璋的马缰绳。云奇本来说话就有点大舌头,加上心情一紧张,更说不清楚。朱元璋一向明令禁止宦官干预宫外的事情,又恼火他冲撞了自己的出行,喝令左右把他扯下去责罚。一时之间,挝捶乱下,云奇被打得奄奄

一息。他挣扎着用手指着丞相府的方向，朱元璋猛然明白过来。朱元璋返驾回宫，登上皇城高处向西华门外的丞相府俯视，发现府内埋伏着很多披甲带刀的壮士。他紧急调遣锦衣卫，把胡惟庸抓了起来。胡惟庸受到抄家灭族的处置。

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的事为鉴戒，决心下令废除中书省，有设丞相；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朱元璋实际上是以皇帝的身份又兼任了宰相，独揽大权，不受任何制约。

权力大了，事情也就更加繁忙了；光是每天的奏疏，就够朱元璋看得头晕目眩。有人统计了朱元璋洪武十七年（1384h）9月14日到21日的活动日程，发现他平均每天要看200多件奏章，要处理400多件事情。

朱元璋刚当皇帝时，全国的军队由大都督府统领，他任命自己的亲侄儿朱文正当大都督。在废中书省的同时，朱元璋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颁发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利在兵部尚书手上。但不管是都督府，还是兵部，都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带兵的统帅。这样，军权也被皇帝牢牢控制住了。那个当过大都督的朱文正，后来被朱元璋加上一个“亲近儒生，胸怀怨望”的罪名，下令活活鞭打至死。

对自己的亲侄儿尚且如此，对其他的功臣更是大开杀戒。永嘉侯朱亮祖，同他儿子朱暹一起，也是被活活鞭打至死的。江夏侯周德兴是朱元璋的童年伙伴。他的儿子周骥被人揭发有同宫中妇女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朱元璋杀周骥的同时，把周德兴也杀掉了。魏国公徐达是开国功臣第一人，又是朱元璋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为人老成持重。朱元璋找不出任何岔子整他，但就是想要他的命。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背部长毒疮，患这种病的人，最忌吃发物。朱元璋却派官员到他府里赐蒸鹅。徐达老泪纵横，当着官员的面吃下蒸鹅，几天后，毒发而死。另一个朱元璋童年伙伴信国公汤和，眼见一个个功臣不得善终，主动提出解除兵权，告老回乡，朱元璋让他平安病死，算是格外开恩。

对功绩卓著的开国元勋尚且如此，对一般的官吏儒生的任意杀戮就可想而知了。朱元璋当过和尚，又是造反起家的，所以，特别忌讳“僧”与“贼”一类字眼。臣下的奏章、贺表里，明明是拍他马屁的“睿性生知”、“体乾法坤”、“作则垂宪”、“天下有道”等话语，在他读起来，却变成了“僧智”、“发髡”（剃掉头发）、“作贼”、“有盗”；于是有关的人统统被杀掉。杀得官员个个胆战心惊。礼部出面，求他给个说法，到底该怎么写才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朱元璋颁布了一个《庆贺谢恩表式》，官员们奉行惟谨，不敢有一点差错。朱元璋有个下意识的习惯，心里一想杀人，两手就把腰间的玉带掖到肚皮下面；满朝官员一看到他这个动作，就会吓得面无人色。朱元璋坚持早朝制度，朝官天不亮就得起床梳洗穿戴，赶着在黎明前进宫参加早朝。许多人出门以前，就郑重地向妻子诀别，安顿好后事；活着回来了，阖家都欢喜雀跃，庆贺他又多活了一天。在这种气氛下，许多人逃避当官；朝廷去征召，千方百计推托不就，已经做了官的，想方设法辞掉。朱元璋又大骂这些人不肯帮朝廷作事，是“大不敬”的行为，也要杀掉。

对官吏儒生尚且如此，对一般平民百姓的任意杀戮就更可想而知了。有一年的元宵节，朱元璋微服出行，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猜谜语。有一则谜语是画谜，画的是一个形容丑陋的农妇，赤着一双大脚，两手捧着一只大西瓜；

谜底是一句俗语：“淮西（怀西）妇人好大脚”。朱元璋的皇后马氏正是淮西人；马氏是回族人，不缠脚，正好又是一双大脚。朱元璋认为这是在拿皇后开玩笑。第二天，派兵到那一带，把住在那里的老百姓统统杀掉。

朱元璋杀人的手段特别残酷。凉国公蓝玉是因为谋反的罪名被处死的，用的是剥皮的酷刑。皮剥下来后，当中填上草，传示各省。蓝玉的女儿是蜀王的妃子。这张皮传到四川时，她央求丈夫向朱元璋启奏，把皮留下来，由她保存。明末张献忠攻进蜀王府，还看到这张人皮。贫苦老百姓为了逃避赋税劳役，流窜到寺庙里当和尚。朱元璋把他们视为“顽民”，下命令：挖一个大坑，将他们活埋，土埋到脖颈，把头留在土面上，15个人排成一列。然后，他又叫刽子手挥起大斧，贴着地面扫过去，一下子就砍掉好几个脑袋。这种酷刑，被叫做“铲头会”。

朱元璋这个登上皇权极峰的专制皇帝，又是一个杀人魔王。杀人过多，他自己也有些神经质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5月4日，雷电大作。一道道闪电划破长空，电光燃成火球在宫中飞舞。当时正在谨身殿里的朱元璋觉得那火球仿佛直向他扑来，吓得他跪下来，望着天空，向唯一能凌驾于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上的老天爷请求宽恕：“陛下赦臣，臣赦天下！”

朱元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终年71岁。同他一起在淮西参加红军起义的伙伴，活得最长的是汤和，终年

“靖难”之变

明太祖朱元璋有26个儿子，长子朱标被立为太子，除第9子和第26子早死外，其余23个儿子都被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

太子朱标为人老实忠厚，长期接受儒家教育，满脑袋是周公、孔子之道，讲仁政、讲慈爱。朱标的老师宋濂的孙子宋慎被牵连到胡惟庸的案子中，朱元璋想就势把宋濂也杀掉。朱标哭着为老师求情，朱元璋对他吼道：“等你当了皇帝，自己去赦他！”朱标吓得要投水自杀，被左右救起。由于马皇后也出面说情，朱元璋没杀宋濂，宋濂被流放到茂州（今四川茂汶），第二年就惊吓而死。朱标经常劝他父亲：“陛下杀人太过分了，恐怕伤了和气！”朱元璋叫人拿来一条刺杖，放在殿前地上，叫朱标将它捡起来。朱标看到上面满是尖刺，面有难色。朱元璋开导他道：“你怕有刺就不敢拿。我替你吧刺去掉，你不就好拿了吗！我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坏人杀光了，你才好当这个家。”朱标嗫嚅着回答：“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皇帝是个什么样，百姓就会跟着是个什么样。朱元璋气得抡起坐椅就向他掼。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标病死，朱元璋立他16岁的儿子朱允炆（音wén）为皇太孙。这时，朱元璋已经65岁了，看到朱允炆除了像朱标一样仁弱外，又多了一分稚嫩，朱元璋不禁忧从中来，头发胡子都很快急白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撒手而去，朱允炆即皇帝位，史称明惠帝。朱元璋在世时，规定亲王进京正式朝见时，按规定向皇太孙行礼，朝见后，到了内殿，就按家庭辈分相处。亲王们都是朱允炆的叔叔，没把这个年轻、孱弱的侄儿放在眼里。特别是几个有战功的亲王，手中握有兵权，擅自招兵买马，搜罗异人术士，私制兵器，偷印宝钞，什么都敢干。明惠帝朱允炆在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的辅佐下，采取措施，打击嚣张跋扈的亲王；一年之内，削除了周、湘、齐、代、岷5个亲王爵位，其中，湘王朱柏

自焚而死。

亲王之中，危险性最大的是燕王朱棣。他身材魁梧，为人精明，作战勇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同晋王朱櫝（音 g ng）一起带兵征讨元朝的残余势力乃儿不花。队伍在沙漠、高原行军。朱櫝胆怯，不敢深入。朱棣带兵抄小路直扑乃儿不花盘据的迤都山，将其部全歼。明太祖朱元璋得到捷报，大为欣喜，命令他统帅北部边疆的军马。他拥兵自重，不轨行为最多。明惠帝朱允炆不敢轻易对他动手；对其他五个亲王的行动，不过是扫清外围，最终目的还是要拔除朱棣这个钉子。

燕王府中有个长史叫葛诚，被朱棣派到南京办事。惠帝朱允炆召见葛诚，向他询问燕王府的有关情况。葛诚一一如实报告。朱棣为了迷惑朱允炆，装着得了重病。盛夏天气，他抱着一个小怀炉取暖，还做出打寒战的样子，连声叫冷。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两人奉惠帝朱允炆的密令，以探病的名义，前往燕王府考察虚实。葛诚告诉他们：燕王是装病。张昺、谢贵两人知道，朱棣装病，一定另有图谋。他们命令手下的士兵严密把守北平的九个城门，准备捉拿朱棣。张昺手下有个管仓库的小官，名叫李友直，偷偷向朱棣报告了北平军政当局计划，朱棣也暗中作好了准备。

建文元年（1399年）7月6日，惠帝朱允炆派人到北平逮捕燕王府的几个官校。朱棣假意把这几个官校捆绑好，押在王府的院子中，叫人禀告张昺、谢贵，请他们来将人犯带走。张、谢两人被哄进燕王府，一进端礼门，就被伏兵抓住。朱棣将他俩杀了，又派兵占领了九个城门，正式开始了他对南京中央政权的反叛行动。

朱棣把自己的反叛起了一个名字，叫“靖难”。其根据是明太祖朱元璋《祖训》中的一段话：“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他说，他要惩罚是齐泰、黄子澄这样的奸臣，他的行为是替皇帝平定（靖）朝廷中的混乱（难）。

当年雷震谨身殿，明太祖朱元璋吓得向老天爷求饶，事后还亲自到郊庙举行祭天祷告的仪式。为了得到老天爷的关照，朱元璋挑选的陪祀官员都是当了九年以上的官，从来没有犯过错误的人，齐泰就是被挑中的一个。他本来叫齐德，“泰”这个名字就是那次陪祀时，朱元璋特赐的。黄子澄在洪武18年（1385年）的会试中考了第一名，又是朱允炆当皇太孙时的老师，一贯主张对拥兵自重，威胁中央政权的亲王采取严厉扼制、严加打击的措施。这两个人实在是朱允炆的“忠臣”，只是对军事都是外行。

黄子澄推荐曹国公李景隆统帅50万大军对朱棣作战。朱棣侦知李景隆的军事布置后，笑着说：“兵法有‘五败’，这李景隆都犯了。为将政令不修，上下异心，此其一。北平冷得早，南兵穿的都是布衣，不能披霜冒雪，而且粮草也不充足，此其二。情况不明，轻率深入，急于求胜，此其三。不具备仁勇智信的品德，刚愎自用，管理不善，威令不行，此其四。队伍乱糟糟，喜欢奉承，专用小人，此其五。他‘五败’全犯，必败无疑。”李景隆果然屡战屡败，最后单骑逃回南京。惠帝朱允炆只是免去了他的大将军职务，并不加以惩办。黄子澄认识到自己推荐错了人，痛哭流涕。他请求朱允炆杀掉李景隆，以激励将士。朱允炆不听。黄子澄抚着胸口，长声叹息：“大事去矣！我推荐李景隆，误了国家的大事，万死也不足赎回这罪过啊！”

建文四年（1402年）6月，朱棣大军渡过长江，直逼南京城下。朱棣的弟弟谷王朱橞（音 huì）与李景隆负责金川门的防务。燕兵一到，两人开门迎

降。

南京陷落以后，皇宫燃起了大火。太监们从宫殿的废墟中找到惠帝朱允炆的尸体。朱棣下令将朱允炆尸体埋葬，自己则登上皇帝宝座，成为明朝历史上的第三个皇帝，史称明成祖。但在朱棣及其子孙当皇帝时，一直把朱棣说成是第二个皇帝；说起朱允炆当皇帝的那几年，不称“建文”（朱允炆年号）多少多少年，而称“洪武”（朱元璋年号）多少多少年。朱元璋在洪武31年就死了，在明代的官方文献上却有洪武三十二年直至洪武三十五年。

齐泰、黄子澄被明成祖朱棣灭了九族。方孝孺更被朱棣灭了十族。方孝孺是宋濂最得意的学生。宋濂是明朝的“开国文臣之首”；方孝孺也是洪武建文年间的文章泰斗。朱棣的谋士姚广孝留守北平。朱棣出发前，姚广孝特意叮嘱他：“攻下南京，抓住方孝孺，请您千万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就断绝了！”朱棣筹备登基，把方孝孺从狱中放了出来，命令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穿着为朱允炆致哀的孝服，放声大哭，断然拒绝起草诏书。朱棣威胁道：“你不写，我就灭你的九族！”方孝孺回答道：“你就是灭我的十族，我也不写！”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囊括了一个人的所有直系旁系亲属。朱棣当着方孝孺的面，把他的九族一个个处死，然后又用凌迟的酷刑把方孝孺处死。方孝孺死后，朱棣还不解恨，又把他的朋友门生作为第十族，统统抓起来杀掉。方孝孺一案，被杀掉的人有873个。

被灭九族的还有其他一些忠于惠帝朱允炆的朝臣。为了防止漏网，捉人抄家时，首先抄出家谱，然后按家谱上开列的姓名再去抓主犯的九族。左拾遗戴德彝在南京被杀死时，家属亲戚都在奉化家乡。他嫂子项氏听到了消息，赶快通知家人亲戚，叫他们赶紧外出躲避。戴德彝的两个儿子藏进深山。项氏又把家中收藏的族谱资料全部焚毁。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被抓到南京。在严刑拷打下，她一句话也不说。戴氏家族这才得以保全。

三宝太监下西洋

明成祖朱棣虽然当上皇帝，心里却并不踏实。太监们从宫殿废墟中背出的尸体，烧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识。南京城里流传着关于惠帝朱允炆去向的种种说法：有的说他逃到寺庙里当了和尚，有的说他藏在民间，有的说他躲进深山，更有的说他远走海外，流亡西洋。当时所谓的“西洋”，指的是亚洲南部与非洲东部的沿海国家和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南洋”。

为了查明朱允炆的下落，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不断派出亲信，在天下州郡乡邑明察暗访，还派遣郑和率领规模宏大的船队，蹈海踏波，远巡南太平洋及印度洋周边地带，完成了航海史上“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壮举。

郑和的祖先原居西域，后来搬迁到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本姓马。他家世代代信奉伊斯兰教；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到麦加朝拜过伊斯兰教的天房克尔白，被尊称为“哈只”（意即“朝圣者”）。有人曾考证出，郑和的37世祖就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

郑和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大将傅友德进军云南，消灭了元朝的残余势力梁王政权。12岁的郑和成为明军的俘虏，被阉割后，拨到燕王府邸听用。郑和聪明机敏、吃苦耐劳，得到朱棣的宠信；又在“靖难”战役中立了军功，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内官监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皇宫24衙门之一，职权范围相当于政府的工部和吏部两个部。

永乐二年（1404年）的大年初一，郑和在朱棣跟前当差；朱棣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给他为姓；于是，穆罕默德的后裔，马哈只的儿子在历史上以“郑和”这个名字为人们所传颂。

郑和既笃信伊斯兰教，又接受了佛教的“菩萨戒”，是一名佛教徒。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因此，人们称他为“三宝太监”。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他率领的船队由62艘大船组成；每艘船长44丈、宽18丈；船上的外交、贸易人员及军官、士兵共有27800多人。

永乐四年（1406年），郑和的船队到达麻喏八歇国。这个国家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占领军将他们拘捕，杀了170多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急于对麻喏八歇国进行报复。郑和冷静地调查清楚事件的经过，判断这是误杀，而不是挑衅，严令部下不得轻举妄动。西王得知部下杀了大明国的出使人员，十分惊惧惶恐。他派人向郑和请罪。郑和决定采取和平解决问题的方针，奏明明成祖朱棣，由朱棣下诏，一方面谴责了西王军队鲁莽的行径；一方面又表示，只要西王能承担责任，给予赔偿，就不再予以追究。两年以后，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再次到达麻喏八歇国。西王向郑和支付了10000两黄金的赔偿费。这笔赔偿费由西王使者解送到北京，礼官验收，发现数量不足；报告给明成祖朱棣，并建议将麻喏八歇国的使者抓起来问罪。朱棣在处理这件事情时，也表现了泱泱大国的高姿态。他对礼官指示道：“朕对于远方的外国人，只要求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过，并不再犯就行了，哪里会去计较他们赔偿费的多少呢！”朱棣接见了使者，表示大明国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从那以后，他或者一年一次，或者隔年一次，专门派遣使者到北京进贡；两国之间，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

从爪哇向西航行，如果遇上顺风，八天八夜就可到达旧港。旧港就是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当时是三佛齐国的领土。元末明初，有很多华人飘洋过海，来此定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广东潮州人陈祖义犯了法，带领全家逃到旧港。陈祖义为人凶暴。他纠集了一帮海盗，横行海面。三佛齐农业发达，旧港又是一个商贸中心，人称“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自从海盗为患，商业萎缩，与中国的正常往来也受到阻碍。

郑和到达旧港后，派人到陈祖义处，责令他改邪归正。陈祖义见郑和船队声势浩大，不敢冒犯，假装向郑和认罪请降，暗地里却定下了偷袭郑和船队的计划。这个计划被旧港的华人施进卿知道了。施进卿立即报告给郑和。郑和马上布置船队官兵，作好应战准备。陈祖义偷袭的船队一到，就陷入了郑和船队的包围圈。经过一番激战，10艘海盗船被烧，7艘海盗船被俘，7000余名海盗被歼。陈祖义被活捉，后又押送到北京处死。施进卿被明成祖朱棣封为旧港宣慰使。

在“西洋”一带，暹罗是一个强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暹罗有一种恃强凌弱的霸道作风。占城国派使者到北京进贡，回国途中，所乘船只被颶风吹送到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彭亨当时是暹罗的辖地。暹罗王将占城使者扣留，不准其回国。暹罗王还派兵到邻近的苏门答刺、满刺加两国，将明朝赐送给两国国王的印诰抢走。明成祖朱棣得知这些情况后，责成郑和在下

西洋途中相机处理。永乐六年（1408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途经暹罗，向暹罗王宣读了朱棣的诏敕。在诏敕中，朱棣斥责了暹罗王的霸道行为，敦促他马上放还占城使者，将印诰归还给苏门答刺、满刺加，告诫他“从今以后，要遵奉天意、讲道理、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同邻国和睦相处，这样才能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暹罗王自知理亏，向郑和保证照敕办理，又派使者到北京进贡，向朱棣表示谢罪。此后，这一地区长久保持了和平与安宁。永乐九年（1411年）满刺加国王为了感谢明朝主持正义公道的行为，趁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之便，亲自率领了一个540多人的使团，随同郑和的船队，到北京朝贡。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到过锡兰山。锡兰山的国王亚烈苦奈儿对明朝的使团态度傲慢。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不计前嫌，又去访问锡兰山。亚烈苦奈儿假意予以接待，将郑和一行骗到国都。亚烈苦奈儿的儿子纳颜出面向郑和索要金银宝物。郑和拒绝了纳颜的非份要求。亚烈苦奈儿恼羞成怒，一面将郑和一行困在城中，一面点起50000名番兵，前往劫击郑和的船队。郑和率领随从冲出城外，发现归路已被砍伐下来的树木阻塞。郑和向随从官兵分析了形势：“贼人的大兵已去袭击我们的船队，都城里面必然空虚。他们以为我们是‘客军’，一定孤立无援，胆小怕事，不会有什么作为。我们如果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一定能夺得胜利！”他派人抄小路赶回船队，向留守船队的官兵传达命令：尽死力抵挡住来袭的番兵。他亲自带领2000名随从官兵，转回头来，向锡兰山国的都城发动攻击。这“都城”其实不过是一圈土城，在明军的凌厉攻势下，用不了多久，就被攻破。明军活捉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头目。袭击船队没得手的番兵，得知国王被擒，急忙返回，包围了郑和的部队。这些番兵也是乌合之众，被由城中冲出的明军顷刻间打得兵败如山倒，作鸟兽散。郑和将亚烈苦奈儿一行押送回北京，向明成祖朱棣献俘。朱棣原谅了这个鲁莽而又愚蠢的国王，将其释放，命令礼部官员在一同被俘的头目中挑选出一个开通贤明的人，立为锡兰山的新国王，送回国去，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寻访明惠帝朱允炆的下落，好让明成祖朱棣安心当皇帝。这七次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架起了横跨南亚、东非的友谊之桥，促进了中国及亚、非有关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七次大规模的远洋航行，表现了我国作为当时世界上头号强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也表现了儒家传统文化精神指导下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的美好风范。

仁宣之治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孙子朱瞻基先后继位。朱高炽就是明仁宗；朱瞻基就是明宣宗。在历史上，明仁宗、明宣宗常常被比作周朝的周成王、周康王，汉朝的汉文帝、汉景帝。继“成康之治”、“文景之治”之后，“仁宣之治”是又一个守成君王的好典型。所谓“好”，指的是能继承创业君王的遗志，较好地治理国家。

明仁宗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就被册立为燕世子，成为燕王朱棣的法定继承人。明太祖朱元璋曾叫朱高炽与秦王、晋王、周王的三位世子分头检阅卫士。朱高炽最后一个回来向朱元璋复命。朱元璋

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朱高炽回答道：“早晨的天气冷得很。我让军士们吃饱早饭，暖过身子再检阅，所以回来晚了。”朱元璋又叫这四位世子分头阅看臣子上呈的章表奏文。朱高炽在向朱元璋汇报时，只讲章表奏文中有关军民利害的事情，从来不提其中偶尔出现的文字谬误。朱元璋把他看过的章奏拿过来，自己又看一遍，把那些谬误一一指给他看，问道：“孙儿，你没看出这些毛病么？”朱高炽回答道：“我哪敢疏忽粗心，看不出这些毛病呢！只是想，不能絮絮叨叨地讲这些小毛病，那样会浪费您的时间和精力。”朱元璋曾问他：“尧的时候有大水灾，汤的时候有大旱灾，老百姓有什么依靠呢？”朱高炽回答道：“老百姓靠的是当君王的是圣人，圣人有体恤老百姓的好政策。”经过这几次考察，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孙子，认为他有当君王的见识。

靖难之役中，朱棣命令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带兵去迎战辽东军的进攻。朱高炽严密部署、拼死守卫；前来进攻的李景隆面对坚城，无可奈何。李景隆的部下瞿能率精骑千余，杀入张掖门。李景隆怕他得了头功，不但不派兵支援，扩大战果，反而叫他退回来，等候大军全到后，一起进攻。朱高炽当天晚上，命令北平守军担水浇城。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整个北平城墙成了一道冰墙。第二天，李景隆再来攻打，士卒已无法攀城。朱棣击败辽东军后，回师北平，与朱高炽内外夹攻南军，大败李景隆于北平城下。

在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的次子朱高煦也立有大功。白沟河战斗中，朱棣差一点被瞿能抓住。朱高煦率数千精锐骑兵赶到，在阵前杀掉瞿能，救出朱棣。朱棣领兵直逼长江，被盛庸击败，又是朱高煦引骑兵赶到，击退盛庸，扭转了战局。朱高煦居功自傲，把自己比作助李渊得天下的秦王李世民。朱棣叫朱高煦陪同他哥哥朱高炽拜谒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朱高炽身体肥胖，脚又有毛病，得靠两个太监搀扶着才能走路，还动不动要打个趔趄。朱高煦在后面跟着，心里瞧不起他哥哥，嘴里嘟哝道：“走在前头的人要是摔个交，走在后头的人就知道走路得小心了！”没想到已被朱棣立为皇太孙的朱瞻基在他后面紧跟着，并且马上回敬他一句：“那走在后头的人要是摔个交，还有走在更后头的人也能从中知道走路得小心点。”朱高煦回过头来，与朱瞻基四目相对，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脸上也陡然变了颜色。

朱瞻基是朱高炽的长子。就像朱元璋很欣赏朱高炽这个孙子一样，朱棣也很欣赏朱瞻基这个孙子。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远征沙漠，把留守北京的重任托付给朱瞻基，第二年，就将他立为皇太孙。早在朱瞻基刚满月时，朱棣见到后就称赞他道：“这个孙儿长得英气溢面！”朱瞻基成了皇太孙后，朱棣经常向朱高炽称赞他道：“你这个儿子是以后的太平天子！”当朱高炽、朱高煦两兄弟为皇位继承权明争暗斗的时候，朱棣也拿不定主意了。朱棣向文渊阁侍读学士解缙征求意见。解缙认为：“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不做声。解缙连连叩首，劝说道：“还有一个好圣孙！”意思指的是朱瞻基是以后继承皇位的好人选。这话说到朱棣心里去了。朱棣采纳了解缙的意见，确定朱高炽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

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朱高炽一当皇帝，就对臣下表示：“以前一些当皇帝的人，妄自尊大，不喜欢听直话，下面那些当臣子的，投其所好，阿谀奉承，结果导致国家衰败，自己垮台。朕和你们都应当引以为戒！”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大理寺少卿戈谦，在一次上奏言事时，态度直率，语辞激烈。一些想讨好朱高炽的官员纷纷指责戈谦有失大体，沽名钓誉。朱高

炽也几乎恼羞成怒，要责罚弋谦。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向他指出：“有圣明的皇上，才有正直的大臣。希望陛下优待宽容像弋谦这样的人。”朱高炽没责罚弋谦，但每见到他，脸色总不好看，说话的口气也很严厉。杨士奇进一步向他指出：“弋谦触怒了陛下，朝廷群臣看到陛下对他的态度，心里都会认为陛下容不得讲直话的人。”朱高炽猛然明白过来：“这确实是我容不得直言，那些讨好我的人，迎合我的意思，实际上是加重了我的错误。”他回头一想，一个多月没听到朝臣讲什么真话了，于是对杨士奇说道：“你去对诸臣谈一下，替我表白一下纳谏求言的心情。”杨士奇回答：“我空口讲几句话还不能取信于诸臣，请陛下亲自降一道诏书说明这个意思！”于是，朱高炽下了一道诏书，进行自我批评，从此，朝廷中逐渐形成一种直言无讳的好风气。

明仁宗朱高炽还没有当满一年皇帝就病死了，明宣宗朱瞻基继承了皇位。朱高煦想效法朱棣故伎，重演一场“靖难”的戏剧，在自己的封地乐安（今山东广饶）发动叛乱。朱瞻基率大营五军将士，亲征朱高煦。进军途中，朱瞻基叫从征诸臣分析朱高煦的动向。有人认为他一定先取济南，有人认为他将引兵南下，攻取南京。朱瞻基却心里有数，他对诸臣剖析道：“朱高煦一听大军征战，哪有功夫去攻打防守严密的济南！他的护卫军，家属都在乐安，也不会愿意跟随他去打南京。朱高煦外多夸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当断不断。他之所以敢起兵反叛，是因为欺负朕年少，以为朕不敢亲征。他知道朕率军亲征，一定胆丧心惊，哪里还敢出战呢！”果然不出朱瞻基所料。朱高煦色厉内荏，心虚胆怯，加之看到众叛亲离，军无斗志，只得出城向朱瞻基请罪。这场叛乱被迅速平定。

明宣宗朱瞻基重用贤臣，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有一次外出返京，看到几个农民正在耕田。他亲自到田间同农民谈话，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他感慨地对随从诸臣说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觉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头劳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在修建明仁宗朱高炽的陵墓献陵时，朱瞻基遵照朱高炽的遗嘱，力主俭朴，注意节约，3个月就把陵墓的工程完成了。朱瞻基带了这个头，以后几代明朝皇帝的陵墓都修建得较为俭朴。直到明朝的第11个皇帝世宗朱厚熜在位时，才坏了这个规矩，为自己营建奢华的陵墓。

明宣宗朱瞻基有几句名言。一句是“省事不如省官”。那是在批评一个巡抚时说的。那个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一名专门管理粮政的布政使司官员。朱瞻基认为，国家的赋税有常额，不能养冗官，驳回了他的要求。还有一句是“安民为福”。那是在批评一个工部尚书时说的。那个工部尚书建议修建山西圆果寺的佛塔，好为国家求福。朱瞻基认为，百姓安定就是国家的福气，用不着借修佛塔来“求福”。

河南有一个知县，在当地发生灾荒时，未经请示，就将驿站公粮上千石发放给灾民。朱瞻基对他加以表扬：“如果拘守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饿死了。”他还继承了他父亲愿意接受意见的作风。他要求大学士杨溥尽力辅佐自己。杨溥叩首回答：“臣决不敢忘记报答陛下的恩情。”他嘱咐杨溥：“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

正是由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的作风较为开明，才有了被史家赞扬的“仁宣之治”。

土木之变

明宣宗朱瞻基当了 10 年皇帝，于宣德十年（1435 年）病逝，年仅 38 岁。他的长子朱祁镇这年才只 9 岁。朱祁镇当上皇帝，史称明英宗。在祖母太皇太后张氏的指教下，他任用贤臣，继续执行祖父、父亲较为开明的政策，明朝的国力在他在位的初期，达到全盛。

正统七年（1442 年），张太后去世。明英宗朱祁镇宠信宦官王振。王振是山西大同人。他原来是个学官。明成祖朱棣晚年，下过一道诏令，允许有子嗣的学官，在自愿接受阉割手续后，进宫内当差，教宦官、宫女读书识字。王振就是那个时候进宫的。他在内书堂当了一阵教习后，就被派去侍候东宫太子朱祁镇。王振为人狡猾，很快就赢得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尊称他为“先生”。张太后对这个“先生”早有警觉。朱祁镇刚当皇帝时，张太后把他叫到自己身旁，并叫人将王振唤来。她当着朱祁镇的面，正言厉色地斥责王振：“你侍候皇帝起居，有很多不讲规矩的地方，今天我要赐你一死！”环卫在张太后周围的女官立刻上前，将刀架到俯伏在地的王振的脖子上。朱祁镇赶忙跪到祖母面前为王振说情。张太后这次饶过了王振，但一再叮咛朱祁镇：“皇帝年纪还小，还不知道这种人对家国的危害。我听皇帝说的情，放过王振。此后，不能够让他干预国家大事！”张太后在世时，王振有所忌惮，张太后一去世，王振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劣根性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干预朝政，酿成祸乱，曾在皇宫门上挂一块铁牌，上面铸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11 个大字。王振却公然叫人将这块铁牌摘掉。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是王振的同乡，但他痛恨王振的不法行为，从不与王振往来。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睬王振。王振怀恨在心，指使党羽诬陷薛瑄，将他抓进大牢，问成死罪。驸马都尉石璟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王振怪他辱及自己的宦类，找个由头，将他逮捕入狱。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将王振的罪行写成匿名的小字报，偷偷在京城张贴。王振将他们 3 个人用残酷的磔刑（肢解身体）处死。明英宗朱祁镇在皇宫设宴招待百官，按惯例，宦官身份的王振是不能参加的。王振却敢于大发雷霆，说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朱祁镇听到别人转告这句话，连忙派人补请他。他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

当时，在北方边境，蒙古瓦剌部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瓦剌每年派贡使到北京进贡，实际上，是借此机会，索要财物，如果贪欲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在边境制造事端。正统十四年（1449 年），瓦剌首领也先一下子派了 2000 人以贡使名义到北京，为了多领赏物，冒称有 3000 人。王振处置失当，先是引狼入室，批准 2000 名贡使进京，继则轻率敷衍，叫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压低贡使带来的马匹的价格。瓦剌部的首领也先十分恼怒，向明朝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

王振鼓动英宗朱祁镇亲征，想侥幸取胜，建功立业。大臣们纷纷劝阻，朱祁镇鬼迷心窍，根本不听。这位 23 岁的青年皇帝，在王振的挟持下，率领 50 万大军，匆匆忙忙从北京出发。

大军出发没几天，后勤补给就跟不上来了。军中闹起饥荒，许多士兵饿倒路边。老天也不作美，连日风风雨雨，道路泥泞难行。随驾官员见势不妙，

力主回京。王振认为他们扫了自己的兴头，罚他们顶着风雨，跪在路边的荒草丛中思过。

半个月后，英宗朱祁镇一行抵达大同。前方传来先行与也先交战的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振心里一惊，又仓猝决定“班师”。王振的庄田在蔚州（今河北蔚县）。他想请朱祁镇到自己府第走一趟，借此炫耀自己的权势，于是，指挥部队向蔚州方向撤退。走了40里地，王振忽然想起，眼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人马杂遯，踩坏庄田中的庄稼就太不合算了，于是，又仓猝下令，改道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么折腾了上十天，英宗朱祁镇一行退到土木堡。土木堡在怀来（今河北怀来）城外20里。王振不指挥部队进城据守，却命令大军驻扎土木堡，等候辎重车辆到齐后再继续后撤。也先的瓦剌军第二天就追到，将土木堡重重包围。土木堡地势高，挖地两丈也见不到水。明军士兵饥渴难耐，战斗力丧失殆尽。第三天，也先假意讲和，瓦剌部队佯装后退。王振中了圈套，下令移营取水，全军乱了阵脚。也先指挥瓦剌的精锐骑兵四面掩杀，明军兵败如山倒。英宗朱祁镇突围不成，干脆下马盘膝而坐，眼睁睁地等着瓦剌人把自己抓去当俘虏。王振为乱兵所杀。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震惊，百官痛哭。人们首先把愤怒集中到造成这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身上，他的亲信死党都被抓起来杀掉。在抄他的家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擅权7年，搜括到手的金银财宝竟堆满了60多间仓库，玉盘有上百只，高六七尺以上的珊瑚有20多株。

也先抓到了英宗朱祁镇，当成可居的奇货。他押着朱祁镇到宣府城下，胁迫朱祁镇传旨叫守城将士开门出迎。守将杨洪、罗亨信立于城头，向朱祁镇传话：“我们所守的是陛下的城池，现在天色已经晚了，不敢奉诏！”也先见用朱祁镇的名义赚不开城池，就改而用这个俘虏皇帝的名义勒索财物。朱祁镇被迫写了一封信，派一个一道被俘的卫兵送到怀来城中。怀来守将又连夜转送至北京。朱祁镇名义上的母亲孙太后接到来信后，把皇宫中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搜罗起来，用八匹骏马驮着，送到也先营中，想赎回儿子。也先当然不肯放人，他要把朱祁镇攥在手里，捞取尽可能多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好处。

皇帝被敌人抓去当了人质，这个国家还怎么能维持下去呢！北京城里的政府官员，人心惶惶，人情洶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人说：“天命已去，只有迁都到南方，才能躲过灾难！”有的说：“文皇（指朱棣）把都城迁到这里，这是子孙世代不能变动的大计，决不能再把都城迁回南方！”兵部侍郎于谦的意见最为斩钉截铁，他说：“谁主张南迁，就应该斩谁！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大家难道不记得宋朝南渡的教训么？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迅速召集各路勤王兵马，下定决心，死守京城！”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官员的赞同，也得到孙太后的首肯。

在孙太后的主持下，还实行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立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二是任命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音yù）总领百官，主持国家大事。此后不久，为了彻底断绝也先利用朱祁镇要挟明朝军民的念头，大臣们又向孙太后建议，立朱祁钰为帝。朱祁钰表示推辞时，于谦正色劝道：“我们都是诚心诚意地担忧国家的命运，绝没有什么个人考虑，也决不是为什么个人打算。”朱祁钰也从也先营中秘密托人捎话，要朱祁钰继承帝位，以维持皇统。在这种情况下，朱祁钰终于同意即帝位，并举朱祁镇为太上皇帝，史称朱祁钰为明代宗。

经过这一番政治上的整顿，明朝的大局才稳定下来。以于谦为中流砥柱的明朝军民，团结一心，决心抗击瓦剌军的入侵，保卫大明国的江山社稷。

夺门之变

在中国历史上，于谦是民族正气的代表人物之一。

于谦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他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亲征朱高煦，朱高煦慑于中央政权的威势，出城请罪投降。于谦当时任御史，随同朱瞻基出征。他声音宏亮，言辞流畅，思维敏锐，颇受朱瞻基的赏识。朱高煦投降那天，朱瞻基叫于谦致词声讨朱高煦的罪行。于谦讲得义正词严，气势逼人。跪伏在地的朱高煦听得汗流浹背，战栗不已。随从百官、三军将士听了，个个神情振奋。朱瞻基从此认定于谦是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难得人才。

于谦在山西、河南等地任过巡抚，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中央政府里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史称“三杨”）等大臣对他的工作十分支持。于谦向朝廷建议的事情，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理。他进京办事，从来不向当朝的权贵送礼物、通关节。他居官廉洁自守，不向百姓妄取一物。他从河南巡抚任上回京时，写过一首诗来表明自己的心迹：“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土木之变”后，于谦更成了挽救危亡局面的众望所归的关键人物。朱祁钰摄政时，有一次，群臣集会议事。有人倡议严厉追究王振党羽的责任。王振的死党马顺跳出来对倡议者加以斥责。给事中王竑（音 hóng）按捺不住自己的义愤，冲上前去，揪住马顺的头发，痛斥道：“你一贯仗着王振的势力作威作福，到今天还敢这样嚣张！”其他议事官员也就势拥过来，你一拳，我一脚，将马顺当场打死。当时，现场秩序混乱，朱祁钰不知所措，站起来想避进宫里去。于谦排开众人，拉住朱祁钰，告诉他：“不能走！要因势利导，把局面稳住！”朱祁钰同他紧急交换过意见后，大声向群臣宣谕道：“马顺罪有应得，本该处死。大家要镇静下来。今天的事情就不再追究了。”现场秩序这才恢复过来。此时，于谦身上穿的官袍早已在混乱中被拉裂了口子。会议散后，吏部尚书王直紧紧拉着于谦的手，赞叹不已：“国家这个时候正要依靠您这样处变不乱的人才。”

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后，于谦为他策划了一系列扭转危局的措施，并按照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一再提醒朱祁钰和朝中众臣：“敌寇扣留了太上皇，得志猖狂，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件事上卡住筋，被他们要挟住，不然，他们就会长驱南下，轻而易举地扫荡全中国！”

也先裹挟朱祁镇，大军直逼北京城。总领五军大营的右都督石亨提议收兵进城，坚壁固守。于谦不同意这种战略方针，指出：“这样会显得懦弱，敌人会愈加轻视我们。”于谦以新任兵部尚书的身份，将22万守军分头部署到北京城的九个城门以外，他亲身到德胜门外临阵督战。他把兵部事务交付给侍郎吴宁处理，并下令将九个城门全部关闭。他传令各军：临阵作战，将不顾军，先向后退，就斩将；军不顾将，先向后退，后队斩前队。

也先以朱祁镇的名义要明朝派大臣迎接皇帝的大驾。代宗朱祁钰派了两名小官出城朝见朱祁镇。也先不让他俩见朱祁镇，要他们回去叫于谦、石亨、

王直等大臣来。于谦根本不予理会。也先又提议讲和。明朝朝廷中有些大臣也想讲和，派人到城外军营中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回答道：“事到今天，我只知道带兵打仗，别的事情我一概不听！”也先派兵进攻德胜门外的明军。于谦、石亨在民房中设下伏兵，派出几名骑兵引诱上万名瓦剌骑兵进入伏击圈。于谦一声令下，明军火器齐发，几名瓦剌将领当即中砲身亡。民房中的伏兵呐喊着冲了出来，把瓦剌骑兵分割包围，打得七零八落。德胜门外的居民们登上屋顶，向瓦剌骑兵投掷砖瓦石块。明朝的援军也及时赶到，会歼瓦剌军。这一仗打掉了也先的威风，打灭了瓦剌军的锐气。

明军与瓦剌军在北京城外相持5天。也先在军事上连吃败仗，在政治上也没讨到便宜，又传来攻打居庸关的瓦剌军三战三败的消息，明朝各路勤王兵马也在昼夜兼程向北京进发，也先既沮丧，又惊懼，只得灰溜溜地裹挟着朱祁镇向北撤退。于谦组织指挥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也先退兵后，于谦继续整顿京师防卫力量，并坚决反对与瓦剌议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方和彼方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从道理上讲，不可言和。彼方一向贪得无厌，满足他们的要求，会使我方坐遭损失，越来越弱；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又会制造事端。从形势上讲，也不能言和！”于谦的态度一坚决，也先反倒无所施其伎，只得频频派遣使者，表示要将朱祁镇送还北京。王直等大臣主张派遣使者将朱祁镇迎回北京。代宗朱祁钰怕哥哥回来，自己做不成皇帝，很不高兴地说：“朕本来就不想当皇帝，当时可是你们这班大臣推戴朕登位的啊！”于谦从容答道：“陛下的皇位已经坐定，不会再有什么别的变故。但从道理上来说，应当从速将太上皇迎回。万一是瓦剌人没有诚意，我方也有话好说。”一番话打消了朱祁钰的疑虑，他连连对于谦表示：“听你的！听你的！”

朱祁镇回到北京后，被朱祁钰送到南宫当个名义上的太上皇。朱祁钰不但无意将帝位让给哥哥，而且还废去朱见深的皇太子封号，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弟兄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天顺元年（1457年），朱祁钰得了重病，性命危在旦夕。提督石亨，都督张軫（音yuè）、副都御使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结成一伙，策划拥立朱祁镇复辟。徐有贞原名徐理（音chéng），“土木之变”后力主迁都南逃，为舆论所不齿。代宗朱祁钰看到报送的官员名单上有“徐理”两字，就觉得讨嫌。徐理为了做官，把名字改成了徐有贞。这徐有贞懂得一点星象，择定正月十六晚上为发功宫廷政变的好时候。这一伙人带领家兵随从来到南宫，用巨木撞开宫门，将朱祁镇接了出来。他们拥着朱祁镇向东华门进发。东华门的守兵不让他们进去。朱祁镇出面对守兵说：“我是太上皇！”守兵这才放行。朱祁镇走进奉天殿，登上皇帝御座。石亨等人击鼓鸣钟，召集百官上朝。徐有贞高声呼叫：“太上皇复位了！”朱祁镇对百官宣布：“景泰皇帝（指代宗朱祁钰）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一夜之间，一场宫廷政变成功了，史称“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

英宗朱祁镇复辟后，毒死了朱祁钰，恢复了朱见深的皇太子位，并在徐有贞、石亨等人的怂恿下，横加给予谦一个“谋逆”的罪名，将其杀害。

于谦遇害后，家产被抄没。抄家的人翻腾几天，也没抄出什么财产。于谦家有一间正房，锁得严严实实的。抄家人打开一看，里面存放的只是代宗朱祁钰赏赐的蟒衣、宝剑。石亨的死党陈汝言接替于谦当了兵部尚书，一年

后，因贪赃枉法被抄家，抄出的脏银有上万两之多。英宗朱祁镇对石亨说道：“于谦死后，家里找不出多余的财产。陈汝言的家财为什么有这么多！”石亨低着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北方边境传来警报，朱祁镇忧形于色。恭顺侯吴瑾说了一句大实话：“要是于谦活着，贼寇就不会如此猖獗了！”朱祁镇听了，默不作声，内心又惭愧，又后悔。

英宗朱祁镇死后，朱见深继承帝位，史称明宪宗。他平反了于谦的冤狱。于谦的遗体葬于杭州西湖三台山。“赖有岳（飞）于（谦）双少保（岳飞于谦均曾得到‘少保’的封号），人间始觉重西湖。”他的英名，永远与神州山河大地共存！

弘治中兴

明宪宗朱见深当皇帝时只有 18 岁，却宠爱一个年已 35 岁的万贵妃。万氏为人机警，善于迎合。朱见深即位不久，立吴氏为皇后。吴后看不惯万妃擅宠骄横的样子，利用自己“母仪天下”的皇后身份，挑了万妃一个错，将她责打一顿。朱见深大为恼怒，废去吴后的皇后封号。万妃此后愈加霸道。她自己生的孩子夭折了，此后不再怀孕；其他妃嫔宫女有孕，她就使坏心眼，硬教她们喝一种药汤，喝过以后，就导致坠胎流产。万妃的父亲万贵，兄弟万喜、万通、万达都当上了锦衣卫的高级军官。这班外戚贪得无厌，他们利用职权，搜罗一些制作奇巧的小玩艺送进宫廷，讨取欢心。同他们有勾结的宦官迎合朱见深、万贵妃的意旨，把国库中的金银财宝大量回赐给他们。给万家运送这些金银财宝的车辆，络绎不绝地行驰在京城的大道上。大学士万安厚着脸皮自称是万贵妃的“侄”。万贵妃的父亲万贵原先不过是县衙门的一个小吏，万贵妃正愁自己家门阀不高，也乐得认了这个“侄”。其实，万安是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万贵是诸城（今山东诸城）人，两个“万”家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万安攀上这门高枝，在宫廷有了内线，从此官运亨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宪宗朱见深对特务活动特别有兴趣。他宠用一个狡猾机敏的太监汪直，专门为他当“包打听”，抓到臣民一点过失，就严加责罚，甚至弄得当事人家破人亡。从朝廷命官到一般百姓，人人自危。杨泰杨勰父子被仇家诬陷，杨勰跑到北京找姐夫董序求助。董序在礼部当个小官，找到汪直手下的太监韦瑛，求他设法解救。韦瑛一边向董序、杨勰勒索大量钱财，一边密告汪直：“杨泰杨勰父子杀了人，带了大笔钱财来京师，想贿赂有关官贝，逃脱罪责。”汪直立刻派人把杨勰、董序抓了起来。他们抄了董序的家，想找出那“大笔钱财”。杨勰随身带的钱，早已被韦瑛勒索干净，抄家的人一无所得。他们严刑拷问杨勰，逼他说出“藏”钱财的地方。杨勰被拷打得死去活来，只好胡乱招供，说钱藏在叔父杨仕伟家里。杨仕伟是兵部的一个小官。韦瑛半夜里带领一帮人闯进他家里，把他捆绑起来审讯，并当着他的面，拷打他的妻子，逼问藏钱财的处所。翰林陈音住在杨仕伟的隔壁院子里。他爬上墙头，目睹了这场暴行，气愤得高喊道：“你们擅自侮辱朝廷命官，难道不怕国法么！”这帮人都是汪直主管的特务机构西厂的成员，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反问道：“你是什么人，难道不怕西厂么！”后来，杨勰在牢中被迫害致死，杨泰被斩首，杨仕伟、董序都被贬了官。

除了宠妃、外戚、宦官以外，宪宗朱见深身边还有一批佞倖小人，妖僧

妖道。江西布政司使李孜省因贪赃事发，本当革职为民，但他学过五雷法、扶鸾术，擅长画符念咒，讨得朱见深的欢心，反而连连升官。他在扶鸾时，装神做鬼，假传神意，说是：“江西人赤心报国”。朱见深居然也相信这“乩仙”的胡言乱语，委托李孜省向他推荐江西人为官。李孜省借此广收贿赂。不少江西籍的人买通李孜省，青云直上，有的甚至当上了宰相。朱见深笃信邪法巫术，封了 240 多个道士当“真人”，780 多个西番和尚当“法王”、“国师”、“禅帅”。这些妖僧妖道在京城里锦衣玉食、作威作福，把偌大一个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

朱见深当了 10 多年皇帝，却总没有一个儿子。有一次，太监张敏为他帑发。他对着镜子，长叹一声：“人都要老了，还没有一个儿子！”张敏朝他跪下，说道：“奴才死罪！万岁已经有儿子了！”朱见深吃了一惊，忙问：“朕的儿子在哪里？”张敏回答：“奴才把事情说出来就活不了，万岁可要为皇子做主啊！”

原来，明军在征讨贺州（今广西贺县）的少数民族时，俘获了一个少数民族土官纪父贵的女儿，把她送进宫里。她知书识字，被分配到内藏（宫内库房）当保管。朱见深有一次偶然到内藏走一走，看上了这位蛮族少女，使她怀上身孕，自己随后却把事情忘了个干净。万贵妃对这类事却特别警觉。她派宫女去查问，想施展故伎，强迫流产。宫女向万贵妃扯了一个谎，说那不是怀孕，是得了痞病。蛮族少女躲过万贵妃的魔掌，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弘治皇帝朱祐樞（音 chǔ）。她不敢抚养这个孩子，叫守门太监张敏将孩子溺死。张敏没有按她的话做，而是把孩子藏起来，秘密抚养。朱见深的废后吴氏知道这件事后，也偷偷地帮着照顾哺育这个可怜的小孩。

朱见深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喜出望外，立刻派人去接儿子。孩子的母亲搂抱着亲生骨肉，泣不成声，嘱咐他道：“我儿一走，我就活不成了。你看见穿着黄袍子，长着胡须的人，那就是你父亲。”她给儿子换上小红袍，长久目送着他坐上小轿子，去认自己的生父。朱祐樞这时已长到 6 岁，一直没有剪过胎发，长长的头发披散到地面上。朱见深抱起他，让他坐在自己膝上，亲切地抚摸，久久地凝视，高兴得流下眼泪，连声说道：“这是朕的儿子，长得真像朕。”万贵妃得知此事，又气又恨。不久后，朱祐樞的生母纪氏突然死亡，张敏吞金自杀。

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朱见深去世。朱祐樞继承帝位，史称明孝宗。那年，他 18 岁。这位血管里流淌着蛮族血液的青年皇帝，颇有一股励精求治的精神，推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历史上称他在位的 18 年为明朝的“弘治中兴”时期。

明孝宗朱祐樞一即位，就采取断然措施，处理了聚集在宪宗朱见深身边的那些外戚、宦官、佞倖、僧道。他在宫中找到一个小竹筐，里面装的是些奏疏。奏疏里面谈的尽是一些“房中术”，署名都是“臣安进”。这个“安”，就是那个在万贵妃跟前称“侄”的万安。万安已 70 多岁了，官居宰相。朱祐樞命令太监怀恩带上这些乌七八糟的奏疏，到内阁去当面斥责万安。怀恩指着那些污秽的文字，问万安：“这是大臣干的事么？”万安伏在地上，脊背上冷汗直淌，答不出话来。怀恩又把其他官员揭发万安问题的奏章念给万安听。这些奏章击中万安的要害，他只得哀求恕罪，但却没有一点

想辞官的表示，真有那么一股“笑骂任你笑骂”的无耻劲头。怀恩念完奏章，走上前去，摘掉万安的牙牌，告诉他：“可以走了！”牙牌是象牙制成的版片，上面写着官衔，是官员身份的标志。

怀恩摘掉万安的牙牌，是在告诉这个老官迷，“你别想再当官了！”

孝宗朱祐樞还规定，除了早朝以外，午饭后，还要举行午朝。每天请有学问的大臣向皇帝讲解“圣贤经旨，帝王大道”。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使皇帝用更多的时间处理政事，接触政府官员，这样，就可避免皇帝受到宫中的妃嫔、宦官的不良影响。

明朝的法律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代制定的，以后又增补了繁多的条例。朱祐樞对条例进行整顿，选择了 290 多条与律并行。这样做，有利于加强法制。他所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一扫宪宗朱见深时代特务横行的恶劣风气。于谦的女婿朱骥是朱祐樞时代的锦衣卫使，朱骥在审理大案时，十分谨慎，从不轻易定人死罪。朱骥的后任牟斌，也保持了这种“宽仁”的作风，挽救了许多被诬陷入狱的人的生命。朱祐樞的皇后张氏，经常为娘家兄弟索要财物田庄，纵容他们为非作歹。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当时任户部郎中，上疏揭发张后弟弟寿宁侯张鹤龄的不法行为。张鹤龄抓住疏中“陛下厚张氏”一句话，诬蔑李梦阳对母后大不敬，罪当斩。张后的母亲金夫人哭着向朱祐樞告李梦阳的状。朱祐樞不得已，下令锦衣卫逮捕李梦阳。李梦阳在狱中得到牟斌的关照，不久即被释放。金夫人又多次纠缠朱祐樞，朱祐樞再也不理会她的无理要求。有人建议处李梦阳以杖刑，好让金夫人解解气。朱祐樞透他们的用心，说道：“你们是想叫我把李梦阳杖毙。我怎么能枉杀正直的臣子来让自己身边的人高兴呢！”

游戏国政

“弘治中兴”的代表人物孝宗朱祐樞于弘治十八年（1505 年）去世。明朝有 16 个皇帝，称得上“好”或“较好”的只有 5 人：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樞。朱祐樞一死，明朝的国势就日益没落。朱祐樞的长子朱厚照继承帝位，史称明武宗。朱厚照即位时，不过 14 岁。此人聪颖、机灵，颇有个性。他以皇帝的身份，干了很多惊世骇俗的事情，为大明帝国走向没落的凄迷路程增加了一点喜剧的色彩。

武宗朱厚照在皇城中的空旷地修建了一座“豹房”。他带着一群宦官、戏子、喇嘛及身怀绝技的术士住进豹房，成天在那里演习武艺，训练猛兽，排练歌舞，海吃海喝。他把宦官编成一支部队，自任将军；又从边镇中挑选精于兵士编成另一支部队，任命亲信江彬为将军。两支部队驻进皇城，天天进行操练。

正德十二年（1517 年），鞑靼小王子怕颜猛可率领 50000 骑兵进犯边境。朱厚照想过带兵打仗的瘾，自己封自己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并用了一个化名“朱寿”，兴冲冲地带兵出京征讨。大臣纷纷谏阻，朱厚照根本不听。队伍来到居庸关，巡关御史张钦关上城门，不让队伍通过。朱厚照下令解除张钦的职务，另外委任宦官谷大用把守居庸关。他给谷大用一个特别指示：朝廷里的官员如果来到居庸关，绝对不能放他们出关，免得他们去找他的麻烦。

朱厚照确实领着队伍同伯颜猛可的鞑靼军打了一仗，明军死了 52 人，重伤 563 人，鞑靼军却只死了 16 人。不过，朱厚照还是宣称自己打了大胜仗，并命令北京城里的官员出城迎接得胜回朝的部队。欢迎的官员必须表现出对皇帝毕恭毕敬的态度，但欢迎队伍打出的标语布幔只能把欢迎对象写成“威武大将军朱寿”。官员们在霏霏雨雪中站立了一整天，天黑下去，才看到朱厚照骑马过来。他接过首辅杨廷和献上的一怀酒一饮而尽，就驰马直抵豹房，根本不去理会那些衣服淋得透湿，腰腿站得酸痛的官员。

第二年，武宗朱厚照又下了一道圣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巡视北方边境。出巡路上，他一会下旨，加封朱寿为“镇国公”，岁支俸米 5000 石；一会又下旨，加封朱寿为太帅（最高级别的文官，负责辅佐皇帝经邦治国）。他的这些恶作剧遭到政府官员的抗议。大学士梁储、毛纪问他：“公虽贵，总还是皇帝的臣子。陛下封自己是镇国公，照例要追封三代，是不是要让祖宗三代的在天之灵也降格为公呢？”杨廷和说得更直率：“威武大将军朱寿到底是什么人？如果并没有这个人，那些加封朱寿的圣旨就是伪造的。伪造圣旨的人，依法应当处以死刑。”

正德十四年（1519 年），封地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朱厚照又下诏，命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帅、镇国公朱寿”统率兵马南征。杨廷和拒绝起草敕谕，并请求辞职，梁储等人请求与杨廷和一道辞职。全体监察官员联名谏阻，朱厚照不加理睬；官员们列队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随后，其他官员也纷纷递上奏本，进行劝阻，形成一种集体示威的局面。朱厚照大为震怒，下令将参与这一事件的 146 名官员每人廷杖 30 下，其中 11 人被打死。

武宗朱厚照玩弄这些恶作剧，自然不能认真处理政事。正德（朱厚照的年号）初年，国家大事实际上被宦官刘瑾等人所把持操纵。刘瑾是兴平（今陕西兴平）人，本姓谈，他走一个姓刘的宦官的路子进宫，冒姓为刘。早在朱厚照当太子时，刘瑾便引着他架鹰牵狗、观舞听歌、摔交角力。博得了他的欢心。朱厚照当上皇帝后，刘瑾为了窃取权柄，总是看准他玩得兴头来了的时候上前奏事。朱厚照只顾自己痛快，哪愿分心去管什么国家大事，朝刘瑾挥挥手，不耐烦地说道：“朕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用？还老来麻烦朕。去！去！”这实际等于向刘瑾授权，让他放手专断独行。当时，文武官员的奏章必须先用红揭呈送给刘瑾，谓之“红本”，然后才能送往掌管接受奏章的通政使司，谓之“白本”。奏章里，谈话中，凡提到刘瑾，只能称“刘太监”，不能直称其名。都察院的公文中误写了“刘瑾”的名字。刘瑾跑到都察院喊话骂街，都御史吓得领着院里的官员向他下跪请罪。官员们出京办事或回京复命，见过朱厚照后，还得去拜见刘瑾。

御史涂桢为官清廉，奉命巡察长芦盐课。刘瑾要涂桢割送当年余盐银两作为对他的“孝敬”，涂桢不从，他就怀恨在心。涂桢回京复命，在宫门口遇上刘瑾，没向他行跪拜礼，他更恨得牙齿咬的格格响。他将涂桢抓进锦衣卫狱中，酷刑折磨，迫害致死。涂桢死了，刘瑾还不罢休，又把涂桢的儿子抓来，充军到肃州（今甘肃酒泉）。南京右都御史张泰进京办事，因为家中清贫，只能送给刘瑾一点土葛布。刘瑾嫌他礼送得薄，借故罢了他的官。有些官员拿不出金银财宝给刘瑾送礼，又所遭受迫害，只好自杀了事。

正德五年（1510 年），安化王朱寘鐸（音 zhí fán）以讨伐刘瑾为名，起兵反叛朝廷。朱厚照任命前右部御史杨一清为总督，太监张永为监军，率

师讨伐叛军。杨一清曾被刘瑾陷害罢官，张永本是刘瑾的帮凶，因为争权夺利，心里也怨恨刘瑾。杨、张两人商议了一个除掉刘瑾的办法。朱寘鐸叛乱平定后，武宗朱厚照设宴慰劳张永。张永在席间向朱厚照呈上朱寘鐸发布的檄文，檄文中揭露了刘瑾的种种罪恶；张永还向朱厚照奏明了自己掌握的刘瑾的罪行材料。朱厚照这才感觉到：“刘瑾负我！”张永趁热打铁，敦促朱厚照：“处理这事不能迟缓！”朱厚照当即下令逮捕刘瑾，第二天，又亲自带人抄了刘瑾的家。除了抄出巨额金银财宝外，还抄出了刘瑾私制的玉玺，私藏的盔甲。在刘瑾随手带在身边的扇子里，还发现藏有匕首。朱厚照下令以磔刑处死刘瑾。许多遭受刘瑾迫害的人，争着向刽子手买刘瑾的肉吃，一小片肉就卖到了一文钱的价钱。

武宗朱厚照杀了刘瑾，却又宠信了两个奸臣：江彬和钱宁。

钱宁也是依靠陪朱厚照吃喝玩乐而得宠的。君臣两人，恰似一对酒肉朋友，形影不离。文武百官天不亮就进宫等候早朝，往往等到太阳西斜还见不到朱厚照上朝。碰到这种情况，官员们就看钱宁来了没有，只要钱宁一出现，朱厚照也就快来了。江彬一开始也是通过贿赂钱宁才受到朱厚照的召见。江彬得宠后，他与钱宁之间又明里暗里展开了争宠的斗争。

江彬在争宠斗争中逐渐占了上风。有一次，朱厚照在豹房里驯虎，老虎却突然不听调理，向朱厚照恶狠狠地扑来。在一旁侍候的钱宁，此时战战兢兢，畏缩不前，江彬却能奋不顾身地上前解救。这件事过后，江彬在朱厚照的心目中的地位格外不同。江彬为朱厚照出了许多坏主意。朱厚照玩弄妇女的丑恶行为，大部分是在江彬的调唆、帮衬下干的。

正德十五年（1520年），朱厚照到南方亲自征讨宁王朱宸濠。班师回朝，路过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附近），他自己驾上一条小船去捕鱼，一不小心，把船弄翻，掉进水里，差点淹死。随从人员慌忙把他救了起来。由于又受凉，又受惊，朱厚照得了重病，第二年，就发展成吐血不止，3月间，死于豹房。

还在死前7年的元宵节，武宗朱厚照在宫中大张灯火，不慎引起火灾，大片宫殿被烧成灰烬。当火烧得正旺时，朱厚照在豹房观火，看着那一片光焰烛天的景象，高兴得呵呵大笑，对左右说道：“这真是一棚大烟火啊！”

综其一生，朱厚照可以说是一个把大明帝国的基业烧成灰烬，当作玩烟火的游戏的人物。

嘉靖宫变

明武宗朱厚照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去世。这个由“正德皇帝下江南”一类的事情渲染得颇有名气的“风流天子”却没有儿子。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召兴献王朱祐杬（音 yuán）的世子朱厚熜（音 c ng）入继帝位。朱厚熜今年还只15岁，即位后改下一年为嘉靖元年，史称明世宗。

明世宗朱厚熜一辈子追求的是得道成仙，长生不老，因此，特别崇信道教，宠用道士。对于道教，朱厚熜的六世祖明成祖朱棣的认识还比较清醒。永乐5年（1407年），朱棣对待臣有过一次谈话：“人要是能清心寡欲，气性和顺，生活规律，自然身体就会健康。道士们的吐纳术、导引功，做一做，对身体会有些益处。但想长生不老，那是办不到的！”朱厚熜却是一个昏庸透顶的皇帝，他又要恣意纵欲，又想长生不老。道士们看准了他的心理，竟

相向他进献一些邪方妖术，讨取他的欢心。

嘉靖十九年（1540年），道士邵元节要为朱厚熹炼什么“先天丹铅”。这种“丹铅”，要用少女初潮的月经做原料。炼制过程，就是残暴地摧残少女身体的过程。被选用当原料供应者的宫女，即使不被折磨致死，也会落得浑身病痛、终生痠伤。明朝中后期，社会风气颓靡腐朽，大臣们多少知道一些炼丹的黑幕，但敢于进谏的却不多。太仆卿（掌管牧马政令的中央官员）杨最冒死上疏，劝止这件事。朱厚熹一怒之下，下诏廷杖。锦衣卫将杨最拖到午门外西墻下活活打死。

朱厚熹后宫里有数千宫女。关于炼丹的种种可怕消息在她们中间早有流传。一个接一个的小姐妹被当作“炼丹原料”，骨枯髓竭，面无人色，身无人形，乃至早早夭折，成为宫中冤魂。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10月21日，朱厚熹在自己十分宠爱的端妃曹氏宫中饮宴嬉乐了一整天，晚上倒在曹妃床上酣然入睡，曹妃自己则避到另一间房歇息。宁嫔王氏和杨金花等10名宫女聚集在东稍间里。她们揣着一颗颗狂跳的心，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决断：“咱们下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

杨玉香就手把存放在东稍间的仪仗上的花绳解下。大家一齐动手，将花绳改搓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绳子。绳子搓好，已经是22日的凌晨。

一行人蹑手蹑脚潜进朱厚熹酣睡的房间。杨金花屏住呼吸，将绳子绕住他的脖子，在喉结前打了一个绳套，一面叫姚淑翠：“掐住脖子，不要放松！”

朱厚熹呼吸粗重，伴着浓浓的酒气，眼睛虽然合上，面孔仍十分狰狞。他脾气暴躁，不要说对宫女如狼似虎，就是他的元配陈皇后，也是有孕在身的时候，被他又打又骂，受惊坠胎，大出血致死。姚淑翠这时一眼望过去，还禁不住颤抖不止。邢翠莲赶忙递过去一条黄绫抹布，示意她将那副凶相用抹布蒙上。这时，邢翠莲、王秀兰分别按定胸部、腹部，刘妙莲、陈菊花分别按住两腿，苏川药、关梅秀分立左右扯住绳子向后拉。没想到，杨金花在慌乱之中系了一个死结；好一阵，绳套也没有收紧。

曹妃宫中另一名宫女张金莲听到动静，过来观看，眼见事情不成，为着顾全性命，急匆匆到方皇后处报信。方后带着几名亲们宫女闯进现场。姚淑翠急忙松了手上前抵挡方后。方后大声喝骂。姚淑翠鼓起勇气，打了方后一拳。王秀兰叫离灯柱最近的陈菊花：“吹灯！”灯一熄灭，房中漆黑一片，乱成一团。方后带来的宫女总牌陈芙蓉跑去喊来值班太监张佐等人，亮起灯火，将杨金花等10名宫女，连同宁嫔王氏，端妃曹氏抓了起来。

朱厚熹已被勒得昏死过去。方后召来的御医，相顾失色，不敢用药。太医院使许绅当时主管太医院，责任所在，不得不硬起头皮，调配了一付猛药给朱厚熹服下，这时已是清晨7时许。许绅大气不敢出地守候到下午1时许，才听到朱厚熹喉咙格格作响，吐出好几升紫血，渐渐苏醒过来。许绅出了一身冷汗，庆幸自己也拣回了一条性命。朱厚熹身体恢复后，加封许绅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并赏赐很多财物。有明一代，许绅是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医生。但他并没能能够安享高官厚禄，由于惊悸过度，神经受到损害，不久即得病去世。

朱厚熹苏醒以后，仍然神智恍惚，好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管事。方皇后在此期间全权处理这场宫变。方后对曹妃素有妒忌之心，审讯时，刑讯逼供，将曹妃打成主谋。随后，方后以朱厚熹名义，下诏将曹端妃、王宁嫔与杨金花等10名宫女一并凌迟处死。朱厚熹恢复视事以后，得知方后构陷曹妃

的经过，心里暗暗怀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11月，宫内发生火灾，方后陷身火区，厉声呼救。太监们向朱厚熜报告，朱厚熜却有意拖延，不采取抢救措施。方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地烧死。

朱厚熜侥幸留得一命，但却落下一个心病，总觉得宫中鬼影憧憧，总听到冤魂凄厉的哭声。但他并没有忏悔之意，只是为了躲“鬼”，长期迁居西苑，不再回旧宫。迁居西苑时，后宫妃嫔全部随行。迁居西苑后，他又变本加厉地在民间征选宫女。旧宫中的惨剧又在西苑重演。有这样的昏君当政，明朝国事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父子奸臣

昏君与奸臣，在中国的封建政治史上，总是相伴随而存在的。昏君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就出了严嵩、严世蕃这一对父子奸臣。

严嵩是分宜（今江西分宜）人，考上进士后，在翰林院供职。此人能写一点诗文，又特别善于阿谀谄媚，见风使舵。世宗朱厚熜派他到安陆（今湖北安陆）去祭扫自己的生身父亲朱祐杭的陵墓。他回来后，编造了一套神话，说什么，修建陵墓用的石材的产地，飞来一群白鹤，绕着石材欢叫；载运石碑的船只驶入汉水，河水立刻暴涨；连日阴雨的天气，到仪式举行时就一下子转为晴朗。哄得朱厚熜大为高兴。朱厚熜要把朱祐杭的牌位请进明堂、请进太庙。严嵩本来与多数官员一样，认为这种做法不合规矩。朱厚熜一意孤行，发了脾气。严嵩马上改变立场，不但表态拥护，而且尽心尽力地策划礼仪，撰写颂文，赢得朱厚熜的赏识。朱厚熜崇奉道教，经常同道士一起搞些祭祀仪式。严嵩施展浑身解数，为朱厚熜撰写“青词”。青词是写给天神看的奏章表文，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因此得名。严嵩的青词写得华丽堂皇，很中朱厚熜的意。他就靠这些手腕，被提拔为大学士、首辅。有了这样的政治地位，就好呼风唤雨、招财进宝了。

严世蕃是严嵩的儿子。此人身体肥胖，脖子粗短，还瞎了一只眼睛，长得一点不像他那身材瘦长的父亲。但在“奸”的方面，却与父亲沆瀣一气，手段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严嵩当上大学士时，已经年过60，虽然身体还算硬朗，但是思维却有点迟钝。朱厚熜深居西苑，20多年不上朝，朝中群臣，除了严嵩以外，都见不到他的面，有时他连严嵩也懒得见，就随手写个条子，算是“手诏”，吩咐办这办那。这些手诏，字迹潦草，文字又简单，往往叫人不知所云。严嵩只有见到朱厚熜的面，察颜观色，用心揣测，才能把事情办得叫他满意，光看手诏，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严世蕃专能辨识手诏字迹，而且会从那简单潦草的字迹中捉摸出朱厚熜的心意，进而为父亲出主意，把事情办得叫皇帝满意。所以，严嵩要窃权弄奸，身边少不得严世蕃。严世蕃还有一个本事，他对中央、地方的各个官职有多少油水了解得一清二楚。官员们要走他的门路才能办得通事，他倚仗父亲的权势向官员们索取贿赂。哪一个官员拿得出多少贿赂，他心中有数，贿赂的金银财宝到不了他内定的杠杠，就别想把事情办成。

严家父子靠收取贿赂发了大财。北京城里的严家府第，横跨三四条街，花园里有一片几十亩地的人工湖，府中收藏了数不清的古玩字画，院子里种奇树、养珍禽。在家乡分宜，严家有5座府第，座座都是雕梁画栋、峻宇高

墙，穷极富丽。严世蕃得意洋洋地夸口：“朝廷不如我富！朝廷不如我乐！”

严嵩还未得势之时，他的同乡夏言是当朝宰相。为了讨好夏言，严嵩置办了一桌酒席，专门到夏言府中去邀请他。夏言推辞不见，严嵩就在夏言家的客厅里双膝着地，上身挺直，打开邀请书，恭恭敬敬地念了一遍。后来，世宗朱厚熜把道士帽子作为礼品，赏赐给夏言、严嵩等朝臣。夏言认为儒臣戴道士帽子不合礼节，拒绝接受，惹得朱厚熜十分生气。严嵩却做出一付受宠若惊的样子，把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上面还罩上轻纱，以表示爱惜珍视的意思。朱厚熜见了，觉得还是严嵩值得亲近。严嵩瞅准这个机会，在朱厚熜面前狠狠说了夏言一番坏话。

当时，蒙古鞑靼部占据黄河河套地区，不时侵犯明朝边境。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音 xi n）力主收复河套，夏言也支持他的主张。严嵩攻击曾铣轻开边衅，夏言败坏国事。朱厚熜不问是非曲直，罢了夏言的官，把曾铣逮捕下狱。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鞑靼可汗俺答进扰宣府（今河北宣化）一带。严嵩又在朱厚熜面前散布流言，说俺答是为了报复夏言等人“收复河套”的主张才兴兵进扰的，边境紧张，都是夏言闯下的祸。朱厚熜下令将夏言斩首，将他的妻子苏氏流放到广西。

夏言死后的第三年，俺答又率兵进犯大同。负责宣化大同一线边防的宣大总兵仇鸾是个草包，根本打不了仗。他的总兵官职是向严嵩父子行购买来的。面对俺答的大兵，他的计策就是向俺答送上一份重礼，哀求他不要攻打自己的防区。俺答收了礼，引兵东去，攻下古北口，一路烧杀抢掠，向北京通来。兵部尚书丁汝夔（音 kuí）慌了手脚，问计于严嵩。严嵩说：“在边塞上打了败仗还可以瞒住皇上，在京城外打了败仗就瞒不过了。我看还是不要出战，闭城坚守。俺答的兵抢够了财物，自己就会退走的。”丁汝夔听了严嵩的话，龟缩在北京城内，京郊的老百姓受尽鞑靼兵的烧杀抢掠之苦，却盼不到一个明朝士兵来保卫他们。那个将祸水引向北京的草包将军仇鸾此时带兵前来救援。他带的大同兵趁火打劫，对老百姓比鞑靼兵还要凶狠。

鞑靼兵抢够了财物，志得意满地回师西去。仇鸾等鞑靼军走远了，才带上大同兵远远地跟在后面，佯作追击。鞑靼军的前队遭到阻击，又回转身来，向东南方向杀去，正好与大同兵不期而遇。草包将军仇鸾差一点当了俘虏。鞑靼兵杀伤明军上千人，从古北口出长城。仇鸾杀了几十个老百姓，砍下头来，向明世宗朱厚熜冒功请赏。朱厚熜不加核查，给仇鸾加官进爵。但他总觉得鞑靼兵在北京城下逞凶狂实在是奇耻大辱，为了泄愤，把丁汝夔抓了起来。丁汝夔的“不抵抗主义”本来是严嵩的发明，为了不让丁汝夔牵连到自己，他暗中给丁汝夔传话：“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世宗朱厚熜盛怒之下，要判丁汝夔死刑。老奸巨猾的严嵩却根本不出面为丁汝夔分担责任。丁汝夔被绑上刑场砍头时才明白自己上了当，连声大呼：“严嵩误我！严嵩误我！”

严嵩骗得了丁汝夔，却骗不了天下人。锦衣卫官员沈鍊向朱厚熜上书，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请皇帝诛戮奸臣，以谢天下。朱厚熜却执迷不悟，严嵩没有损伤一根毫毛，沈鍊却被廷杖，发配到保安（今河北涿鹿）。保安的老百姓敬重沈鍊是一个敢于斥骂奸臣的义士，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沈鍊扎了三个草人，分别象征唐代李林甫、宋代秦桧、当代严嵩三个大奸臣。教学之余，就同众子弟一起，把草人当作靶子，练习射箭。严嵩听说后，指使党羽诬陷沈鍊谋反，将他逮捕处死。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活活打死。

严嵩的妻子死了，严世蕃应当护送灵柩回乡安葬。严嵩离不了这个儿子，向朱厚熜提出请求，留严世蕃在京城侍候自己。严世蕃母丧在身，不能像以前那样到严嵩办公的地方帮他处理事情。严嵩接到“手诏”，自己拿不定主意，派人拿回去问严世蕃，赶上严世蕃在府中淫乐，也顾不上及时答复。事情一紧急，严嵩只好自己处理，往往得不到朱厚熜首肯。严嵩与方士蓝道行有矛盾。蓝道行利用扶乩的机会，假托仙人的话，说严嵩是奸臣。朱厚熜信的就是这些神鬼之言，对严嵩更有看法了。御史邹应龙抓住这个时机，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的罪行。朱厚熜罢了严嵩的官，并将严世蕃谪戍雷州（今广东海康）。这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事。此时，严嵩父子横行霸道已经20年了。

严世蕃在谪戍途中逃回分宜。他在家乡，役使4000百姓营造府第，还抢夺民财，霸占民产，并结交亡命之徒，策划外逃日本。事情被人告发，世宗朱厚熜下令将其逮捕进京，斩首于西市。严家被抄没，抄出黄金30000两，白银200多万两，珍宝古董折价数百万两。严嵩搬到墓舍居住，又苟活了两年，在87岁那年病死。诗人王世贞用“遗臭污金石，所得皆浮云”两句诗总结了他漫长而丑恶的一生。

壁立千仞的刚峰

在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既出了严嵩严世蕃这样的父子奸臣，也出了海瑞这样的清官，他被史家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模范官僚”。

海瑞是琼山（今海南海口）人。他的海南始祖本姓“海答儿”，是阿剌伯人，明永乐年间以后，改姓“海”。

海瑞平生提倡一个“刚”字，自号刚峰。中国有则古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一生为官，清廉正直，确实称得上是壁立千仞的刚峰。

海瑞生于正德八年（1514年），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青年守寡，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成人。海瑞还没有进学塾之前，母亲就对他口授经书，教给他做人的道理。海瑞中举以后，步入仕途。一开始，被委任为南平（今福建南平）教谕。有一天，御史来到县学，其他县学吏员都对御史行跪拜大礼，海瑞却只向他作了一个长揖。他对御史说道：“如果是在官场，我当然要向你行大礼，但这是学堂，是师长教育学生的地方，我作为师长，不能够向当官的屈膝下拜！”后来，他升任淳安（今浙江淳安）知县。他衣着朴素，饭食简单，自己种菜。母亲过生日时，他才买两斤肉改善伙食。这种节俭的作风，在奢靡的官场中显得格外古怪，被上司、同僚们传为笑谈。

浙江总督胡宗宪依附严嵩，权势煊赫。一次，他的儿子带着一帮随行人员外出，一路上对负责接待的各地驿站横挑鼻子竖挑眼，动不动就将驿丞责罚凌辱一番。他们来到淳安，嫌驿丞款待不好，把驿丞倒吊起来。海瑞带人来到驿站，将胡公子拘留，并没收了他携带的几千两银子。他派人向胡宗宪禀报这件事，故意说道：“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会有这样的不肖之子。这个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胡宗宪自知理亏，无可奈何。

左副都御史鄢懋卿，也是严嵩的党羽。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被任命为清理盐法的钦差大臣，到各产盐地区巡视。沿路各处官员，都盛情款

待这位钦差大臣。一顿酒席动不动就花掉三四百两银子，还要馈赠金花锦缎，连溺器都要用银子装饰。海瑞却不买他的帐。海瑞在鄞懋卿还没到淳安之前，就给他送去一份禀帖。禀帖中，郑重要求他不要讲究排场，不要搜括地方，并警诫他，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的阿谀恭维，就无法秉公办事，根本不能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务。鄞懋卿收到禀帖，十分恼火，但他早听说海瑞是个软硬不吃的正派官员，也不敢把海瑞怎么样，只好灰溜溜地绕过淳安县作罢。

严嵩垮台后，海瑞被提拔为户部主事。他来到北京，对于世宗朱厚熹种种昏愤迷乱的行为了解得更多。他向朱厚熹呈上一份奏疏，直言不讳地指出：天下人对陛下的行为早已不以为然了。陛下做出的事，用父子、君臣、夫妻关系的正常标准衡量，只能说是又偏颇、又刻薄。陛下想求长生，难道不想一想，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圣人有一个长生，汉、唐、宋以来讲长生的方外士又有哪一个活到现在！

朱厚熹读了海瑞的奏疏，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声吩咐左右：“赶快把这家伙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宦官黄锦告诉他：“这个人向来有个‘痴子’的名声，我听说他写这篇奏疏时，自己早料到顶撞了陛下，必死无疑。他买了一口棺材，向妻儿交待好后事，在家里等着陛下派人去抓他。他家里的仆人吓得统统逃光。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跑的。”朱厚熹听了，沉默不语。过了一阵，把奏疏拿起来又读了一遍。一天之中，反复读了好几遍，心里也有所触动。他一方面知道：“这个人就像比干一样，朕可不能当纣王。”另一方面，又不能原谅海瑞泼辣尖锐的措辞，觉得这简直是在当面咒骂自己。三个月后，他下令逮捕海瑞。刑部判决海瑞应受绞刑——这是明朝律例规定的惩办诅咒父亲的儿子的刑罚。朱厚熹没有批准刑部的判决。再过几个月，朱厚熹自己得病去世。

提牢主事得知世宗朱厚熹去世，料定海瑞将会受到重用，就设宴款待海瑞。海瑞以为这是执行死刑前的送别宴，神色镇定地坐下来恣意痛饮大嚼。提牢主事贴着他的耳朵偷偷告诉他：“皇上刚才晏驾了，先生就要出狱受重用了！”海瑞听到这个消息，放声痛哭，吃下的酒肉全部呕吐出来，昏倒在地。这天晚上，他哭了整整一个通宵。

海瑞出狱后，被安排当了几任闲官。隆庆三年（1569年），他被任命为南直隶（今江苏、安徽）巡抚。南直隶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又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区。对海瑞的任命一公布，南直隶的许多有贪赃行为的地方官估计到自己将会不见容于这位新任巡抚，自动请求离职或他调。许多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的缙绅人家把府第的朱漆大门改漆为黑色，以免引人注目。海瑞到任以后，实行“摧豪强、抚穷弱”的政策，力图抑制豪绅富户兼并土地的行径。前任首辅徐阶退休后在苏州居住。他家里兼并的土地达到24万亩。海瑞接受了大量控告徐家渔肉乡里的诉状。他把这些诉状封送给徐阶，责成徐阶设法公正解决有关问题，并要求徐家至少要退田一半。为了敦促徐阶尽快有所行动，海瑞逮捕了劣行昭彰的徐陟，此人是徐阶的弟弟。海瑞每天要收到三四千件禀帖，老百姓把主持公道、为民作主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海瑞支持小户百姓的退田要求，触犯了大地主，大高利贷者的切身利益。朝廷中，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官员群起攻击海瑞，吏部的考核意见也不利于海瑞，说他“志大才疏”，只能担当闲杂小官。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被迫辞职。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反对他的改革举措的官员，气愤地说道：“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海瑞回到琼山家乡。那是一个荒凉贫瘠的地区。在他简陋的居室里，悬挂着一幅立轴，大书“忠孝”两字，这是他一生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他耕种着祖传的40亩薄田，维持清贫的生活。稍有节余，他就拿来周济比他更穷的族人。一些崇敬他的人，馈赠给他一点银两，他就用来刊印书籍。

万历十三年（1585年），已经赋闲15年的海瑞被重新起用。起用海瑞，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声誉作为朝廷的点缀。海瑞已经72岁，但仍有一股为民作主的锐气。他变卖产业，置备了朝服冠带，来到南京，接受了吏部右侍郎的任命。一上任，他就向皇帝建议：采用重刑，以杜绝官吏的贪污行为。他的主张招来满朝官员的一片反对之声。皇帝也认为他“迂戆”，不合时宜。海瑞一向主张，要做官，就得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他复出之后，发现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夙愿；失望之余，他接连7次提出辞职的要求。

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在南京去世。海瑞有过3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弥留之际，金都御史王用汲去探视他，看到这位老人的房间里，堆着几个放破旧衣物的旧竹箱子，床上挂的是一床葛布帐子，其简陋的状况连贫寒的读书人都难以忍受下去。王用汲感动得哭了起来，海瑞死后，他在同僚中发起募捐活动，为海瑞办理后事。载运海瑞的灵柩的船只在长江中行驶，两岸的老百姓穿着孝服送行。路上到处可以看到洒酒祭奠、痛哭失声的人群。

张居正改革

明世宗朱厚熜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去世后，他的第二个儿子朱载堉（念hòu）继位，史称明穆宗。朱载堉当了6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第三个儿子朱翊（念yì）钧继位，史称明神宗。朱翊钧继位时，还只有9岁。在此后的10年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实际上是宰相张居正。

张居正是江陵（今湖北荆沙）人。他为人机敏，敢于负责，处事干练，城府很深。严嵩当政时，对张居正颇为器重。严嵩的政敌徐阶任首辅期间，对张居正更是倾心任用。明世宗朱厚熜去世，徐阶起草遗诏，他不找其他大学士商量，只把张居正叫去参与研究斟酌。明穆宗朱载堉在位时秉政的首辅高拱，也把张居正当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徐阶离位以后，把三个儿子托付给张居正照应。高拱与徐阶有很深的矛盾，他提任首辅后，借着追查徐阶儿子问题的事由来报复徐阶。张居正在高拱面前替徐阶的儿子求情。高拱听人说，张居正接受了徐阶儿子30000两金子的贿赂，他就拿这件事来堵张居正的嘴。张居正听到高拱提起这一流言，脸色大变，对天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接受过贿赂。高拱见他情绪激动，也就把这件事带过去不再提了。从此以后，张、高两人之间产生了裂痕。

穆宗朱载堉病重时，太监冯保秘密地嘱托张居正预先起草一道“遗诏”。高拱知道此事后，当面责问张居正：“我是当朝的首辅，你怎么能背着我和同宦官商议起草遗诏这样重大的事情呢？”举行神宗朱翊钧的登极仪式时，冯保紧随着朱翊钧，寸步不离。群臣向朱翊钧朝拜时，冯保居然也站在皇帝宝座旁边，形成一种群臣同时向朱翊钧、冯保行礼的尴尬场面。高拱布置一些官员上疏攻击冯保，准备由内阁配合，以皇帝的名义下诏驱逐冯保。张居正得知高拱的计划后，密告冯保，冯保又向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慈圣太后）作了汇报。朱翊钧召集群臣，宣读两宫（仁圣、慈圣两位太后）和皇帝的诏书。高拱以为一定说的是驱逐冯保的事，高高兴兴进宫去，准备好好庆贺一

番。没想到，诏书里的话都是列举高拱的罪行，指责他专权擅政、蔑视年幼的皇帝，并下令罢他的官，驱逐出京城。高拱跪在殿前，惊恐得起不了身。张居正上前把他搀扶起来，送出宫门，又雇了一辆骡车，将他送出北京城的宣武门外。高拱被赶下台，张居正当上首辅。

张居正当上首辅后，把督促年幼的神宗朱翊钧的学习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对“日讲”作了细致的安排。规定，除每月三、六、九日的常朝外，一年四季，每天都要举行日讲。日讲分早讲和午讲。早讲在清晨举行，由儒臣、讲官讲解经典。早讲后，朱翊钧要阅读重要的奏章。随后开始午讲，讲解《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书，直到午膳时才结束。下午是朱翊钧的自习时间，他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张居正经常出席日讲，亲自为朱翊钧授课。在万历六年（1578年）大婚以前，朱翊钧随生母李太后同住乾清宫。李太后出身寒微，好胜心强，教子十分严格。朱翊钧贪玩不读书，李太后发现了，就罚他长跪，当面数落。日讲之后，李太后要亲自检查儿子对功课的理解、掌握程度。逢到早期的日子，李太后五更即起，亲自叫醒朱翊钧，督促他按时上朝。朱翊钧还是皇子的时候，冯保就负责照料他，被称为“大伴”。朱翊钧即位后，冯保升为司礼监太监，是地位最高的宦官。他经常向李太后报告宫内外的各种情况，李太后把他当作耳目。朱翊钧有什么不合礼仪的举止行为，冯保也会向李太后报告。冯保与张居正的关系也处得很好，两人在重大事情上，互相通气，互相配合。张居正当宰相，李太后、冯保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加以支持，宫廷和政府之间协调一致，实现了“宫府一致”的体制，这是张居正得以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

明代的文官有四种出身：进士、举人、贡生、吏员。进士出身的人，提拔得快，担任的职务也高。万历四年（1576年），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贪污勒索的不法行为被揭发，受到查处。张居正对神宗朱翊钧说：“若要天下太平，须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须是官不要钱。”朱翊钧提出一个疑问：“孙鸣凤是进士出身，怎么竟这样不知廉耻？”张居正回答道：“这个人正是因为自恃是个进士出身，资格过硬，才敢如此放肆。今后皇上用人，应当只考虑他的能力和政绩，不必拘泥于是什么资格出身。遵法纪、守本份、不要钱的人，即使是进士以外的途径出身的，也该委以重任。不廉政，不守法的人，即使是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也要严加惩处！”

张居正按照“不拘资格”的方针，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万历三年（1575年），山东郯城、费县两地知县出缺，分别由同知杨果和判官赵蛟代理。这两个人精明强干，完全可胜任知县职务。只因为他们都是吏员出身，按惯例不得扣任正印官，山东巡抚、巡按上奏，请求另行委派知县。张居正认为：“这两人才堪治民，可升知县，何必拘泥于什么资格！”指示委任这两人为实授知县。

明朝中叶以后，驿站制度败坏。出差官吏讲究排场，索要财物，非公差人员也违法使用驿站，占国家的便宜。张居正决心整顿驿站。他懂得，推行一项政策，当政者必须自己做出表率。他送儿子回乡应试，弟弟回乡养病时，都自雇车马，不让他们使用驿站。保定巡抚张鹵（音x）把使用驿站的凭证“勘合”主动送上张居正的家门。张居正立即将勘合退回，并写信给张鹵，希望他帮助自己约束家人，千万不要满足家人的非份要求。张居正的家奴路过高邮，要求使用驿站，被高邮知州吴显拒绝。家奴一气之下，闯入州衙，破口大骂。后来又将吴显骗到自己船上，抢走吴显的官印。吴显态度严正地

对他说：“我执行的是你家相爷规定的法令，你能把我怎么样！”家奴自知理亏，只得将官印送回，并向吴显赔礼道歉。

张居正的改革，涉及到财政、税收、教育、国防等各个方面，并取得了显著效果。明朝的衰败趋势得到扭转；一时之间，全国颇有一派向“国富民安”的目标前进的好气象。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病逝。按照当时的制度，张居正应当立即上疏请求辞职，为父亲守丧27个月，这叫“丁忧”，也叫“守制”。皇帝可以下诏特许应当“守制”的官员在职视事，这叫“夺情”。但夺情对象，一般限于军职官员，而且还要是在战争期间，才能援引这一条款。神宗朱翊钧、李太后、冯保都不愿张居正去职，张居正的亲信们也不愿失去他这个靠山。户部侍郎李幼孜等人出面请求神宗朱翊钧，让张居正夺情视事。朱翊钧果然下诏，要张居正夺情，在北京守满七七丧期后，即入署办公。张居正两次上疏请求守制，遭到拒绝，就同意“在官守制”，但辞去岁俸，表示与照领俸禄的“夺情”不是一回事。朱翊钧批准了张居正的“辞俸”要求，但指示有关衙门按月给宰相府送柴送米，直到服丧期满。

“夺情”一事，引得朝野议论纷纷，酿成一场政治风波，使张居正的威望大为下降。张居正此后的行为也有很多值得非议的地方，如在科举考试中，替自己的儿子做手脚；对家人、奴仆管束不严，使他们得以倚仗自己的权势、名声，招摇撞骗，欺凌百姓。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张居正一死，政局就发生突变。神宗朱翊钧摆脱了张居正的约束，一心要做个威福自专的真皇帝。冯保被谪居南京，并被抄了家。朱翊钧看到从冯保家抄出不少金银珠宝，不禁又打起了张居正的主意，派专人到江陵去抄张居正的家。抄家的专使还没到，荆州地方官就封了张府的门，将张府上下软禁在府中，以防他们转移财产。等到正式启封抄家时，张府的人已饿死了10多个。朱翊钧发布诏书，公布张居正的罪行，并说：没有对他剖棺戮尸就算饶了他。张居正的长子自杀，弟弟和次子被发配到烟瘴之地充军，他所推行的改革，自然也“人亡政息”，不了了之。

一代名将戚继光

张居正在国防事务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戚继光等一批将领实行的。戚继光是一代名将，他在抗击倭寇方面所建立的功绩，永远彪炳于中国史册。

戚继光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戚继光被任命为都指挥佥事，在山东登州一带防备倭寇。倭寇是来自日本的海盗武士。他们组织严密、武艺精熟。倭寇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到50艘船只，每只船装载百人左右，选定明朝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登陆。登陆后，派遣30人以下的小部队深入沿海村镇骚扰掳掠。站稳脚根后，他们就勾结中国的海盗、汉奸，攻占城池，建立根据地，抢夺车辆船只上的商品，并将居民贩运到日本当奴隶。在同明军作战时，他们戴着头盔，头盔上饰有牛角状的突起物，拖着五色长丝，看起来就像海中浮过来的厉鬼。他们双手舞刀，刀锋闪亮，胸前配有明镜，反射着炫目的日光；在凄厉的海螺声中，发起集团冲锋。为了造成明军的迟疑、惑乱，他们还把俘虏的老百姓驱赶到阵前当掩护。明军适应不了这种作战方式，往往被打得溃不成军。

躲在深宫修道的明世宗朱厚熜叫严嵩想法子对付倭寇。严嵩的死党赵文

华想出的办法是：派官员到江阴、常熟去，遥望东海，祭奠海神。朱厚熹委派赵文华作为祭告海神的专使，并视察沿海的防倭军备。赵文华颠倒功罪，牵制兵机，把军队的纪律搞乱了，人心搞散了，还向朱厚熹谎报：“水陆成功，江南清晏”。赵文华还朝以后，沿海一带明军被倭寇打败的消息不断传到京城。严嵩在朱厚熹面前，巧言替赵文华掩饰解脱，赵文华居然被朱厚熹当成了抗倭功臣。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以后，戚继光被调往浙江沿海抵抗倭寇。戚继光到浙江后，先检阅驻防的明军，发现他们军素质极差，纪律又松散，根本不能打仗。他决心重新组建一支能胜任抗倭战斗任务的军队。他在金华、义乌一带招募了3000名农民、矿工，加以严格的训练。为了支付这支部队的军费，政府专门加征新税。戚继光对士兵们训话道：“你们在家里都是耕种的百姓，都知道种田纳粮的辛苦。现在，你们当了兵，刮风下雨之日，袖手高坐，也照样吃军粮，领军饷。国家养了你们，不过是希望你们能打胜仗。你们要是不能杀贼保民，养着又有何用！就是军法不制裁，老天也不会饶过。”为了保证能打胜仗，他执行了铁的纪律。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一次战役中，部队要攻夺一座倭寇占领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官兵36人全部阵亡。第二哨官兵随即发起第二次进攻，又损失过半。其余的官兵有点胆怯，企图后退。戚继光在现场督战，亲手杀死了一个想后退的哨长，队伍这才稳定下来。明军继续发起进攻，终于击破敌阵，大获全胜。在多年的严酷战斗中，这支军队保持了从未被倭寇击溃过的不败纪录，被誉为“戚家军”；戚继光则被称为“戚老虎”。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从浙江温州，广东南澳两个方面向建沿海集中兵力，大举进犯，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前往救援。浙江来的倭寇巢穴在宁德（今福建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戚继光亲自查勘了横屿一带的地势水情。晚上退潮时，戚继光命令士兵们每人背上一捆干草，急行军到横屿岛对岸。把干草扔进水中，铺出一条进军的路来。戚家军踏着草路，摸进倭寇的营盘，全歼了岛上的2600名倭寇。随后，戚家军又向福清（今福建福清）进发。广东来的倭寇巢穴在福清的牛田。戚继光故意放风：“远路进军，人马疲乏，连续作战，恐有不利，先休整一阵再说。”牛田的倭寇信以为真，防备松懈。戚家军却不畏疲乏，连续作战，到达福清的当天，就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寇猝不及防，纷纷败退。一夜之中，戚家军攻下倭寇的60座营寨，歼灭1000多敌人。

戚家军回师浙江后，又有一批倭寇来到福建沿海，占据平海（在今福建莆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再次援救福建。在向平海倭寇发动总攻时，戚家军冲在最前面，首先攻入城内。刘显率领的左军，俞大猷（音yóu）率领的右军紧紧跟上。这一仗，歼灭倭寇2200多人，解救了3000名被倭寇俘获的百姓。北京城里，为这次战役的胜利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在抗倭立功的将士名单中，戚继光被排在第一位。

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被调往蓟州（今天津蓟县）防守明朝的北部边境。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张居正在北京城出任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和戚继光互相配合，在蓟州军镇推行军备改革。戚继光把在抗倭战斗中卓著功勋的戚家军带到蓟州，让他们在蓟州军镇的边防军中成为一股核心力量。他为边防军配备了战车，战车上装有“佛朗机”轻炮。每辆战车上配有10名士兵负责施放佛朗机，另外再配备10名“杀手”，使用藤牌、镞钹和长柄单刀迎战

敌人。戚继光对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施加严格的训练，使其成为有强大威慑作用的军事力量。蒙古鞑靼部可汗俺答不得不放弃对明朝北部边境的骚扰，奉行与明朝和平相处、互惠贸易的政策。

为了巩固边防，戚继光建议，利用边境战争暂时平息的机会，派遣士兵修筑长城。北京一带的长城，还是明朝初年，徐达北伐以后修建的。戚继光这次增修长城，加设了 1200 多座“空心堡垒”，这种堡垒有三层，可驻守 30 到 50 名士兵。

戚继光在蓟州驻守了 15 年。15 年中，他不断地操练、阅兵、训话、巡视。他曾只身一人，骑马到长城以外 20 里的地方，实地考察地形。有一座观察哨所建在悬崖峭壁上，为了了解驻守士兵的情况，他攀着悬绳，登上哨所，使士兵们又是惊讶，又是佩服。他把自己的军事生活的经验体会总结成《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至今还对我国的军事科学和军队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戚继光爱惜士卒。在蓟州练兵时，他与将士共饮血酒，对天起誓，一定爱惜士兵，体恤士兵的疾苦，制止冒功领赏走后门的行为，绝不勒索士兵，苛待士兵。他用农民出身的士兵所能理解的语言说道，如果他犯了这些毛病，就会遭到“天灾人祸，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男盗女娼，十代不止！”他废除了将领支使士兵采伐柴薪供自己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他家里因为没有烧柴，竟不能及时辞岁。

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密切。反对张居正的官员经常提醒神宗朱翊钧，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张居正的操纵，不受其他人的调遣。张居正死后，他被从蓟州调到广东。随后，他又被人指控为张居正的党羽，受到革职的处分。

戚继光为人豪爽，不治家产，不事私蓄。他被革职以后，一贫如洗，得了病，连求医买药的钱都拿不出来。神宗朱翊钧对他怀有戒心。御史傅光宅上疏，建议起用戚继光，竟被朱翊钧给了扣发俸金的处分。戚继光报国无门、贫病交迫，英雄末路，晚景凄凉。

挺击、红丸与移宫

明神宗朱翊钧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是王恭妃生的，次子朱常洵是郑贵妃生的。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想不到一块，册立太子的事就一直拖延不决。朱翊钧对大臣们的干预十分恼火，于是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会见朝臣，不批答章奏，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大臣向皇帝讲课），官职出缺，不任命替补官员。不过，他对聚敛钱财的事情抓得却很紧，他不与朝臣合作，却视宦官为心腹，委派他们担任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他深居宫内，每天都要饮酒，每次饮酒都要喝得烂醉如泥，每次喝醉酒都要大撒酒疯，左右说话稍不留意，就会被他下令责打致死。

封建时代认为皇位法定继承人太子是“天下之本”。神宗朱翊钧与朝臣们在立太子问题上彼此僵持了 15 年，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神宗朱翊钧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洵封王以后，又不按惯例离开北京，前往封地。“争国本”的事情实际上并没

有结束。明史上的“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争国本”的余波。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5月，一个手持棗木棒的男子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他将守门太监一棒子打倒，冲进门内，往太子的寝殿直闯。太监们慌忙将他捉住。朱翊钧吩咐，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朱翊钧报告道：这个人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举止行为像个疯子，不过相貌又颇为狡猾，还得严加讯问。朱翊钧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他一个斩刑。提牢主事王之宥（音 c i）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说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王之宥将这个口供转告给刑部侍郎张问达。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的手伤害太子。御史过庭后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叫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情况。蓟州知州戚延龄报告说：张差在家里就得了疯癫病。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于是，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你们这些宫外的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朕父子！”他回头对朱常洛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对他们统统说出来。”朱常洛说道：“张差是个疯癫之人，赶快把他处决算了。我父子何等亲爱！外面议论纷纷，都是不应该的！再议论下去，你们就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了！”朱翊钧导演了这一幕父子双簧，群臣无话可说，“挺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泰昌元年（1620年）8月，明神宗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后死去，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郑贵妃怕朱常洛对她报复，连忙想法讨好朱常洛。朱常洛当太子时，身边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号称东李西李。朱常洛特别宠爱西李。”郑贵妃首先拉拢西李，她出面提议立西李为皇后，西李则提议封她为皇太后以作为报答。郑贵妃又挑选了8个美貌的女子送给光宗朱常洛。朱常洛沉溺于女色，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他吃了宦官崔文升进的泄药，一天要拉三四十次，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朱常洛一听说是“仙丹”，十分欢喜，连忙叫太监召李可灼进宫送药。李可灼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子。朱常洛喝了一颗，病情好像有了缓解，一再夸奖李可灼：“忠臣！忠臣！”下午三点多钟，朱常洛又喝下一颗红丸，想不到，第二天黎明，他就死掉了。算起来，明光宗朱常洛前后后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明光宗朱常洛暴死，朝中群情大哗。人们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用泄药，伤了朱常洛的元气，其罪不在张差之下。人们又指责李可灼结交宦官，妄进红丸，是导致朱常洛死亡的元凶。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

在里面听见了，嗾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已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璟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他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准备登极。

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西李仗着自己从小把朱由校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算起帐来，即使不把选侍怎么样，你又置身于何地呢？”那个太监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只得转身走了。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西李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极为天子了，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指光宗朱常洛的元配郭后和太子朱由校的生母王妃）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在这种情势下，西李只得搬到曦（音 huì）鸾宫居住。曦鸾宫是宫女养老的地方。西李这一搬，说明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

挺击、红丸、移宫三案，反映了明朝政局的腐败和混乱，宫府不和，朝臣中各派势力争吵激烈，这个老大的封建帝国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

东林六君子狱

在“争国本”时，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坚决主张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被明神宗朱翊钧罢官，回到无锡老家。无锡城东有座东林书院，是宋著名学者杨时讲学的地方。顾宪成约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将东林书院修葺一新，在那里开展讲学活动。很多对朝政不满，在民间闲居的读书人仰慕顾宪成等人的名声，从各地汇集到东林书院听讲，把校舍挤得满满的。顾宪成认为：在朝廷做官如果不关心国家大事，在地方做官如果不关心百姓疾苦，在乡里赋闲如果不关心世道，就算不上是君子。在讲学时，他们议论朝政，品评人物，放言无忌，引导着舆论、影响着政局，被称为“东林党”。

朝廷中有一批官员，与东林党人政见不合，按地缘关系串联成一个个帮派，例如，首辅沈一贯纠集浙江籍的京官，形成一个“浙党”。此外还有“齐党”、“楚党”、“宣（安徽宣城）党”、“昆（江苏昆山）党”等。大体说来，东林党的著名人物，在明末乌烟瘴气的政治氛围中，代表了一股正气，受到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宦官魏忠贤当权，东林党人受到大规模的迫害，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杨涟等人的冤狱。

辽东经略熊廷弼被诬陷为通敌，问成死罪。熊廷弼在狱中委托一个叫汪文言的人替他活动。汪文言先说是要送给魏忠贤 40000 两黄金，以换得熊廷弼不死，但后来又并没有拿出这笔钱来。魏忠贤大为恼恨，打定主意要处死熊廷弼，并又由此想出一个毒招：反诬与他有仇的东林党人接受了熊廷弼的贿赂，将他们从重治罪，以泄自己的私愤。他指使北镇抚司许显纯严刑拷打汪文言，逼汪文言诬指杨涟受过熊廷弼的贿赂。汪文言仰天大呼道：“世上哪里会有贪赃受贿的杨大洪（即杨涟）！”许显纯又逼他诬指左光斗等人。汪文言愤然回答道：“你怎能用这种手段来陷害清廉之士！我死也不会承认的。”许显纯只得自己动手伪造汪文言的供词。汪文言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紧盯着许显纯，说道：“就算你会耍奸弄巧，我将来是要与你当面对质的！”许显纯为了杀人灭口，当天就将汪文言拷打致死。

按照许显纯所伪造的供辞，副都御史杨涟、金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等 6 人被捕入狱，吏部尚书赵南星等 15 人被撤职。

杨涟是扶持明熹宗朱由校继位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曾向朱由校上书，列举了魏忠贤的 24 条大罪，指出魏忠贤是乱政的“大奸大恶”。左光斗在朱由校继位的那场政治风波中，与杨涟密切配合，人称“杨左”。他曾起草奏章，揭发魏忠贤及其死党魏广微的 32 条“斩罪”。魏大中曾配合杨涟，向朱由校上书，指出对魏忠贤的罪行，“人怨于下，天怒于上”，皇帝如果再不觉悟，就会落到祸不可救的地步。周朝瑞曾劝朱由校要注意“信仁贤、广德泽、远邪佞”等三条原则，多次指责宦官的罪恶。袁化中也曾配合杨涟，向朱由校上书，指责魏忠贤“障日蔽月，逞威作福”。顾大章与东林党人交往不多，但同情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他在刑部任职时，注重实事求是。辽阳失守后，魏忠贤的党羽在北京城抓了 200 多人，说他们是满洲人的奸细，问成死罪。刑部不敢审问，四分之三的人在关押期间不明不白地死去。顾大章对刑部尚书王纪说道：“以我一条命换 50 条人命，我也心甘。何况，只用拿我的一顶乌纱帽来换呢！”他出面组织了对还活着的 50 多人的会审。结果，只审出 3 个人有当奸细的行为，其余的人，他都办理手续，予以释放。

朝中群臣和民间百姓都知道这 6 个人的冤枉。逮捕杨涟时，几万人拥上道路为他送行。老百姓还用烧香拜佛、念经祈祷的传统方式，祝愿杨涟能活着回来。逮捕左光斗时，桐城（左光斗的家乡）的父老子弟拦住锦衣卫的马匹，痛哭流涕，声震原野。被派去执行逮捕任务的锦衣卫亲兵也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魏大中是嘉善（今浙江嘉善）人。嘉善的几千名乡亲哭着为他送行。

杨涟等人在狱中受到五毒（械、镣、棍、拶、夹棍）备具的残酷野蛮的刑讯。一开始，他们拒不承认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后来，他们怕被酷刑折磨死了就没有雪冤的机会，忍辱招供，想争取时间，由诏狱（特务机关北镇抚司管领的锦衣卫狱）转到司法部门处理，再求申冤昭雪。魏忠贤见他们已经屈打成招，就指使许显纯“追赃”。他们继续遭受酷刑，根本没有转到司法部门去的希望。孙奇逢、鹿正等有正义感的侠义人士，在民间发起募捐，想聚集一笔钱替他们缴“赃款”，救出他们的性命。百姓们纷纷响应，很快就募集到几千两金子。

诏狱是人间的十八层地狱。牢房地势低下，阴暗潮湿，墙壁有好几尺厚，

被关在里面的人，不管怎么呼号，外面也听不见。犯人受拷打时，家属可在大堂外遥遥观望，接受精神上的拷打和折磨。犯人的家属来缴“赃款”时，允许同犯人见面。见面时，犯人要跪在一丈以外的地方，彼此要提高嗓门问答，并且不准说方言。像杨涟等 6 人这样的重囚，颈子、双手、双脚都要加上刑具。他们被拷打得遍体鳞伤、血流涔涔，僵卧在冰冷的地面上，不能动弹。到了夜晚，老鼠爬上身乱咬。犯人饥不得食、渴不得饮、伤病不得治，血肉溃烂，求死不得。

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花了 50 两黄金贿赂狱卒，化装成清扫工到狱中探视左光斗。左光斗被拷打得面额焦烂，难以辨认，左腿膝盖以下部分的筋骨都被打断脱裂。史可法见此惨状，抱住老师的膝头，痛哭失声。左光斗听出史可法的声音，使劲用手指拨开自己的眼眶，目光炯炯地直视史可法，对他说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做什么！国家大事，糜烂到这种地步，你要是再不顾大义，轻身冒险，将来天下事还指望谁来支持！你赶快走，免得被奸人构陷。你要不走，我就先打死你！”他边说，边摸索着拣起地上的刑具，做出要向史可法打过去的样子。史可法不敢做声，退出牢房。以后，他常流着眼泪对人说起这件事：“我老师的肺肝，都是铁石铸成的啊！”

天启五年（1625 年）7 月 26 日晚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在诏狱中被牢头叶文仲等人杀害。叶文仲等人将铁钉从耳朵钉进他们的头颅，在他们挣扎的时候，又把塞满泥土的麻袋压在他们身上。当时，正值溽暑季节，三人的尸首迅速溃烂。为了向魏忠贤报功，许显纯用刀子剔出他们的喉骨，放在小盒子里面，作为“验明正身”的证据。此后不久，袁化中、周朝瑞两人也相继惨死狱中。魏忠贤一伙商议：人都死在诏狱里，不好向天下百姓交待，不如移送法司定罪，用皇帝的名义公告于天下，才能使百姓无话可说。于是，当时唯一还活着的顾大章被转到刑部狱中。刑部尚书李养正迎合魏忠贤的意旨，将六人判成死刑。魏忠贤用“诏书”的形式公布了这一判决。魏忠贤下令将顾大章送回诏狱，等候处决。顾大章说道：“我不能再到那十八层地狱去！”他先是服毒自杀，没有死成；又悬梁自尽，含冤而去。

杨涟死后，他的母亲与妻子被扫地出门，两个儿子靠讨饭养活祖母与母亲。左光斗的哥哥也被株连致死，母亲哭子而死，亲戚们都因此案而破产。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洵（音 y）哭父而死。

阉党专政

明朝的中后期的政治不仅有极其残忍的一面，而且有极其丑恶的一面。阉党肆虐就是一种丑恶的政治现象，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时，太监魏忠贤擅权专政，是这种丑恶现象发展的一个巅峰。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肃宁（今河北肃宁）人。他从小就是一个无赖，赌博输了，被人索债，自己把自己阉了，进宫当宦官。熹宗朱由校的奶娘客氏与太监魏朝结为对食。“对食”是宫中对太监、宫女结为“夫妻”的一种称呼。魏忠贤进宫以后，先投靠魏朝。通过魏朝，他结识了王安。王安当时任司礼太监，是一个比较正派的宦官。他见魏忠贤办事还算乖巧，对魏忠贤颇为信任。魏忠贤后来勾搭上客氏，与魏朝争风吃醋，闹到朱由校那里。朱由校对客氏说：“你心里想要谁管事，只管说出来，我替你作主！”客氏选择了魏忠贤。魏忠贤以后暗中指使人将魏朝这个“情敌”缢死。

熹宗朱由校当上皇帝还没满一个月，就把客氏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也很快地被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是宦官机构的领导机关，设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八九员。在政治上，司礼太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又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各种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等）的指挥者。魏忠贤是个文盲，照说连进司礼监办事的资格都没有，却因为是皇帝奶娘的“姘头”，当上了司礼监的头目。

王安为人刚直，不事逢迎，受到客氏的忌恨。熹宗朱由校任命王安为司礼监掌印。王安按惯例，先要表示推辞。客氏嗾使朱由校就势准了他的推辞，另外任命依附于客魏的王体乾当掌印。客氏与魏忠贤密谋诬陷王安。王安被囚禁在南海子。南海子提督太监刘朝受客魏指使，不给王安送饭。王安饿得吃篱笆上的芦菔。刘朝见饿了三天还没有将王安饿死，索性指令一伙爪牙，将王安活活打死。

客魏勾结，势焰薰天，就连熹宗朱由校的皇后张氏，他们也敢下手诬陷。张后曾把客氏叫到面前，训诫她要守本份。张后怀孕后，客魏把侍候张后的宫女都换成自己的亲信，暗中使手脚，使张后掉了胎。朱由校到张后宫中去，见几案上放着一本书，问道：“什么书？”张后回答道：“赵高传。”赵高是“指鹿为马”的秦代宦官，朱由校听懂了张后的话外之意，但没有做声。魏忠贤知道这件事，就布置了几个人，暗藏武器，埋伏在宫殿内。朱由校进殿时，魏忠贤故意将这几个人搜了出来，送往厂卫审讯，想叫他们招供出是受张后的父亲张国纪的指示来行刺的。后来，他又觉得这样做不算周密妥当，容易败露，就将那几个“刺客”匆匆杀掉灭口。

魏忠贤接连排斥走四个不听他的话的宰相：刘一璟、叶向高、韩爌、朱国桢，将凡是不依附他的人都指为“东林党”。他曾列了一份黑名单，一共309人。名单上的人，活着的撤职，死了的要追究，原已被撤过职的，要被囚禁。他将正派的朝臣排斥殆尽以后，就大量任用自己的党羽、爪才。魏忠贤任用的一批宰相，被人称为“魏家阁老”。宰相顾秉谦带着乳臭未干的儿子去拜见魏忠贤，父子俩对他叩头不已。顾秉谦竟说道：“我本来想拜您为干爹，但又恐怕您不喜欢我这个白胡子的干儿子，所以特地带着儿子来拜您为干爷爷，请您认他为干孙子。”魏忠贤大为高兴，当场就给这个干孙子一个“尚宝丞”的官职。宰相魏广微与魏忠贤同乡同姓，为了攀近乎，他开始时在魏忠贤的面前自称“宗弟”，后来就自降辈份，自认为魏忠贤的侄儿。他给魏忠贤开过两份名单，一份是要加以诬陷迫害的人，名字上加圈；一份是要加以提拔重用的人，名字上加点。还有一个宰相冯铨，是一个在同性恋中充当女性角色的无耻之徒，靠着向魏忠贤献媚受到赏识。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列举了他24条大罪。冯铨向魏忠贤献计，对不听话的朝臣要实行廷杖，对带头反对的人要抓要杀，这样才能稳住阵脚，吓倒朝臣。千古奇冤的六君子狱就是由他挑唆、策划而成的。此后，他又连续制造了好几起类似的冤狱。这个冯铨，踏着东林党人的尸首而青云直上，被破格提拔为宰相。明亡之后，他带头投降，又当上清朝的宰相。在这些魏家阁老以外，还有一大批为魏忠贤帮凶的狐群狗党，被人们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魏忠贤这一帮阉党坏事做绝，人心丧尽。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派爪牙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这帮爪牙由锦衣千户张应龙、文之炳两人带队。他们先向周顺昌家里人敲榨钱财，周顺昌家道清贫，为人正直，回

绝他们的要挟，说道：“七尺之躯，今天就交给你们摆布，我就不送一文钱给你们，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周顺昌的朋友们怕这帮爪牙在押解途中虐待、暗害周顺昌，凑钱向他们求情。这帮爪牙以为有利可图，便大开海口，要勒索更多的钱，并且扬言：“要是不交钱，我们就不能保证周顺昌途中的安全。他就是做了枉死鬼，谅你们也没处告我们！”按规定，宣读逮捕人的诏令以后，执行逮捕的人就得马上押解犯人上道。为了榨取更多的钱财，张应龙、文之炳这一伙人住在苏州，3天不宣读诏书。在这3天中，人民的愤怒情绪越来越高涨，终于在第4天爆发出来。在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5人的带动下，上万苏州市民包围逮捕周顺昌的锦衣卫亲兵，打死文之炳等3人，打伤数人。

魏忠贤派驻苏州的暗探，踉踉跄跄地连夜赶往京城，向魏忠贤报告：“江南的百姓反了，把锦衣卫都杀了！”随后赶到的暗探报告的消息更叫魏忠贤胆颤心惊：“苏州的百姓劫走周顺昌，关住城门，竖起旗造反了！”“造反的百姓断了粮道，还抢了运河上运粮的船只！”魏忠贤急得一个劲地怪罪他的爪牙崔呈秀：“现在激起了百姓闹事，怎么得了！”崔呈秀吓得连连叩头请罪。带头诬陷周顺昌等人的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吓得关起门来痛哭，哭得两只眼睛都肿了。可见这伙无恶不作的蠹贼，内心是如何的虚弱！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时只有16岁。这个少年人喜欢木匠手艺，做起木工活来，如痴如醉。魏忠贤瞅准他的脾性，总是在他挥钹舞锯的时候向他报告事情。朱由校不耐烦地把手挥：“朕已经都知道了，你们去好好干吧！”大权就这样落到魏忠贤手里。魏忠贤专权擅政7年之久，朝臣和百姓甚至怀疑是不是魏忠贤自己当了皇帝。魏忠贤过生日时，祝寿的人祝颂他“千岁千千岁”，更有人加码到“九千岁”、“九千九百岁”。他的官衔，列起来有两百多字。他用的印是黄金铸成的，重达300两。

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校病死。他死的当天晚上，他的弟弟朱由检住进宫内，与此同时，魏忠贤与崔呈秀等人也紧急策划，企图由魏忠贤篡夺帝位。限于时机不成熟，他们的阴谋没敢出台。第三天，朱由检即位，史称明思宗。朱由检对魏忠贤的罪恶早已了然在心，即位后几个月，便开始动手解决魏忠贤的问题。嘉兴贡生钱嘉徵上疏弹劾魏忠贤，列举了他的十大罪。思宗朱由检把魏忠贤叫到面前，另叫一位太监把钱嘉徵的奏疏读给他听。魏忠贤听得冷汗直流，颤抖不已。朱由检下诏将魏忠贤发配到凤阳安置。在前往凤阳去的途中，魏忠贤畏罪自杀。魏忠贤的姘头客氏被打死。魏忠贤的帮凶、党羽、爪牙也分别受到相应的处分。魏忠贤曾将“东林党人榜”公布于天下，对他们进行迫害。现在，他的帮凶、党羽、爪牙也被列入“逆案”名单，公布于天下。这些无人性、无良心、无廉耻的家伙终于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煤山自缢

明思宗朱由检是明朝的末代皇帝。明朝的政治在他祖父神宗朱翊钧和哥哥熹宗朱由校在位的时候，已经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朱由检即位以后，惩办了阉党，给杨涟、左光斗等大批遭受阉党迫害的人平反昭雪，很想振作一番，挽回国运。但是他为人刚愎自用，多疑少谋，用人不当，举措失策，还是成了一个亡国之君。

神宗朱翊钧时代，我国东北女真族的一个部落——建州女真日益强大。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八旗军事贵族的拥护下，即位称汗，改国号为“金”。女真族曾在12世纪时建立了一个国号为“金”的政权，努尔哈赤为汗的“金”，历史上称为“后金”。后金对明朝东北边境的侵犯骚扰，是明朝末年最严重的外患。熹宗朱由校时代，冤杀了抵抗后金的著名将领熊廷弼；思宗朱由检又冤杀了另一位抗击后金，战功卓著的将领袁崇焕，自毁长城，贻祸无穷。

袁崇焕在兵部任主事时，曾单骑出山海关，实地考察山川地形。兵部衙门的人正在为袁主事不知去向而焦急万分，他却胸有成竹地回来了。他对兵部尚书孙承宗汇报了考察结果，并表示：“只要给足我人马军饷，我一个人就守得住辽东。”他被熹宗朱由校提拔为佥事，负责督率关外的明军。

袁崇焕派兵进驻战略要地宁远（今辽宁兴城），筑起三丈二尺高、二丈宽的城墙，并装备了各种火器、大炮。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亲自率领13万大军，渡过辽河，进攻宁远。袁崇焕咬破手指，写了一份誓死抗金的血书，并激励宁远城内的10000名明军协力同心，为国尽忠。宁远守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袁崇焕指挥福建籍炮手罗立发射西洋大炮，炸得攻城的金军血肉横飞，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努尔哈赤曾自诩：“从25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一回却在袁崇焕手上受到教训。他率军退回沈阳后不久，就伤重而死，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接替了后金的汗位。皇太极也在袁崇焕手上吃了败仗。

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亲自召见袁崇焕。袁崇焕向他表示：用5年的时间，就可以收复全辽。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规划，他要求户部在转运军饷、工部在供应武器、吏部在用人、兵部在调兵等各个方面要做到事事适合。朱由检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赐给他尚方宝剑。

镇守东江（今鸭绿江一带）的大将毛文龙骄横跋扈，不听指挥。袁崇焕邀请他检阅将士的演习情况，检阅完毕后，引他登山观景。将他的随身部卒挡在山下。一到山顶，袁崇焕就喝令事先埋伏的兵士将毛文龙捆绑起来，当面数落了他的12条斩罪，并出示尚方宝剑，以皇帝名义，将毛文龙斩首。

思宗朱由检对袁崇焕的信任并没有维持多久。皇太极喜欢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兵书来钻研。他模仿周瑜骗蒋干的手法，支使高鸿中、鲍承先两位部将，故意在监押被俘的两个明朝太监的营帐外说悄悄话。高鸿中故作神秘地对鲍承先说：“我看到皇上一个人骑马朝明营走去，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出来迎住皇上，三个人在一起谈了很久。听说袁将军已经跟皇上订好密约，大事就要成功了……”这两个太监趁看守的金兵“不注意”，跑了出来，向思宗朱由检报告了他们得到的情报。朱由检居然一听就信，把袁崇焕抓了起来。大臣们劝他要冷静、慎重，他根本不听。魏忠贤的余党趁机构陷袁崇焕，他倒句句听得进去。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被朱由检下令处死。

朱由检当了17年皇帝，先后任用了50位宰相，17位刑部尚书。宰相刘鸿洲建议由宫廷出钱，补发军队的欠饷，朱由检心里老大不高兴。后来，又有人向他告密，说刘鸿洲在自己建议没被采纳后，发牢骚说：“皇帝毕竟太年轻了！”朱由检更是怀恨在心，差点要把刘鸿洲杀掉，后来被各位大臣劝住了，但还是把刘鸿洲发配到代州（今山西代县）。在刘鸿洲等大臣建议由宫廷出钱发饷时，礼部右侍郎周延儒迎合朱由检的心意，说什么：“军队要

求发饷，不能轻易答应，要不然，发了这个地方军队的饷，那个地方的军队就会跟着要讨饷。闹事讨饷，都是军队中的不良分子要挟主帅的行为。”朱由检从此就很赏识周延儒。刘鸿训被罢官后，朱由检叫大臣推荐宰相的候选人。周延儒虽然中过状元，但品行不好，同魏忠贤的党羽冯铨一起搞同性恋。大臣们推举了 11 位候选人，就是没有周延儒。朱由检一看名单，没有自己赏识的周延儒，十分恼火。这 11 位候选人，没有一个被他批准，他偏偏任命周延儒入阁为相。崇祯十六年（1643 年），清兵迫近京城。周延儒到前线视察军队。他把大军屯驻在通州，根本不敢与清兵交战。他每天在军中饮酒娱乐，却向朱由检谎报军情，说是打了胜仗。清兵主动撤退了，他更振振有辞地向朱由检请功。

周延儒当首辅时，把温体仁拉进内阁。这个温体仁曾为魏忠贤写过颂诗，向魏忠贤的死党行过贿，又有娶妓女、受贿赂、夺人家产等恶行。他当上宰相后，专门施展阴谋诡计，排除异己，连周延儒都中过他的暗箭。他的拿手好戏是窥伺思宗朱由检的意旨。有人批评他没有尽到宰相辅佐皇帝的责任，他就对朱由检说：“我起草的诏旨，总是抓不住要领。经皇上的御笔一修改，才能够无懈可击，我连颂扬、执行、照办都能不及，哪里说得上窥伺皇上的意旨呢！”他这番拍马屁的话一说，朱由检更加以为他朴实可靠，听任他败坏国家的大事。

明思宗朱由检惩办过魏忠贤及其党羽，但他自己还是走上了明代皇帝宠信宦官的老路。他认为朝臣们不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有他身边的太监才是真正肯为他做事的人。内臣（宦官）与外臣（朝官）发生矛盾，他总是袒护内臣。在朱由检在位时期，政治黑暗，惨无人道并不比熹宗朱由校时代好多少。熊开元、姜埰（音 cài）两位官员因为说直话，惹恼了朱由检，被抓进诏狱，遭受严刑拷打。一天半夜时分，有一名太监拿着朱由检手写的谕旨，送给锦衣卫的头头骆养性。骆养性打开一看，写的是：“谕骆某，即取熊姜二犯绝命缴。”意思是叫他立刻将两个人弄死。据送手谕的太监的口头传达，朱由检还叫他弄死了两人以后，就向他报告成两人在狱中病死了，骆养性不敢像熹宗朱由校时代的许显纯那样草菅人命。他婉转地劝思宗朱由检，最好把熊姜两人交付刑部审讯，公开宣判。朱由检怒气缓和过来后，又下了道手谕：“前诏不必行。”两人才算留下性命。

朱由检派遣大批太监到行政部门、军事前线，监视官员和军队将领。这些充当“钦差大臣”的太监作威作福，敲榨勒索，甚至纵兵为盗，抢劫平民。太监高起潜带的兵以抢劫百姓而声名大著。一些土匪在打家劫舍时，往往声称：“我们是高总监部下的兵！”他们这样一说，地方官就对他们无可奈何。为了向皇帝报功，高起潜竟指使部下乱杀百姓，割下老百姓的首级，冒称是被歼灭了敌人。

明思宗朱由检这样信用太监，太监还是出卖了他。李自成起义军进逼北京时，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居庸关协守太监杜之秩都开城投降。宦官曹化淳带头在北京城内串联宦官和朝官在投降李自成的公约上签名画押。北京城的城门就是由宦官向起义军打开的。

朱由检在李自成义军入城后，还自己跑去鸣钟，召集人作最后抵抗，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听从他的召唤。朱由检跑到皇宫后面的煤山，望着满城的烟火，彻底绝望。他在寿皇亭边的一棵老槐树的树枝上系了一条帛巾，上吊自杀。他自觉没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上吊前，取下皇冠，甩开长发，遮住了自

己的面庞。他的死，宣告了统治中国 276 年的大明帝国的灭亡。

闯王李自成

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东林党人议政，徒遭迫害。明朝的社会危机日益发展，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两兄弟在位的期间，农民起义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终于埋葬了朱家王朝。

明末农民起义最有名的领袖人物是李自成。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他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给人放羊，当长工。20 岁那年，他到驿站当马夫。崇祯三年（1630 年），思宗朱由检裁减驿站经费，以节约政府开支，转充军饷，李自成在这次裁减中失了业。李自成生活无着，只好向当地的富户艾举人借高利贷。由于到期还不起债，李自成被艾举人串通官府抓起来，带上木枷，在烈日下游街示众，差一点被活活折磨死。他逃出牢房后，又得知一个衙门里当差的恶棍霸占了他的妻子。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忍无可忍；他杀死艾举人，投奔了张存孟率领的农民起义军。

李自成在张存孟义军里当了一个队长。不久，张存孟战败，投降了明政府军。李自成不愿意随他投降，转而投奔了高迎祥率领的农民起义军。高迎祥自称“闯王”，李自成在他麾下当了“闯将”。

崇祯七年（1634 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在陕南与明军作战，误入兴安（今陕西安康）的车箱峡。车箱峡全长 40 里，两侧山势陡峭，峡口被明军封锁。农民军被困在峡内，进退不得，又碰上连下两个月的大雨，马匹没有草料，大部分饿死了，弓箭箭羽都受潮脱落。李自成采用谋士顾君恩献上的“诈降计”，农民军用财宝买通延绥巡抚陈奇瑜的亲信，向陈奇瑜接洽投降。陈奇瑜传令手下将领，停止进攻，并叫地方官向农民军供应粮草。李自成争取到喘息的时机，立即组织部队走出绝境。他们出峡后，义纵横陕甘豫，势力更加盛大。

崇祯八年（1635 年），各路农民起义军 13 家 72 营在荥阳（今河南郑州西）集会。当时，五省总督洪承畴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会剿农民军。面对官军的强大攻势，农民军如何迎战，以图生存发展？13 家义军首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李自成只是高迎祥这一家义军中的一员将领。他从高迎祥座后起立发言道：“一个人到了紧急的时候还能够奋起拼命，何况我们有 10 万大军呢！官兵能把我们怎么样！我看最好是兵分几路，各自出击，胜败得失，就看天意了。”13 路义军首领都说：“好！”大家一合计，决定兵分五路：一路迎击四川、湖广方向的官军；一路迎击陕西方向的官军；一路迎击河南的官军；高迎祥、张献忠这一路则向东发展；另有两家农民军在四路之间往来策应。

向东发展的这一路直捣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他们攻下凤阳，焚毁了凤阳的皇陵建筑群。义军从看守皇陵的太监中挑选了一批会吹吹打打的，组成一支乐队，庆祝这次胜利。在庆典上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表示了他们决心取明朝皇帝而代之以的政治主张。

崇祯九年（1636 年），高迎祥被陕西巡抚孙传庭俘获，押送到北京，明思宗朱由检下令将他处以磔刑（肢解而死）。高迎祥的旧部推举李自成继任闯王。孙传庭继续加紧进剿。崇祯十一年（1638 年），李自成部的农民军在潼关南原被官军包围。李自成、刘宗敏、田见秀等 18 人杀出重围，在商（今

陕西商县)、洛(今河南洛阳)一带的深山密林中隐蔽起来。李自成并没有因暂时的失败而灰心丧气,他在山中聚集被打散的旧部,整顿兵马,准备再起。第二年,已经接受明朝政府招安的张献忠在湖北谷城重新起兵造反。李自成趁此时机,从商洛山中杀出,进入河南。

河南杞县有一个举人李信这时投奔了李自成。李信同情百姓,在杞县闹饥荒时,将家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灾民。同县的富户诬告他“收买人心”,“图谋不轨”。官府把他抓进牢房。一个走江湖的杂技艺人红娘子率领饥民,冲进县狱,救出李信,李信加入义军后,改名李岩。李岩深得李自成赏识,成为李自成年中的重要谋士。他建议李自成实行“均田免税”,以争取贫苦农民的拥护。他把“均田免税”的纲领编成歌谣,让百姓到处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他还劝李自成整顿纪律,宣布“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等口号,使农民军大得人心,大受欢迎。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率军攻入洛阳。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封地。朱常洵是明神宗朱翊钧最宠爱的一个儿子。由于朝臣的强烈反对,朱翊钧没能将他立为太子。为了表示对朱常洵的特殊宠爱,朱翊钧决定要赐给他400万亩土地作田庄;朝臣纷纷反对,朱翊钧才将数字削减为200万亩。朱常洵结婚,花费了30万;修建王府,花费了28万,都是一般费用标准的十倍。福王朱常洵的昏庸荒淫,颇似乃父,在洛阳王府,成天饮酒作乐,搜括钱财。李自成的义军包围洛阳,守城士兵打开城门迎接。朱常洵躲进寺庙,被农民军搜出来杀死。

农民军攻打开封时,李自成被明朝总兵陈永福射中眼眶。后来,陈永福被农民军包围。他害怕李自成要报一箭之仇,死守山巅,不肯投降。李自成派使者劝降,为了消除他的恐惧心理,李自成折断一根箭杆,叫使者带给陈永福,表示自己如若记仇报复,有如此箭。陈永福为李自成的诚意所感动,投降了农民军。

李自成不好酒色,生活朴素。另一个农民军首领罗汝才却有几十个小老婆,平时生活奢华,李自成很不满意他的生活作风。一天清晨,李自成派出20名骑兵,冲进罗汝才的营帐,将他斩首。明朝的参政张国绅投降李自成,被李自成委任为上相。他为了讨好李自成,把当地一个士人的妻子抢来献给李自成。李自成很鄙视他的这种恶劣做法,将他杀掉,将那个女人送回家里。

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城。李自成进城时,头戴白色毡笠,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一匹黑色骏马,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

农民军勒令明朝官员交出自己搜括的赃款充当义军的军饷。李自成命大将刘宗敏主持这件事情。刘宗敏在向退休官员吴襄追赃时,把吴襄儿子吴三桂最宠爱的歌女陈圆圆也抢来据为己有。吴三桂是明朝的总兵,正率领明军驻扎在山海关一线。吴三桂起初还有投降李自成的打算,后来听到父亲被抓,家产被抄,宠姬被夺,不禁气得捶胸顿脚。他下令手下将士换上白衣白甲,为思宗朱由检带孝,并派人同清王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接洽,请求清军支援。

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吴三桂军在山海关决战。双方激战正酣之际,多尔衮指挥事先埋伏在附近的清军向农民军发动突然袭击。农民军猝不及防,遭到失败。

李自成率军退回北京城。他在皇宫的武英殿匆忙举行登极典礼,即位为

大顺国皇帝，第二天清晨，率领军队向陕西方向撤退。

清军步步紧逼，李自成的农民军节节败退。清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率残部来到湖北通山九宫山。一天，李自成带着20多名骑兵到附近村庄搜集粮草。当地的地主武装见他们人少，向他们发起突然攻击。李自成被一个叫程九伯的头目用土铳打死。这帮人剥开尸体的外衣，发现里面衬的是龙袍，又看见死者瞎了一只眼睛，这才知道被他们打死的就是闯王李自成。清军得到消息后，派人验尸，但尸体已经朽坏，辨认不清楚了。也许由于正身难以验明，此后出现了许多传说。有一个传说，说李自成当时并没有死，他在兵败以后，隐蔽在湖南石门的夹山寺，出家当了和尚，法名奉天玉，直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才去世。

文武双全阳明子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他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后裔，成化八年（1472年）生于余姚（今浙江余姚）。

王守仁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状元。父亲考上状元后的第二年，王守仁随祖父王天叙一起到北京去。路过镇江金山寺，王天叙与朋友宴会，11岁的王守仁陪座。客人们以《蔽月山房》为题赋诗，王守仁也脱口吟成一首：“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首诗表现了童年王守仁思考问题的深刻、透彻。

在北京，王守仁的状元父亲叫他进学塾读书。他问老师：“什么是世间的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读书登科是第一等事。”他却大不以为然，对老师说：“登科及第算不了第一等事。读好了书，像圣人贤人那样立身处世，才算得上是第一等事。”

弘治元年（1488年），王守仁的舅父被任命为江西布政司参议，他跟随舅父到了洪都（今江西南昌），并在那里结了婚。结婚那天，他出外散步，路过铁柱宫，便走了进去，看见一个道士在宫中打坐。王守仁同他攀谈起来。道士向他谈起道教养生的一套道理，王守仁听得入了迷，后来干脆就练习起打坐来。他一入静，连回家圆房的事也忘记了。家里的人不见了新郎官，到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早上，王守仁才回到家里。

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悟到“心上学”的妙处，为以后创立“心学”打下了基础。他学习书法的时候，先是临摹古帖，临来临去，只临得字的形状。后来，他提起笔来，并不轻易落纸写字，而是凝神思考，在心中揣摩字的形状、神韵，终于领悟到书法的奥秘。于是，他深为感慨地对人说：“只要此心精明，字就能写得好。随时随地，要在心上学。”

弘治五年（1492年），他又到北京父亲官署住下，准备第二年的会试。他读到宋代哲学家朱熹关于“格物穷理”的论述，决心按这个途径去探究事物的道理。他来到官署的后花园，对着竹子“格”了起来。接连格了7天，不但没有格出竹子的道理，而且人还格出病来。从此，他就不再相信朱熹的学说。

在弘治六年（1493年）和弘治九年（1496年）的两次会试中，王守仁都没有考上。一道与他学习而没有考上的人都觉得没脸见人。王守仁却非常豁达。他安慰同学：“别人以为考不上是耻辱的事，我却以为‘把考不上视为耻辱’才是耻辱的事。”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第三次参加会试，考中了二甲进士。中进士后，他先后在刑部、兵部担任主事。

正德元年（1506年），太监刘瑾将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20余人抓进诏狱。王守仁向明武宗朱厚照上疏，要求朱厚照改正错误，释放戴铣等人。刘瑾把王守仁也抓进诏狱。王守仁受了杖刑，几乎昏死过去。刘瑾把他发配到贵州的深山野岭中，要他去当一个管理驿站的小官。王守仁走到半路，刘瑾又派人尾追上去，准备对他暗下毒手。王守仁觉察到受人跟踪，机警地将衣服鞋帽留在钱塘江边，布置了一个自己已投江自杀的假现场，随后，偷偷上了一只海船，准备逃往舟山。船在海上遇到飓风，漂到福建。王守仁上岸后，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夜里投宿在深山野庙中。没想到，在这座野庙中却遇上了19年前，他在结婚那天在铁柱宫结识的那位道士。道士劝他不要再逃亡：“你的父亲还在朝中做官。你逃亡在外，万一刘瑾诬陷你，说你跑到北边，投了鞑鞑，或者说你跑到南边，投了海盗，将你父亲抓起来，你怎么办呢？”王守仁在野庙里题了一首诗，抒发了自己历尽艰险，啸傲人生的心境，随后就动身到贵州龙场驿赴任。

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县境内，是一个深山中的小驿站。王守仁任驿丞，下面只有一名小吏，管理23匹马、23套行李铺盖。当地气候潮湿，驿站内就可以看到蛇鼠出没。周围人烟稀少，居民以语言难通的少数民族为主，能够打交道的人，都是一些中原地区的亡命之人。王守仁在那里，终日沉默不语，打坐入静。下面的小吏病了，他就自己砍柴挑水、烧火做饭，照顾病人。两人在一起时，他也讲些笑话，谈些诗词，吟唱一些家乡的小调，来调解心中的郁闷。在龙场驿，他实现了内（心）外（物）合一，纵然处境艰危，却能甘之如饴。有一天半夜，他在睡梦中，忽然感觉到有人向他讲话，心中登时领悟到，在人的本性中，自然充溢着圣人的“道”，向外界事物中探求“理”是完全错误的。大觉大悟之后，他不禁欢喜雀跃，驿中的小吏和住客都被他惊醒了，困惑不解地望着他喜气洋洋的样子。

贵州巡抚王质为了讨好刘瑾，派人到龙场驿，向王守仁训话。周围的少数民族居民看到这个人狐假虎威、气势凌人的样子，都很气愤。他们围上前来，你一言，我一语，把巡抚的使者痛斥了一顿。王守仁得到当地百姓的保护，处境有所好转。为了感激他们，王守仁就开始讲学，向他们传授知识。百姓们一合计，大家一齐动下，盖起一幢房子，供王守仁讲学用。贵州各地慕名而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把这一幢简陋的房子称为“龙冈书院”。

刘瑾死后，王守仁回到南京。他继续进行研究，讲学，影响越来越大。他被派去镇压农民起义，屠杀了大量被迫造反的贫苦农民。王守仁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主张从百姓的思想中铲除不利于封建秩序的念头。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王守仁当时任巡抚南赣都御史，奉命讨伐福建叛军。他率部到达丰城（今江西丰城），得到朱宸濠谋反的消息，就率部急趋吉安，与当地官员一起，调兵遣将，准备讨平朱宸濠的叛乱。王守仁怕的是朱宸濠去攻打南京。他写了一封信给李士实、刘养正两人。李士实是一个退休的都御史，刘养正是一个举人，两人帮朱宸濠策划谋反，是朱宸濠封的“宰相”。王守仁在信中劝他俩反正，并故意请他俩怂恿朱宸濠去攻打南京，又故意泄露信的内容，让人传到朱宸濠耳中。李士实、刘养正两人劝朱宸濠打南京，朱宸濠却怀疑他们是受王守仁的支使来诱他上钩的，便按兵不动，耽误了至关重要的10多天的时间。朱宸濠带兵去攻

安庆，久攻不下。王守仁则乘机率兵去攻打朱宸濠的老窝——南昌。南昌城里，兵力空虚。王守仁很快就攻下南昌。朱宸濠回头来救南昌，又接连吃了败仗。王守仁叫人用装满柴薪的小船，点着火后，顺风冲向朱宸濠的大船，将朱宸濠的叛军歼灭殆尽，并活捉了朱宸濠、李士实、刘养正等人。

王守仁平定了朱宸濠叛乱，武宗朱厚照周围的人却将捷报压住，不告诉朱厚照。因为朱厚照要“御驾亲征”，显示自己是一个军事天才，不能让他扫了兴。那些一心拍武宗朱厚照马屁的人甚至想出这样一个荒唐主意：叫王守仁故意把朱宸濠放掉，好让朱厚照自己去抓住这个造反的王爷，求得游戏式的“心理满足”。王守仁没听这些人的指挥，他上书朱厚照，请示举行献俘典礼，并劝阻朱厚照继续搞什么“南征”的把戏。王守仁的行为得罪了那帮亲信，他们竟想诬陷王守仁与朱宸濠同谋，并纵容手下的士兵叫着王守仁的名字骂他。他们以为王守仁是文官，不善骑射，故意要他表演射箭，好羞辱他。没想到，王守仁年轻时，留心军事，练过武艺，拿起弓箭，三发三中，周围的士兵禁不住齐声叫“好！”

此后，王守仁又多次带兵打仗。在处理繁重的政务、军务的同时，他还讲学不止。他早年曾在会稽（今浙江绍兴）的阳明洞筑室居住，自号“阳明子”，他的学生称他为“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阳明学”。

嘉靖八年（1529年），王阳明病逝。

卓吾老子

李贽（音 zhì）是中国学术史上特别有个性的思想家。他写过一篇《自赞》，自己形容自己是“其心狂痴，其行率易”。他在明代末年的知识界中影响很大。他号卓吾，人们称他为“卓吾老子”。

这个狂痴率易的卓吾老子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他的家族原姓林，后来改姓李。他的六世祖林駉（音 nú）是福建泉州的大商人，经常来往于泉州与波斯湾之间，娶了一个阿刺伯女人为妻子。此后，这个家族同泉州的混血家庭和伊斯兰教徒的来往就一直很密切。到了李贽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贽中了举人后，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就到政府中担任一些位卑俸微的小官，一直郁郁不得志。他生有4个儿子，3个女儿，除大女儿以外，其余的孩子都不幸早夭。嘉靖38年（1559年），李贽因父亲去世，丁忧停职。服丧期满，他进京求职，等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得到一个国子监教官的职位。在候补期间，全家靠他教书糊口。有一次，他家一连7天没有吃到多少东西。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是李贽生活特别艰难的一年。

这一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夭折了。李贽还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又收到祖父去世的讣闻。他要回家料理丧事，却无力带家属随行。妻子黄氏带着一堆儿女在河南共城（李贽曾在这里当过教官），靠种田维持生活。那年遇上旱灾，当地的官吏向黄氏索贿不成，就不让黄氏从沟渠中引水灌田。天灾人祸加在一起，几乎断绝了这家人的生路。李贽的两个女儿先后饿死。李贽在家乡，好不容易安葬了祖先三代的五口灵柩，弄得心力交瘁——他不能忍受极大的牺牲这样做，因为，不能安置先人的骸骨归土，那就会被认为是“不孝”，受到谴责和嘲弄。3年后，他回到共城，与妻子团聚，夫妻相对，如在梦中。妻子想起饿死的女儿，泪如雨下，李贽只有强忍悲痛，安慰

妻子。

万历五年（1577年），51岁的李贽被任命为姚安（今云南姚安）太守。此时，他对仕途已经厌倦。在赴任途中，路经黄安（今湖北红安），他与老友耿定理会面时，就表示：“等我三年任期一满，积蓄得一点正四品的俸禄，我就一定退休不干。”他在姚安当太守时，除了处理最必要的事务外，尽量不生事扰民。有了空闲时间，他就同当地的和尚往来，讨论佛经。有时甚至把公文带到佛寺中去批阅。有一次，他到鸡足山去游玩，见山中一座佛寺中收藏了很多佛经，就留在那里读佛经，好多天不回到衙门处理公事。御史刘维奇上疏，告他荒忽政务。恰好，他的任期也到了，他就请求辞职。

万历八年（1580年），李贽辞官的请求得到批准。他取道四川，放舟三峡，来到黄州，寄居在耿定理家中。

耿定理是李贽最知己的朋友。两人在黄安聚首，切磋学问，评诗论文。这一段难得的惬意生活并没能维持多久。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病逝，李贽十分悲痛。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是南京刑部尚书，都察院右侍都御史。耿定向是一个大谈“孝悌”，讲究做“子、臣、弟、友”规矩的道学先生，对李贽的思想和行为，颇不以为然。李贽不久便与耿定向闹翻了。他搬出耿家，让妻子黄氏独身一人回泉州老家，自己搬到麻城龙潭，削发当了和尚，先住维摩庵，后来又搬到芝佛上院。黄氏是一个十分贤慧的女人。她与李贽结婚后，40年间，夫妻从没反目。她回泉州后，多次敦促李贽也回家乡，夫妻相守，度过余年。但直到黄氏在7年后去世，夫妻两人都没能再见面。

李贽解释自己决心削发的原因是：“我平生不爱属人管”，“闲杂等人，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其实，他内心也十分痛苦，他曾对人感叹道：“我的落发，岂容易哉！我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写至此，我自酸鼻，你们切不要把落发当成好事，轻易受人布施！”落发之后，他的生活并不平静。他的儿子不幸在龙潭淹死，又给他带来铭心刻骨的悲痛。

李贽虽然光着头，身份是个和尚，却又经常走街串巷，结交朋友，还到处讲学，被当局视为“左道惑众”，甚至传闻官府要来抓他。他不得已，只得到武昌去躲避。在武昌，他住在洪山宝通寺，受到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的庇护，得以继续讲学交友。他的名声很大，走过街市，常常有不知姓名的人来邀他到酒店饮酒倾谈。他也豪爽得很，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放怀畅饮，放言高论。

麻城人梅国桢，曾任兵部右侍郎，总督山西军务。他在回家为父亲守丧时，与李贽有过往来。他称李贽为“秃翁”，认为没有人能比秃翁更能与他谈得来。他的女儿澹然，丈夫死了，信奉佛教，对李贽很敬佩，拜他为老师。李贽认为这个女弟子很有男子气概，称她为“澹然大士”。师生两人经常在一起研讨学问。梅家的其他女眷与李贽也有所接触。李贽把他与这几位女士讨论佛学的文稿刊刻，题为《观音问》。这些事情被一些人大惊小怪地加以议论，并且添油加醋地制造了种种流言。有的人还翻出陈年老帐，说他曾嫖过妓，还到寡妇房里化过缘，把他攻击成一个邪恶的妖僧。当地的官吏和绅士指使一帮无赖放火，将李贽寄身的芝佛院烧得片瓦不存。这件事发生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七世纪开始的那一年。

芝佛院被烧毁后，李贽北上到了通州，寄居在朋友马经纶家中。礼科给

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攻击李贽：“惑乱人心”，并搜罗了一些谣言，把“明劫人财，强掠人妇，同于禽兽”的罪名加在他身上，还危言耸听地说：通州离京城只有40里地，要是李贽进了北京城，一定会蛊惑人心，造成混乱。明神宗朱翊钧遂下诏逮捕李贽。

李贽被捕时已是76岁的老人，他一生坎坷，历尽艰难，被横加种种罪名，心里十分悲愤。他在狱中得知，他将被押解回原籍，终身受到地方官的监视管制，这种生活对于他是难以忍受的。

万历三十年（1602年）3月15日，李贽要理发匠为他剃头，乘理发匠去准备洗头的热水时，他拿起剃头刀割开了自己的咽喉。理发匠回来时，看到他已鲜血淋漓、奄奄一息。理发匠问他话，他已不能出声，只能用手指在理发匠掌心中写字作为回答。这一段对话，至今读起来，还令人感到深沉的悲哀：“和尚痛不痛？”“不痛！”“和尚为什么要自割？”“七十老翁何所求！”

多年前，李贽曾写过：“我将因为人们不理解我而死。我要用死来发泄心中的愤怒。”这个预言，竟不幸而言中。

李贽在哲学观点上受到王守仁的影响，但公开以“异端”自居。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在文学方面，他主张从“绝假纯真”的“童心”出发进行创作，推崇《水浒传》等小说。李贽的主要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李温陵集》等。

李贽的思想和著作在当时及后代有很大的影响。读书人把阅读他的书当作一种时髦，千方百计地设法得到他写的书。谁手中有一本他的著作，就被人羡慕，以为是得到了可居的奇货。

药圣李时珍

李时珍是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被人称为“药圣”。他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出生于蕲（音qí）州东门外的瓦硝坝（今湖北蕲春蕲州镇）。父亲李言闻是当地一个著名的医生。

李时珍自幼体弱多病，李言闻细心为他诊断治疗，才使他身体慢慢好起来。他受了父亲的影响，十分向往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喜欢阅读家中的医书，并经常跟随父亲到山间野外采药。李言闻并不想儿子继承自己的职业，他希望儿子能顺着科举考试的阶梯，当举人，中进士，进入仕途。李时珍14岁就中了秀才，但是，随后接连三次参加乡试，都未能考中举人。他对当官没有兴趣，立志为医，不再去应考，不久就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医生。一些达官贵族听到他的名声，也时常请他到府中看病。这些人家中一般都有丰富的藏书，李时珍替这些人看好了病，就向他们借书看。这样一来，他的知识积累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明了。

楚王朱英熿（音xīn）的世子得了暴厥症，经常抽风。朱英熿把李时珍请来为儿子看病。李时珍仔细观察病人的脸色，又按了按他的脉象，判断病的根源在肠胃，开了一副调理肠胃的药，很快治好了世子的病。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朝廷在全国征求人才，朱英熿向明世宗朱厚熜推荐了李时珍。

李时珍到了北京，进了太医院。太医院是国家最高的医疗机构。明世宗

朱厚熹最感兴趣的是仙丹妙药，一心追求长生不老，最宠用的是那些为他炼金丹的道士。作为一个正直的医生，李时珍十分看不惯这些乌烟瘴气的现象。起初，他耐着性子，利用在太医院供职的机会，阅读了院中收藏的珍贵医书，并研究那些南方没有的名贵药材。后来，他越来越觉得太医院里不是搞学问的人可以长久呆下去的地方。第二年，他找了个借口，辞职回乡。

路过河南一个驿站时，李时珍看到几个车夫在锅里煮一种粉红色的花。他知道这种花叫旋花，但不知道煮它有什么用。他向车夫请教，车夫告诉他：“我们这些人，长年风里来，雨里去，容易得筋骨病。煮点旋花汤喝，可以止筋骨痛。”李时珍听了，心里想：民间的偏方、验方、秘方很多，我要好好将它们搜集起来，为天下人治病。

李时珍回到家乡后，经常到湖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游历，采集药材标本，搜集民间药方。他给人看病常常不收诊金，只求病人向他介绍一点他们所知道的药材和药方。

有一次，李时珍听人说均州（今湖北均县）武当山有一种叫榔梅的果子，吃了以后可以延年益寿，被称为“仙果”。他特意赶到均州，想实地采集榔梅果，考察它的疗效。当地人告诉他，当今皇上有令，榔梅果只能由皇家采。民间有人私采，是要抓起来治罪的。李时珍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仙果”。为了弄清真相，他冒着危险，趁着夜色，抄小路进了武当山。他在药农的帮助下，避开看守武当山道观的道士，攀登悬崖峭壁，采到了榔梅的标本。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榔梅果只有一点生津止渴的作用，根本不是什么“仙果”。

在进行药物研究时，李时珍有一种忘我的献身精神，又有一种科学的实证精神。为了弄清蔓陀罗的药理作用，他冒着危险，亲自服用这种药草。喝下以后，他精神恍惚，失去了痛觉，体验到蔓陀罗的麻醉效果。古书上说大豆能解毒。李时珍给小狗吃了毒物，再让小狗吃大豆，并没有救活小狗。他并没有轻易对大豆的解毒作用下结论，又继续实验，终于发现，只有加上甘草，大豆才能显示出解毒的效果来。

李时珍总结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药物学的巨著——《本草纲目》。这本书有52卷，分成16部，记载了1892种药物，收入了11000多个药方。这部书写成时，李时珍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从蕲春专程到当时出版业的中心——南京，想找一个书商将《本草纲目》刊印出来，以造福当世，流惠后人。唯利是图的书商却认为刊印这部书赚不了什么钱，对这个奔走呼号的老人采取了极为冷淡的态度。李时珍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去世，生前一直没能看到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印刷成书。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本草纲目》才在南京刊行。这部书一问世，就受到广泛的欢迎。国内一版再版，到处翻印。在国外，《本草纲目》被翻译成日、英、德、法、俄、拉丁等各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英国著名的科学家达尔文称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在创立进化论的过程中，他曾利用过这百科全书中的丰富资料。俄国的莫斯科大学厅中镶嵌着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的画像，李时珍就在其中。

西儒利玛窦

利玛窦（Mathew Ricci）是向中国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最早、最重要的开拓者，对发展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产生过历史性的影响。

他是意大利人，后半辈子却在中国生活了整整 28 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1552 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省的马塞拉塔城。19 岁时，在罗马加入了天主教耶稣会。耶稣会是西班牙人依纳爵于 1539 年创立的一个天主教修会。这个修会在宗教生活上强调顺从，特别是顺从教皇，并积极在非天主教地区，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开展传教活动。利玛窦在耶稣会办的学校学习哲学和神学，并跟随当时著名的数学家丁先生学习天文和数学。26 岁那年，他志愿到印度果阿（葡萄牙殖民地）传教。4 年后，他又来到澳门，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万历十一年（1583 年）9 月，利玛窦和另一名天主教神父罗明坚一起到了广东肇庆。他们在肇庆城东崇禧塔附近盖了一座小教堂。为了接近中国人，他们穿上了中国的长袍，并认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书法。他们收的第一个信徒是一个得了不治之症、被家人抛弃在街头的穷人。这个人接受了洗礼，几天后就死了。肇庆知府王泮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并赠送给教堂两块匾，上面分别题写的是：“仙花寺”、“西来净土”。

利玛窦在教堂接待室的墙壁上挂了一幅世界地图，他用中文在上面标出了世界各大洲、大洋、大国的名称，向人们传授世界地理知识。他把这份地图起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反复修改、校订、重绘，送给知府、送给总督，后来还送入北京城里的皇宫。利玛窦的“地图外交”取得了成功，他同很多中国官员结成了朋友。此后，他又制作天球仪、地球仪、日晷，将它们作为赠送给中国官员的礼物，并向他们讲解天文、地理知识，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万历十七年（1589 年），新任总督刘继文将利玛窦驱逐出肇庆，转送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利玛窦在韶州光孝寺附近修建房屋住下。两个在澳门学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个叫钟鸣仁，一个叫黄明沙，被派来协助他传教。利玛窦在韶州收留了一个官僚家庭的子弟瞿太素当学生。瞿太素学习了欧基里德几何学、制图学，并用中文向当地的官员介绍这些先进的科学知识。瞿太素心灵手巧，用木、铜、银等为材料，制作了如天球仪、罗盘、星盘、象限仪、日晷等科学仪器，使韶州人大开眼界。瞿太素还认真钻研了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死去的父亲曾是明朝的状元、尚书。他利用父亲的声望，帮助利玛窦结交了很多官员，争取到他们对传教工作的支持。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还专程到教堂拜访利玛窦，请教一些数学问题。利玛窦的解答使他十分高兴，他向利玛窦表示，要设法推荐利玛窦到北京去参加历法的修订工作。

为了同和尚在外形上有所区别，利玛窦向教廷建议，到中国传教的神父要留起胡子，蓄起长发，并穿上丝绸长袍，看起来就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过去，人们习惯称欧洲传教士是“洋和尚”，但对于利玛窦，人们则称他是“西儒”，意思是，虽然来自西方，却颇似一位儒家的学者。

兵部尚书石星的儿子科举考试失败，得了精神抑郁症。石星请利玛窦来探望他的儿子，用祷告和陪伴来恢复儿子的精神健康。利玛窦成了石星一家人的亲密朋友。石星批准利玛窦访问南京。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在广东当兵备道时，曾参观过利玛窦的教堂，利玛窦曾送给他一个天球仪和一只砂漏。利玛窦到南京后，就携带礼物去拜访徐大任，希望他能支持自己在南京建立

传教中心。徐大任对他说，南京不是外国人能住家的地方，他到南京来会引起骚乱。徐大任还恐吓利玛窦的房东，利玛窦只好离开南京，转赴南昌。在南昌住了一段时间后，才随老朋友王弘海二次赴南京。恰好王弘海要到北京向明神宗朱翊钧祝寿，利玛窦也跟着上了北京。

利玛窦住在王弘海家里。王弘海想通过他所认识的太监，将利玛窦介绍给皇帝。太监原来听说利玛窦会一种“炼金术”，能把水银变成真银，所以对他还颇为热情。利玛窦告诉太监，他并不掌握什么烧炼银子的魔法。太监顿时就改变了态度，拒绝向皇帝推荐这个洋人。

利玛窦三赴南京，在那里广交朋友，并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在南京，利玛窦同已削发为僧的中国著名思想家李贽结识，两人成为好朋友。南京城里崇礼街上有一处房子，据说经常闹“鬼”，没人敢住。利玛窦买下这所“凶宅”，作为传教的据点。他在这里办了一个展览，展出准备送给皇帝的礼物：自鸣钟、八音琴、耶稣像、圣母像、玻璃三棱镜等等，在南京城造成很大的轰动。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再次启程进北京。路过济宁时，同李贽又会面了，他想劝李贽受洗入教，因为行色匆匆，未能如愿，两年后，李贽被捕，于狱中自杀。

万历二十九年（1610年）1月25日，利玛窦的礼物送进皇宫。神宗朱翊钧派太监田尔耕接见了利玛窦。利玛窦应邀在宫中讲课，向太监们传授自鸣钟的维护保养知识，并回答朱翊钧通过太监向他提出的有关欧洲风土人情、帝王疆域的问题。朱翊钧对利玛窦进献的礼物喜欢得着了迷，他想见见送礼的洋人，但又不愿意破坏他几年前立下的规矩，除了后妃、宫女、太监以外，他不在任何人面前露相。于是，他派了两个画师为利玛窦画像，通过观看画像来满足自己对洋人的好奇心。

利玛窦用中文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科学与学术，如《交友论》、《四元行论》、《畴人十篇》等等。他还在钟鸣仁的协助下，研究了汉语音韵，编制了《平常问答词意》。他还把《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使欧洲得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临终时，他对守护他的耶稣会士们说：“我把你们留在一个大门洞开的门槛上，它可以引向极大的报偿，但必须经过艰难险阻才行。”

明神宗朱翊钧批准赐给利玛窦一块坟地，将他的遗体埋葬在中国。利玛窦的墓地在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400年的沧桑岁月过去了，利玛窦的墓地保存完好，成为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一个历史见证。

西学东渐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期间，交了许多中国朋友，收了不少中国学生，徐光启就是其中的一个。

徐光启的家乡在上海徐家汇。他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父亲是一个小商人。他是一个独生子，父母一心一意指望他读书做官，光宗耀祖。徐光启刻苦学习，20岁考取秀才，35岁考中举人，42岁成为进士，71岁时，他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地位相当于宰相，任职一年多时间，因病去世。

徐光启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在北京当官 20 多年，对当时的国防、财政、农垦、水利各方面的政策，都提出过周详中肯的建议。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明朝的辽东守军被后金军打得大败，举国震惊，上下不安。徐光启那时已经 58 岁，又是一个文官，却主动请求承担练兵卫国的责任。明神宗朱翊钧破格将他提拔为河南道御史，让他在北通州主持练兵事务。徐光启为人正直，看不惯宦官当权的种种污浊不堪的行为，也不善于迎合上级长官的意旨，多次被迫离职赋闲，在政治上并没有大的作为。他的成就主要在科学技术方面。

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徐光启在南京认识了利玛窦。

3 年后，徐光启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并有了一个教名——徐保禄（保禄，通译为保罗，是基督教的四大使徒之一）。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徐光启进京参加会试。他中了进士，并被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他虚心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测量、水利等科学知识，并同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他每天下午都从翰林院赶到宣武门天主教堂。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为了用适当的汉语名词表达欧基里德的数学概念，徐光启绞尽脑汁，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我们现在常用的几何、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等数学名词，都是由徐光启制订的。徐光启还同另一个天主教神父罗雅谷合作，翻译了《测量全义》十卷，将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引入中国。诸如正弦、正切、余弦、余切这一类现在习用的三角学术语，也是由徐光启制定的。

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不久，日食推算出了差错。朱由检十分恼火，要处罚有关人员。徐光启认为“历久必差”，关键是要对历法进行修正。朱由检采纳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主持修订历法的工作。徐光启领导新成立的“历局”的工作人员，夜晚观测，白天计算，编制了整个天球的恒星图。他还通过利玛窦，同罗马及德、奥等国的著名大学建立了联系，吸取当时欧洲的先进科学成果，使日、月食的预测精度大大提高。崇祯四年（1631 年），他在中国第一个使用引进的望远镜观测天象，这时，距欧洲发明望远镜只有 23 年。徐光启主持制定的崇祯历法，是我国现在还沿用的农历的基础。

徐光启进行科学研究，目的是要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徐光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十分注重农业科学的研究。甘薯，又叫红薯、地瓜，是由外国传入的，当时只有福建沿海的少数地区有人种植。徐光启赋闲回乡时，决心在上海一带推广种植甘薯。他从福建引来薯种，亲自动手试种，掌握了甘薯的习性，并向乡亲们传授侍弄甘薯的技术。每遇荒年，灾民吃草子、吃树皮，常有误食有毒有害物品而丧命的事发生。徐光启亲自品尝各种荒年被用作食物代用品的东西，系统加以筛选，总结出：吃树皮只能吃榆树皮，吃树叶只能吃槐树叶，吃草子只能吃野稗、黄苳、蓬蒿、苍耳的子。他编撰的《农政全书》，是我国历代农业科学研究成果的总汇。

徐光启做学问非常勤奋。他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将书室打扫干净后，就坐在书桌边，孜孜不倦地读书、计算、写文章，直到夜半时才去休息。在明代历史上，他是与李时珍并列的科学巨人。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他是一个先驱者，是西学东渐的接引人。

